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筆者的留學經驗：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人造成的特殊情感糾葛

在正式來臺灣留學前，曾到臺灣旅行，當時對臺灣留下深刻的印象，覺得臺灣人對日本人相當友善，這和之前去中國與韓國的經驗完全不同。來臺後，與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或其子孫聊天，不少人都對日本統治時期相當懷念，甚至對於當時的教育措施還記憶猶新（譬如會唱日本國歌、校歌、童謠等）。中國、韓國、臺灣，這三個國家中有些地方都曾受過日本統治，但對待日本人的態度卻完全不同，這引發了我的興趣。臺灣對於日本的認同與觀感是否與韓國、中國有不同之處？而這種認同與觀感的產生是否與當時日本時期對於臺灣所做政策有關？

二、筆者體認到：日治時期臺灣人對國家認同傾向充滿矛盾情結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這五十年期間是臺灣的歷史，同時也是日本的歷史。當時日本在臺灣實行同化政策，以各種方式來同化臺灣人，目的是要希望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而在這實施同化政策的過程中，當時的臺灣人面對日本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抱持著什麼態度與看法？日本政府是否成功地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雖然現在有些老一輩的臺灣人，懂得一些日文，甚至某些臺語的發音與日本的發音一樣，但此現象是否代表當時的臺灣人已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究竟當時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傾向日本？臺灣？還是漢族？亦或是迫於當時無奈情境，表面上遵循日本政府的政策，但內心卻仍無法認同日本？因之，筆者認為日本的同化政策帶來的認同成效和問題值得研究。

三、筆者有感於：相關日治時期國家認同之研究缺乏口述歷史方式分析

目前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的相關研究，大多注重政策之分析，或知識分子的思想加以分析，並未重視當時庶民的國家認同層面。日本政府殖民政策勢必影響庶民生活，而庶民生活亦往往會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透過庶民生活當然可以窺探當時日本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的成效，也就是說庶民

生活亦足以代表當時大部分臺灣人的心聲與對日本殖民政策的態度。因為有感於該主題對庶民方面研究的缺乏，因此本文採口述歷史方式以研究當時庶民的認同問題。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包括下列五點：

- (一) 瞭解日本對臺殖民政策與教育政策之轉變。
- (二) 探討日治時期教育政策之實施成效。
- (三) 探究修身教育對臺灣人國家認同之影響。
- (四) 探討日治時期庶民學校生活概況及國家認同意識。
- (五) 依據研究結果及發現提供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Documentary Analysis)

蒐集有關日治時期之書目、教科書、論文、期刊、總督府文件等資料，加以整理，並綜合分析，形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二、訪談法 (Interview)

本文訪談曾經接受日治教育的臺灣人 (以下稱耆老)，分析當時生活概況，並探討他們的國家認同感。

貳、研究架構與流程

關於本文的研究架構、研究流程，如圖 1-1、圖 1-2 所示。首先分析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政策，包含無方針主義、內地延長主義及皇民化階段，但較偏重內地延長主義與皇民化階段，進而從殖民政策中分析當時的教育政策。除了比較兩階段的差異外，也將進行修身教育的探討，探討內容分為修身教科書、教師、學校活動等三類別。緊接著，從修身教育來討論當時臺灣人國家認同之培養，透過文獻分析與訪談方式深入瞭解修身教育對於臺灣人國家認同培養的成效與影響。最後將歸納比較文獻與訪談結果之異同作出研究結果與提出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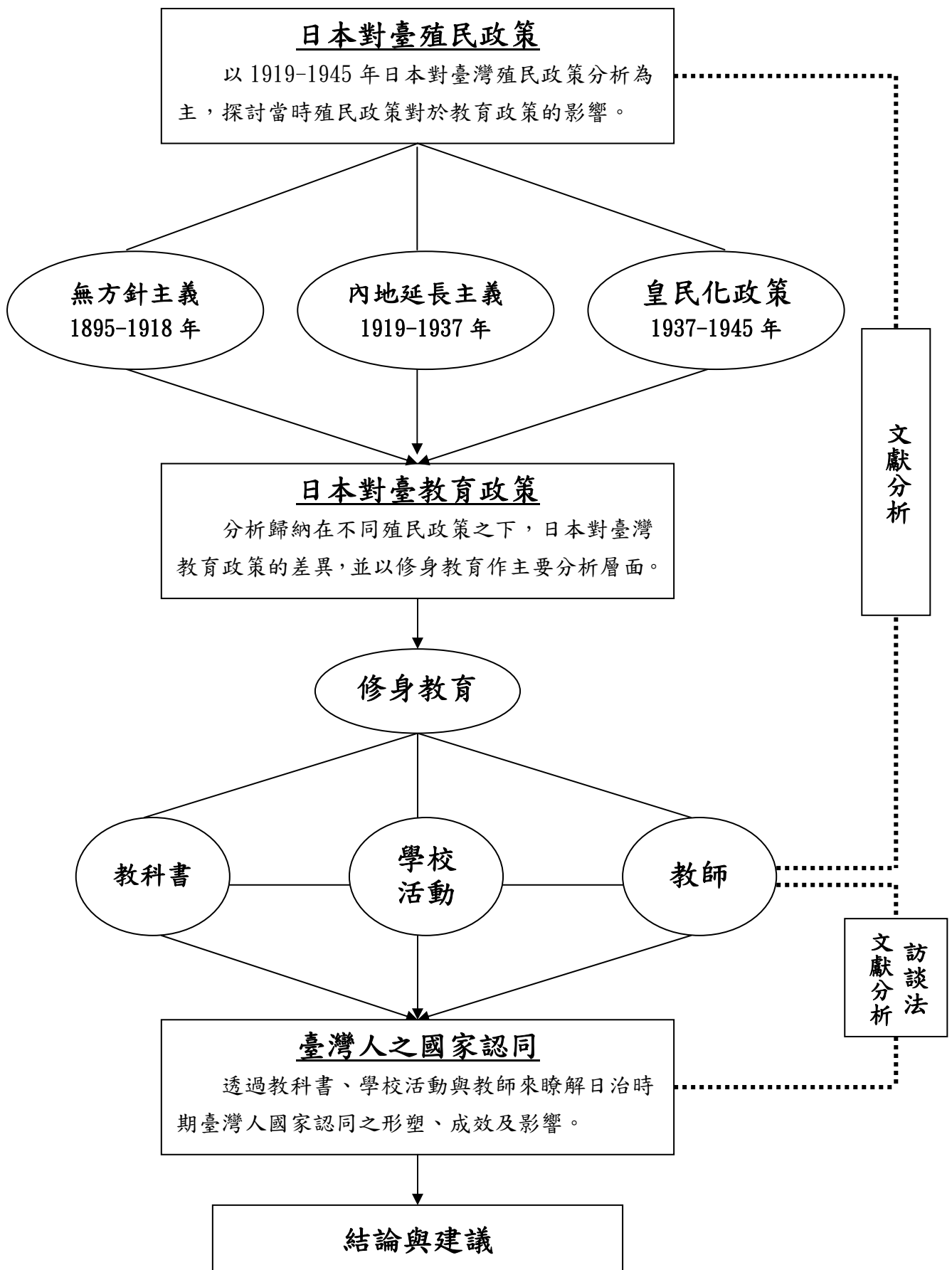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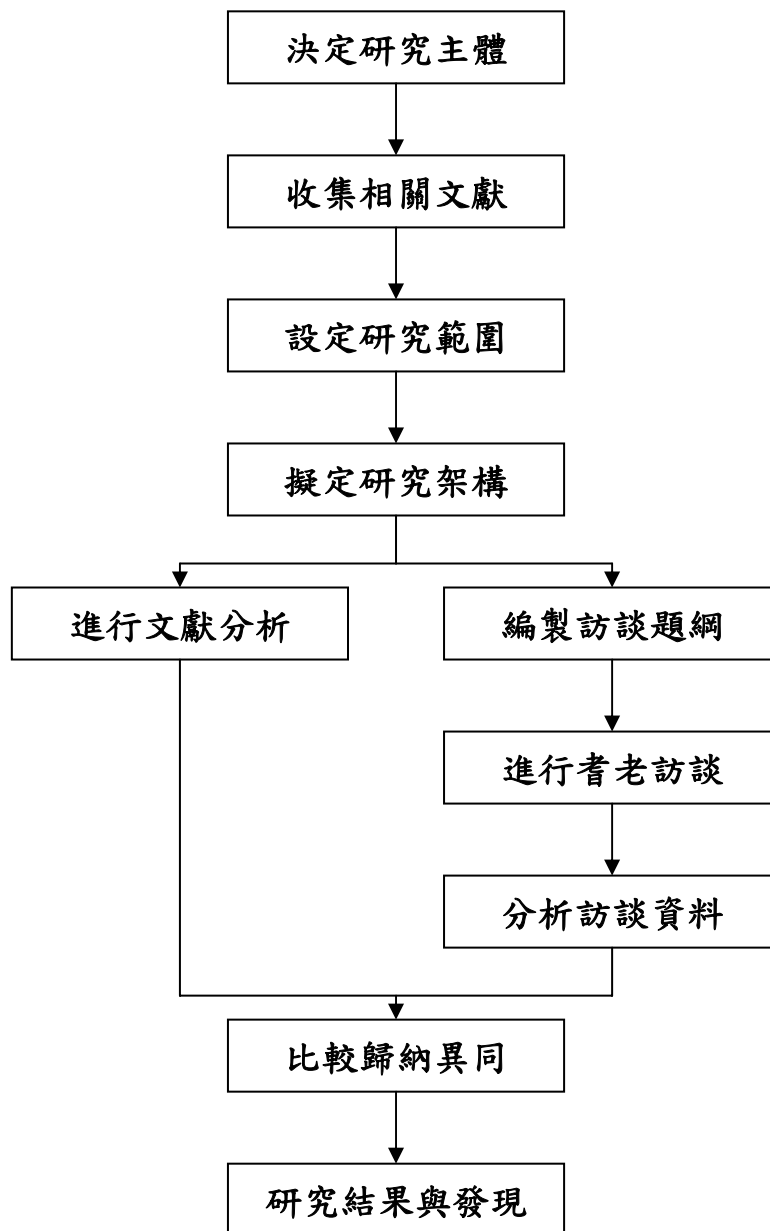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流程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時間的範圍

臺灣之歷史發展從荷蘭、西班牙統治時期開始算起至今約有 400 多年。臺灣歷經不同外來政權統治，也形成臺灣人國家認同之議題。本文針對日本時期（1895-1945）年之間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問題作研究，但由於初期（1895-1918）教育政策不穩定，因此初期教育政策對於臺灣人之國家認同影響有限，故本文更著重於中後期（1919-1945）日本教育政策對臺灣人國家認同之影響。

二、研究內容的範圍

本論文主要在教育政策上，而又以修身教育為主軸，探究修身教育對臺灣人國家認同的形塑與影響。在本論文中，將修身教育分為三層面來探討，包括教科書、學校活動與教師。然而在教科書方面，許多學者對於教科書分期的看法皆不相同（附錄一），因此本研究對於修身教科書的研究範圍係根據周婉窈與許佩賢的分期為主(表 1-1)。

表 1-1 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書之分期

分期	卷一發行年份	書名	卷數
第一期	大正 3 年（1914）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一至卷六
第二期	昭和 3 年（1928）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1930 年以後書名加題「第一種」	卷一至卷六
第三期	昭和 5 年（1930）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第二種	卷一至卷六
第四期	昭和 16 年（1941）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第一種	卷一、卷二
第五期	昭和 17 年（1942）	ヨイコドモ	上、下
	昭和 18 年（1943）	初等科修身	卷一至卷四

資料來源：周婉窈、許佩賢（2003：140），《臺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

三、研究對象的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西元 1923 年後出生（約 85 歲以下）且受過日本教育之臺灣人民，不包含原住民族群。當時日本政府對於原住民也曾採取不少同化政策，但是礙於訪談對象的稀少及人力、時間的缺乏，故原住民部分無法納入一起探究。

貳、研究限制

一、分析材料的限制

在材料分析方面，原預計分析修身教科書，但要取得完整的第一手資料頗為困難。因國民政府登臺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曾推動「破除皇國教育思想」政策，導致日本時期所使用的教科書大都被銷毀。再加上年代久遠，許多資料也隨著歲月而流失，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教科書上有其限制。

此外，本研究也將進行耆老訪談。然而，口述歷史訪談可能會受到近期觀點的影響，而左右了對當時的記憶，因此在早期經驗的詮釋上，可能會有些偏頗。再加上本研究訪談的對象都為高齡的耆老，其記憶的準確度可能需要商榷。關於這部分，本研究將盡量蒐集相關的日記、手札，並輔以文獻作檢證。

二、研究者能力的限制

研究者為日本人，雖然學習過幾年的中文，但畢竟非土生土長之臺灣人，對於閱讀中文文獻仍有限制，因此在文獻不懂之處或較艱深的資料上，即便已請臺灣朋友協助，但仍可能出現文字理解上之出入。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名詞釋義

壹、文獻回顧

本節以前人之相關研究為基礎，整理歸納各學者相關的觀點與論述，藉以確立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重點。以下分三部分針對日本時期國家認同、同化政策與修身之相關研究作為探討分析對象：

一、日治時期國家認同之研究

曾素秋（2002）在《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1895-1945)》

此論文當中以四個階段來研究日治時期的國家認同，包括奠基期（1895~1918）在、臺灣教育令時期（1918~1922）、改正臺灣教育令時期（1922~1941）及國民學校令時期（1941~1945）。其中的奠基期，因日本初統治臺灣，尚未有明確方針，故先以推行日語最為培養國家認同之手段。臺灣教育令時期則大致確立了初等教育的基礎，並採取臺人、日人之雙軌教育制度，此階段的教育目標是以國家主義為出發點，以培養臺灣人為日本國民。改正臺灣教育令時期，主張臺日人共學制度，雙軌教育制度轉變為單軌制度，但臺日人仍有差異存在，此時也因戰爭需求，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除了徹底灌輸國家主義觀念外，也摻有軍國主義，為極端的愛國主義表現。至於國民學校令時期，此階段之國家認同教育仍是以皇民化運動為主軸，藉由國民學校的教育，積極將臺灣人民日本人化。

周婉窈（1997）在《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一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中，透過臺灣公學校「國語」教科書的分析，提出關於近代教育、國家認同與臺灣意識的一些看法。雖然此論文是針對「國語」教科書作分析，但周婉窈認為教科書對於人民國家意識或國家認同養成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當時的教科書具有系統性、普及性與權威性，由總督府發展出一套連貫有系統的知識，且在固定的年齡及所有的學童都需學習，而這套知識背後是由國家或教師所操控，就因為這樣的特性，很自然地將會傳達國家意識給學童，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學童的國家認同。

而周婉窈認為在研究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時，得先了解他們的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之間的問題。他研究中所謂的「國家認同」並不同於英文的「national identity」，因為「nation」基本上指「民族」，但本文的「國家」不同於民族，也就是說可以民族上（民族意義上）不是日本人同時也可以是日本人（國家意義上）。

二、同化政策之研究

祝若穎（2004）在《臺灣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科之德育與同化的取向研究》中指出日本的同化政策上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要將「臺灣人變成真正的

日本人」，而另一種是只要將「臺灣人型塑成柔順、服從的次日本人」，但不論是持哪一種觀點，共同的目的即是要讓臺灣人民成為效忠天皇、忠誠日本的臣民。

蔡錦堂(2001)在《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虛像與假像》一文中提及同化政策基本的內涵是複雜的，首先日本政府統治臺灣時，確立了臺灣的殖民性，再加上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也使得同化政策的推行只是表面功夫，臺灣同化會的被迫解散，也再次證明總督府官員不樂見真正消除臺人、日人間的差異，所謂的同化也無法真正落實。而後田健治郎雖提出了內地延長主義，表面上引進日本法律制度，但實際上卻不然，由臺灣議會運動的失敗可知在法制面前，臺日人之間仍是有差距的，更何況在一切生活、習俗、文化及精神層面。至於皇民化運動的一連串措施，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因應戰爭需求，而非想真正同化臺灣人。

三、有關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科的研究

有關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科，已有部分學者進行研究，如許佩賢(1994)、蔡錦堂(1997)、周婉窈(2001)、曾素秋(2002)、白柳弘幸(2004)、王錦雀(2005)、祝若穎(2005)。但各學者對於修身科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同，所持有的看法也有異，以下為筆者將整理歸納各學者對於修身科書的研究。

表 1-2 各學者研究取向一覽表

作者	年份	研究題目	分析項目	分析對象
許佩賢	1994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	1.從好兒童到好日本人 2.貞淑之德 3.國民精神的涵養	1928《公學校修身科書》
蔡錦堂	1997	日本統治初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	1.国民精神涵養 2.從順 3.誠實 4.勤勞	1913《公學校修身書》

周婉窈	2001	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德目四大綱領 2.其他德目 3.公德教育的內容 4.以日本人為道德楷模 	1928《公學校修身書》
曾素秋	2002	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1895-1945)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教育勸語 2.信仰神道 3.國家制度與國民精神 4.忠君愛國 5.對皇族之稱頌 6.健康有品德的好兒童 	1928《公學校修身書》
白柳弘幸	2004	植民地下臺灣に於ける修身科教育--「公學校修身書」德目分析よ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臺灣独自の忠義德目 2.忠義以外の国民精神 3.尋常小學校修身書と徳目内容の重複 4.公學校の修身書に不採用の徳目 	1913《公學校修身書》、1928《公學校修身書》、1941《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種》、1942《ヨイコモ 上下》《初等科修身》
王錦雀	2005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體系內的公民教育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從好兒童到好日本人 2.貞淑之德 3.國民精神之涵養 	1928《公學校修身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針對各學者之研究做進一步整理分析：

周婉窈（2001）以第二期修身書及時人論著作為分析對象，探討當時日本本土與臺灣修身教育與修身書之異同，並分析公學校修身書的內容體裁與教師的教授方式，再以內容分析方式討論修身教育的四大綱領與其他德目，最後探討當時公學校道德教育的成效與影響。

日本本土修身教育直到明治十四年（1881）才被確立，並列為諸教科之首，並在明治三十七年（1904）才正式發行國定修身教科書，而國定修身教科書各期的內容也反映著日本國家統治意識型態的改變。至於臺灣公學校的修身教育因統治時已是明治二十八年（1895），故修身教育的地位已明顯高於其他教科，而臺灣公學校國定教科書是在大正三年（1914）發行，晚於日本本土約 10 年，可能是因為統治初期教育政策尚不穩定。

在公學校修身書的體裁方面，周婉窈（2001）認為以例話與論述為主。例話大部分在低年級的課文中呈現，而隨著年級的增加，論述的比例也逐步增多，而每一期修身書有關例話與論述的呈現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教授方式上，教師在上修身教育前的說明與引導比課文的研讀更為重要，教師會根據《公學校修身書〈教師用〉》來教授，此教師用書中，會依兒童用書的課文分為目的、教授要領、注意、設問、備考等項目，且年級越高的教師用書內容越豐富。此外，教師的機會教育也是當時主要的教授方式之一。

周婉窈（2001）用德目四大綱領與其他德目來分析公學校修身書的內容，所謂的四大綱領為國民精神之涵養、從順、誠實與勤勞。而其他德目範圍擴及個人、家庭、社會到國家，如克己、反省、孝行、友愛、互助合作、公德、守法、忠君愛國與敬神等等。在公德部分，當時的修身書主要是以消極方式在禁止與勸諫兒童避免做出違反公德之情事。在所有修身書的內容中，多以人物為本位，且主要是以日本人作為道德楷模的人物。

在修身教育的成效上，周婉窈（2001）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取得耆老意見，發現修身科為他們最有印象的科目，也是最喜歡的科目之一，而不少耆老認為修身科是畢業後對做人做事最有用的科目，由此觀點看來，修身教育已達到一定的成效。

王錦雀（2005）《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體系內的公民教育》此書當中主要探討日治時期學校體系及非學校體系內的公民教育實施及分析「修身」和「國語」教科書，探討統治者如何透過學校教育將臺灣人形塑成其所期望的「公民」，並用訪談耆老的方式進一步探討公民教育的成果。

針對「修身」科，王錦雀（2005）從法規的規定分析公學校修身的教授本質，以及追索總督府編纂修身教科書的原則與版本，最後藉由對修身教科書的內容分析，探討總督府對殖民地公民教育實施情況。

王錦雀（2005）分析 1898-1941 年的公學校「修身」科的目標及規定。雖然目標和規定經過幾次修正，但不論如何修訂，臺灣公學校規則的基本原則並無改變，皆是以「教育勅語」為最高指導原則。研究者並比較小學校和公學校「修身」科的目標及規定，發現日本統治者對殖民地兒童主要是希望培養忠貞愛國、敬愛天皇、且具有良好禮儀、儀行和服從性高的公民。但卻對日本兒童卻是培養旺盛的企圖心，以成為在社會上有所作為者；也發現 1941-1945 的國民學校「修身」科的目標及規定明顯地受到皇民化運動的影響。研究者認為臺灣公學校的教育始終都在灌輸「忠君愛國」的皇民思想，而「修身」教科書是達成鍊成皇國民的重要角色。

祝若穎（2005）論文中探討同化教育對公學校修身科的影響後，再進一步的分析公學校修身教科書的德育內涵與同化的取向。以第一期（1913-1927），第二期（1928-1941），第三期（1942-1945）修身書作為分析對象，並用德育原理的角度來分析修身教科書，整合這三期修身書的德育內涵來加以分析。

祝若穎（2005）指出為了達到同化的目的，總督府在修身書上的編撰主要有兩大主軸：灌輸天皇制國家價值觀及忠君愛國思想。其中在灌輸天皇制國家價值觀上的執行最為困難，但也最為重要，因此修身書中的課文以此類文章居多。除了介紹教育勅語、皇室人物外，更利用宗教的同化力量來鞏固並提升天皇的地位。

然而在強制灌輸天皇思想的同時，修身書的內容似乎忽略了自我修身的議題，只強調國家倫理、捨己為公，喪失了修身最終的本意—修善己身。再者，修身書課文中的道德倫理，大多以日本人為道德楷模，也可以看出同化的目的，因道德楷模主要是抽象地將觀念傳達給兒童，因此國籍應無限制，如日本內地的修身書中，即以大量的西洋人物作道德楷模例子；但在臺灣的

修身書中卻集中於日本人的楷模。由此可知，當時不僅要培養兒童的道德感、倫理心，更希望透過這些楷模，來讓臺灣兒童仿效與崇拜。

蔡錦堂(1997)認為1898年總督府法令的「公學校規則」雖然在1905、1907、1912年不斷的修改，但「公學校規則」的主旨仍以「国民タルノ性格」(德育)及「生活ニ必用ナル普通ノ知識技能」(實學)及「国語」的教授為主。換句話說公學校教育目的是國民性格的涵養、國語的熟鍊、修得實業智能。

此外，他認為「修身」和「國語」教科書的編撰主要是為達到公學校教育目的，且跟兒童的精神(mentality)的形成有直接的關係。因此先後分析同時期的「國語」與「修身」教科書。

蔡錦堂(1997)也指出雖然1898年「公學校規則」裡有修身科目的教授，但實際的修身科一週只有一至二小時的授課時間，並且沒有學生用的教科書只能參考的是「教育勅語論」、「臺灣適用作法教授書」。就是早期的修身科是沒有統一的形式，到了1913年才開始編撰國定修身教科書、並在出版完整之後才逐漸有了形式的修身教授。

因此蔡錦堂(1997)以1913出版之後到1922年的新臺灣教育令發布之前在公學校被使用的修身書作為分析對象，將教科書內容分為四項(國民精神的涵養、順從、誠實、勤勞)來進行分析。並且分析教科書出現的人物來探討修身教科書。此研究發現1913出版之後到1922年在公學校使用的修身教科書除了強調學習國語之外，也具有下列特徵。

- (一) 尊敬日本皇室及家族國家倫理的忠孝觀是作為國民精神涵養的主要內容。
- (二) 所謂的「国民タルノ性格」(德育)是尊崇日本皇室之外包括順從、誠實、勤勞等德行作為主要內容。
- (三) 雖然重視忠君愛國，但更重視實用的智能。就是又順從又勤勞的實用的人物的養成是臺灣教育上的重要特徵。
- (四) 對女性的教育是注重於裁縫、家事等家政。

(五) 教科書裡雖然不少有關於臺灣事項，但以地理、產物的介紹及衛生的注意為主，並未出現臺灣歷史、傳統文化和習俗。

曾素秋(2002)以第三期修身書作為分析對象，採用質性描述的方式對修身科教科書內容進行分析。研究者把第三期修身書分為六個主題(教育勅語、信仰神道、國家制度與國民精神、忠君愛國、對皇族之稱頌、健康有品德的好兒童)探討國家認同之意涵。這六個主題的課程都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臺灣人民對日本政府的國家認同。

白柳弘幸(2004)則綜合第三、四、五期修身書作比較分析。他亦指出修身書主要是由人物主義與德目主義所構成，但研究者在此篇文章中，只採用德目主義進行分析比較，至於人物主義則沒有多加論述。

白柳弘幸(2004)分析德目中發現第三期和第四期較重視家庭與個人；第五期則著重在國民精神。年級越低是以家庭和個人為主要學習內容，而隨著年級的增加，關於國民精神的內容比例也隨之增多。

由上述分析可知，有關公學校修身教育的研究不少，而各學者多以修身教科書著手，認為修身教科書對臺灣兒童道德涵養、國民精神的培養是最直接，且最具影響性的。

貳、名詞釋義

一、修身教育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小學教育中的道德(倫理)教育稱為「修身」。修身一詞來自中國經典《大學》「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顯地是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周婉窈，2001：4)。修身教育主要實行於初等教育階段，頗類似以往的生活與倫理，自從明治五年(1872)發佈「小學教則」，就明文規定，修身需置於各科之中。到了明治十四年(1881)更在「小學教則綱要」中明訂修身在各教科之上，直到日本戰敗，修身一直居於各科之首。

修身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首先出現在臺灣的公學校中，一開始修身就在公學校佔有首席之位，到了1941年，公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修身仍

為教授科目之一，與國語、國史、地理合併為國民科。雖然明文規定修身的教授時間不多，但修身教育卻是無時無刻在公學校中實施著，如教師的以身作則、日常生活習慣的養成等等。本文研究的修身教育泛指日治時期在臺灣公學校及國民學校實施的道德教育。

二、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的定義相當多元，不同學者的主張亦相異。有學者指出國家認同可界定為「公民對其所屬政治共同體主動的認同 (willing identification)」，由之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地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難時願意犧牲自我」(蕭高彥，1997：4)。而有學者則認為國家認同是指個人對國家的確認與歸屬(江宜樺，1997：96-99)。而國家認同的英文「nation identity」中的「nation」亦有「民族」之意，因此有些學者也將國家認同視為民族認同(吳乃德，1997)。本文所稱之國家認同主要是針對國家層面而非民族層面。本研究所指的國家認同係日治時期臺灣人是否能確認自己為屬於哪一個國家？以及所認同的這個國家又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三、同化政策

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一詞的定義與手段等，常隨著時代背景、世界殖民思潮、殖民母國立場、殖民政策學者認知、殖民地現場執行官僚思考角度、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利害關係等產生變化(蔡錦堂，2001：1)。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施行的「同化政策」與歐美殖民地中的「assimilation」的實際內容、特徵並非完全契合(陳培豐，2006：18)。本文的同化政策係指日本總督府為了消除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差異感、特殊感所推行的各項政策，包括殖民方針、教育政策、社會教化政策等等。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最早明確指出同化政策為「治臺方針」，是在1919年明石原二郎擔任總督時提出，他指出「夫臺灣之施政，在於感化島民，使漸具有日本國民之資性，是為本總督統治之目的」(轉引自吳文星，1979：40-41)，緊接著的田健治郎總督也表明「將以教化臺灣人使成為純正日本人為大方針」。1931年的大田政弘總督與1932年的中川健藏總督亦延續同化

政策，以一視同仁、日臺人融合為治臺目標。

第五節 論文章節配當

本研究之論文在第一章緒論部分，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在本研究中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並且界定研究範圍，也說明本研究遇到的限制。此外，針對本研究重要的名詞作釋義，最後將對本研究相關的研究作一文獻回顧。

在第二章部分，主要說明日本政府殖民政策與教育政策的關係。此部分將分成三階段探討，包括無方針及漸進主義(1895-1919)、大正民主及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1937)與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1945)，瞭解此三階段教育政策的差異與影響。

第三章則是以修身教育對於臺灣人民國家認同的型塑與影響為主要探究內容。會先說明國家認同的概念與重要性，緊接著由教科書、教師、學校活動三方面來瞭解修身課程的內容，最後分析修身課程對於臺灣人民國家認同的型塑與影響。

第四章將分析耆老的訪談內容，瞭解身處於當時的庶民對於日本教育政策的瞭解與感想。此外，也透過訪談分析來探究修身課程與國家認同之關係。

最後的第五章，會將訪談分析結果與文獻對比整理，發現其中之異同，並對之後的研究者作一建議。

第二章 日治時期殖民政策與教育政策之變遷

要從修身教育來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的人民國家認同，必須先瞭解總督府在臺灣的教育政策；而要瞭解當時的教育政策，就要先對總督府的統治方針作一探究，因為當時擔任在臺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與日本文部省大臣森有禮都認為教育必須配合國家的需要（鶴見，1977）。所以總督府的教育政策配合統治者的施政方針。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主要統治方針大致分為三階段，而教育政策也隨著統治方針的改變而有所調整。此三階段劃分時期及政策內容如下：

一、綏撫時期—無方針及漸進主義時期（1895~1918）：

由於日本缺乏統治殖民地的經驗，也對殖民地統治沒有做好準備。因此總督府採取無方針主義，並且依照實地需要而作隨機應變的漸進主義，有著走一步算一步的打算。而此時期的教育政策主要有推行國語(日語)教育（1896）、頒佈「教育敕語」（1897）與頒佈「臺灣公學校令」（1898）、「臺灣公學校規則」（1898）。這一階段，總督府對於臺灣的教育並無明確的方針與根本政策，因此此階段又可稱為教育實驗期。

二、文治時期—大正民主及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1937）：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覺風氣盛行，當時的總督府深知這股風氣可能帶來危機，因而不得不改變對臺灣的統治方針，於是從無方針及漸進主義轉而民主主義及內地延長主義。教育政策也有所調整，此階段的重要教育政策有頒佈「臺灣教育令」（1919）、發佈「新臺灣教育令」（1922）以及臺日共學化政策（1922）。這個時期建立了完整的臺灣各級教育機關系統，也確立了臺灣的教育制度，此階段又可稱為教育進展期。

三、皇民化時期—軍國主義與皇民化運動（1938~1945）：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因應長期作戰及取得國防資源，日本治臺政策進入皇民化政策時期，期望臺灣人民成為效忠日本天皇的國民。此

時的教育政策主要有公布「國民學校令」(1941)、廢除雙軌初等教育制度(1941)及實施六年制國民義務教育(1943)。而由於此階段的教育主要目的是為了落實皇民化政策，因而又可稱為教育強化期。

表 2-1 日本治臺政策及教育政策之演變

時間	治臺政策	重要教育政策
1895~1918	無方針主義 漸進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推行國語教育(1896) • 頒佈教育勅語(1897) • 公布臺灣公學校令(1898) • 頒佈臺灣公學校規則(1898)
1919~1937	大正民主 內地延長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頒佈臺灣教育令(1919) • 發佈新臺灣教育令(1922) • 推動臺日共學化政策(1922)
1938~1945	皇民化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公布國民學校令(1941) • 實施六年制國民義務教育(19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節 綏撫時期—無方針及漸進主義(1895~1918)

壹、治臺政策之形成背景

1895年滿清在甲午戰爭戰敗，與日簽訂馬關條約，約中決定了將臺灣、澎湖割讓予日本，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殖民宗主國，臺灣則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接收臺灣時，面臨了臺灣人民強烈的抵抗，先有臺灣民主國的抗日，接著是一連串游擊抗日事件，臺灣總督府遂用武力鎮壓抗日運動。

日本沒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因此對於臺灣的定位也無明確方向，當時有人提議要比照明治時代才納入日本領土的北海道與琉球，將臺灣定位為普通行政區，由中央直接管理。也有人提倡另建立殖民地政府，讓殖民地擁有部分彈性的自主權。但當時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水野遵指出「臺灣歸帝國版

圖為時不久，尚屬草創時期，而且動輒有匪徒蜂起之虞。臺灣距首都東京遙遠，交通亦不方便。加以島民之人情、風俗習慣迥異於日本，若施行與日本國內一致之法令，統治上不得其宜。故必須順應時地，頒佈適宜之法制。」（轉引自王錦雀，2002：139）。

最後由於臺灣秩序不穩、與日本本土距離遙遠、風土民情也與日本本土迥然不同等原因，使日本政府決定給予在臺將領廣泛的權力來治理臺灣，日本國會制訂了與日本憲法完全不同的「六三法」（法律第六十三號）。將立法權授與臺灣總督，臺灣不受日本憲法的約束，總督府的措施也不受國會的監督，直接對天皇負責，並接受中央主管機關的監督與指示（廖宜方，2004），至此，臺灣殖民地的地位完全確立。

貳、治臺政策之確立

統治臺灣初期，關於如何統治臺灣，日本社會也出現了約三種的主張，包括同化主義、放任主義與放逐主義（吳文星，1996）。1895年4月20日的《時事新報》中的社論即提及（轉引自楊素霞 2006：128）：

……吾輩認為，要把從敵國所得到的新土地加入並成為日本永久的新版圖，有兩個方案。唯有取其地，豐富其地的資源，不用太在意當地人民的去留，同時催促我國民移居，讓多數的日本人居住至此，建立純然的新日本國；還是，不僅把從以前就居住於此的支那人同化為日本人，且漸漸地把同化他們的方法變得更容易，讓他們繁殖支那人種，政府只要掌握地方政治的權柄，至於其他的人事則盡可能依照舊俗，不要忤逆民心……。

而在8月11日的社論中先談及英國在印度及美加地區的殖民經驗，認為日本統治臺灣應效法英國在美加地區的作法，驅逐當地居民。（轉引自楊素霞 2006：129）：

……完全摒棄土人，所有農工商事業皆交到文明人手中經營，徹底

把土地文明化。正如北美共和國和加拿大般，現在雖為不折不扣的文明國，但追根究底來說原本是蠻民的巢穴，而之所以會有今日的模样，是因為其白人祖先把土著的蠻民驅逐出境，自行經營的結果。……臺灣處分方法為倣效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拓美洲大陸的作法，把無知蒙昧的蠻民（指漢人）逐出境外，殖產上一切的權力全部由日本人掌握，斷然使全土地日本化……。

由上述兩段文獻中可知，當時日本政府對臺灣的土地及產業較具有野心，主要是想從經濟層面獲利。相對地，在統治臺灣人民層面上就顯得不是那麼在乎。而經過了社會朝野的討論，最後認為不論是「放任主義」將漢人驅逐出臺灣或是用「同化主義」掌握臺灣地方政治，可能會引起臺灣人民的反彈，且難以獲得成效，於是決定以同化為統治臺灣的目標，暫採「放任主義」政策來統治臺灣。

在 1895~1918 年間，由於抗日事件層出不窮，臺灣總督皆由武官擔任，包括了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及明石元二郎。最初的幾任總督對於臺灣秩序的穩定是採取全面武力鎮壓，在風俗習慣上則採放任態度來安撫民心，可說是以漸進方式來同化臺灣人。乃木希典總督曾在《關於臺灣總督乃木將軍統治之意見書》中發表：

……統治方針，當從急治、漸化兩者，選定其一，致力實行之。急治政策，果能收其效，雖足以炫要人目，無如徵諸實際，其成功至難。……漸化政策，雖無神速之效，而其事順行易，其利多害少，故撫御臺灣，應採漸化方針，俾新附之民，終能涵養忠實之日本臣民，以其萬全（井出季和太，2003：262）。

面對抗日份子，用軍隊警察作武力鎮壓，來維持社會秩序，從樺山資紀開始實行軍政，到了乃木希典繼任，改採「三段警備法」。而對於臺灣人民舊有的宗教、風俗、文化習慣，就如同乃木希典的施政方針一般（井出季和太，2003：247）：

內地（指日本）法規雖宜逐漸施於臺灣，然因人情風俗語言不同，若撤消彼此之區別，而繩之以同一法規，則不但難免彼此衝突，且不能達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目的，故應隨著地方行政之推行，調查各地人情風俗語言之異同，其法規之不適合者，以敕令或律令訂定特殊規程，以其達成法規之目的。

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統治期間（1898~1906），可說是創業兼守成時期。由於當時兒玉源太郎身兼數職，日俄戰爭爆發後，更是無暇在臺灣的統治上，因此實際上都是後藤新平在管理臺灣。後藤新平是習醫之人，他用生物學的觀點來治理臺灣（鶴見祐輔，2005），他指出：

比目魚的眼睛不能改變成鯛魚的眼睛。鯛魚的眼睛在頭的兩邊，而比目魚的眼睛則在頭的一邊。但也不能因為比目魚的眼睛奇怪而要把它的眼睛像鯛魚那樣改裝在頭的兩邊。比目魚的兩隻眼睛長在一邊是有生物學的必要性，說魚的眼睛應該在頭的兩邊也不可能的。這一點在政治上也是一樣重要。……社會習慣，制度等是因為永久的必要性和相當的理由而產生的。不考慮這些習慣和制度在未開國的地方實施文明國的制度是可以說文明的逆政。不可以這樣。……所以本人在統治臺灣時，首先把該島的舊慣制度好好做了一番科學調查，然後順應民情施政。不了解這道理而想把日本國內的法制輸入臺灣實施的那些傢伙，也就是等於要把比目魚的眼睛突然改變成鯛魚的眼睛，根本是不懂真正政治的傢伙！

根據這樣的理念，後藤新平開始著手進行對臺灣資源、人口、產業、風俗習慣等的科學調查活動，認為要瞭解臺灣的一切才能針對問題提出因應之道，並制訂適合臺灣的政策，這個原則被稱為「生物學原則」。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

畢竟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最重要的就是要獲取臺灣的經濟資源，基於此項目的，後藤新平在臺灣積極從事經濟建設，首先完成了人口、土地、

林野等調查，瞭解臺灣的資源以便充分運用；其次，進行了貨幣與度量衡的統一，穩定了市場經濟；再者，專賣制度的建立，也增加了總督府的收入；港口、鐵路、公路、郵政、電信等交通建設的積極興建，目的為了使經濟更為流通；製糖業的發展，也讓總督府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在後藤新平的治理下，不但使臺灣財政得以自立，不再依靠日本，也為推動了臺灣的現代化，而這些都是為總督府治臺奠定了厚實的基礎（王錦雀，2002）。

然而在這段期間仍有不少臺灣人民會發起抗日行動，針對這些抗日份子，後藤新平認為之前皆用武力鎮壓，反而反抗越激烈，故提出了「鞭子與糖果」的理論，一面用武力馴服抗日的「土匪」，頒佈「匪徒刑罰令」：一方面又用懷柔的方式招降，頒佈「匪徒招降策」，當犯罪者向官府自首時，可以減輕或減免其罪刑，且免刑時加以五年以下的監視予以獎勵投降，對投降者除赦免其罪外，又給與更生資金及工作。在這樣雙管齊下之下，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的消除在此階段收到良好的成效。此外，後藤新平在穩定社會秩序上推動「保甲制度」與「壯丁團」作為輔助警察的機構，此方式除了可以維持社會秩序外，亦可以拉攏人心。

後藤新平不施以極端的同化主義或破壞主義，而是尊重臺人之風俗習慣及社會組織。至此，治臺的統治方針採取順應現實需要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與「漸進主義」（吳文星，1996）。而後的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及明石元二郎總督也都遵循此一原則來統治臺灣，一面採武力鎮壓來肅清反抗聲浪；一面用柔性尊重的方式來籠絡人心。而雖然此階段是採取無方針與漸進原則，不過仍是以同化為目的在治理臺灣，誠如明石元二郎總督所言（井出季和太，2003：595）：

夫臺灣施政，在乎感化島民，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是為本總督統治之目標。……日臺人士應互相和協，共興臺灣文物，使臺民與我同心，是為主要統治目的。由於風俗言語之相異，所生之障礙，須予以打破，以其到達融合結合之順境。

參、教育政策之確立

教育政策的原則與措施與施政治理息息相關，從 1895 至 1919 年間，日本的對臺政策是以「無方針」與「漸進」主義治理臺灣，最終是要達到同化目的，而此時期的教育政策，也是朝這方向在進行。兒玉源太郎總督明白指出對於落實臺灣的教育是採取漸進主義政策，他在地方長官會議訓詞中說道：「教育雖一日不可怠忽，為漫然注入新文明，養成追逐權利義務之風氣，則新附民難免有陷於不測之虞，因此教育方針必須十分考究。……將來與其徒然偏向積極方針而誤了潮流，不如確實地採取漸進主義，方為卓見（吳文星，1979）。」後藤新平也曾在學事諮詢會議上提到（井出季和太，2003：320）：

近日有人問及當局之教育大方針，未知所謂大方針究何所指，在本人尚未樹立任何大方針者，關於治臺方針，本人對總督尚無具體建議，置於教育方針，實未預先立定，惟因時制宜行之而已。世界列強，在其佔領領土以前，皆有五十年或十年之準備工作；而日本佔領臺灣事前並無任何準備。日本人之大部分，對於殖民地，或新版圖之統治，毫無經驗……，夫欲確立方針，需先有多大之準備，倘無此項準備，實難以確立其方針……。關於教育問題之研究，殊非易事，至教育之重要，自無疑義。年來已試辦公學校，而將由此漸進共步武，至於教育教育方針如何，則尚在研討之中……。

日本治理臺灣之時，教育政策必須配合政治需要，因此教育政策上仍是屬於「無方針」與「漸進」主義，必須先透過實驗時期，經過縝密的思考與研究才能確立方針。而在這段實驗時期，總督府對於臺灣的教育政策仍具有「混合式的同化教育」、「推動國（日）語教育」、「差別的教育制度」等特色：

一、混合式的同化教育

日領初期對臺的教育措施，與伊澤修二的理念息息相關。伊澤修二曾經

對樺山資紀提出統治臺灣應從教育開始著手（顏義芳，2006）。當總督府舉行始政式的隔日，伊澤修二便以代理學務部長的身份在臺北推動教育工作。由於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對於殖民地的教育，伊澤修二向法國與英國諮詢，當時法國原本在印度尼西亞推行法語與法國式的教育政策，卻因為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而失敗；英國政府則主張絕對不可以對殖民地施以完整的教育，否則可能會培養出反抗殖民母國的異議份子；且佔領殖民地的目的最主要是要控制其經濟資源，因此在教育上採取愚民政策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但伊澤修二評估了臺灣的狀況，認為不論是法國將宗主國的語言文化強行輸入或是英國只顧經濟利益而忽略殖民地教育的作法都不適合臺灣。他指出臺灣人與日本人幾乎為同人種，雖然語言不同，但卻也有類似的文字（漢文）基礎，也有佛教信仰，且臺日人的智德幾乎相同（川路祥代，2001）。因此主張「融合主義」，希望能藉由彼此混合融合的手段，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同化成一國（顏義芳，2006）。

如何能讓彼此同化成一國，語言是很關鍵的橋樑，因此，伊澤修二也積極推動語言（日語）教育，也希望日本人能學習臺灣當地語言，以便進行溝通，且對臺灣人的孔孟文化、宗教信仰則予以尊重。伊澤修二主要在臺灣推動的教育措施有四：一為讓日本人學習臺灣語言，臺灣人學習日語，以便溝通思想意念；二為尊重孔廟，不急著破壞原有的科舉措施，要尊重臺灣本土文化，仍教授漢文課程；三為優待西洋傳教活動，邀請日本宗教家（神道或佛教）來臺宣揚教義，以教化人心；四為要深入考察臺灣之鄉土民情，逐漸以教育醇化之（徐南號，1996）。

而伊澤修二混合式的同化教育，主要可從語言與精神方面來看。在語言方面，臺灣人受清朝統治九十一年，漢文是主要文字，而傳統書房是學習漢文的主要場所。日本治臺之初，臺灣人對於日本人尚有芥蒂與懷疑，甚少主動將孩子送去學習日語，為了吸引更多臺灣學生就讀國語傳習所，伊澤修二

聘請書房教師前來教授漢文，內容主要有四書、三字經、孝經等等；此外，為了要拉攏人心，也不敢斷然撤除傳統書院，於是用增設日語課程，派日人教師教授日語及編印新漢文教科書等方式來改革書院（吳文星，1987）。

日語與漢文並存於學校的狀況，直到 1912 年修正臺灣公學校教育課程時，才慢慢調整授課時數，並且加強對書房的控制，因為書房象徵著傳統漢民族的文化，這與總督府以同化為目標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馳（曾素秋，2002）。

在精神方面的混合式同化主義，可從國體論與儒學文化的混合中看出端倪（祝若穎，2005）。伊澤修二是屬於國家主義教育者，鼓吹忠君愛國思想，既然要將臺灣人民同化，則必須讓臺灣人民對日本帝國、天皇效忠。因此除了推動日語教育，伊澤修二也主張頒佈「教育勅語」來養成臺灣人的國民精神，但因治臺初期，反日意識高漲，為了避免臺灣人的反彈，伊澤來臺後，並無馬上灌輸臺灣人民「教育勅語」，而是到了 1897 年，才在乃木希典總督任內，發佈「教育勅語」的漢譯文。伊澤企圖利用「教育勅語」來同化臺灣人民，主要原因是「教育勅語」存有濃厚的國體論意識，這正好符合伊澤的理念；再者，「教育勅語」帶有儒學思想的色彩，這可能能籠絡臺灣人。「教育勅語」的內容許多都含有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也講求五倫關係、忠孝之道……，這些都與臺灣人民的傳統教育息息相關，加上再用漢文翻譯，臺灣民眾的接受度可能會比較高。但「教育勅語」還是以國體論為主體，最終是要培養臺灣人民效忠日本天皇，因此「教育勅語」可說是國體論與儒家文化的結合，是種混合式的同化教育。

日本對臺灣的教育政策為達到同化目的，一方面以「無方針」、「漸進式」的原則循序漸進，避免臺灣人民過度的反感；一方面則以「混合式同化」來教育臺灣民眾。日領初期的教育政策可說是以伊澤修二的教育理念出發，到了兒玉總督與後藤新平時，伊澤修二的教育理念大部分已被實現。

二、推動國（日）語教育

「國語」本是指該國流通的語言，但用在被殖民的地區之下即含有意識型態與政治意圖（陳虹文，2001）。如同要把臺灣人所認為的國語，從使用「中國的語言」變成使用「日本的語言」，在轉化的過程中，即摻有政治意識型態的意味。臺灣是日本的新領土，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卻未參加過日本帝國形成的過程，只是因中國戰爭失敗而被佔領，因此面對臺灣的殖民時，如何讓臺灣人民認同日本，語言成為重要的工具，語言能溝通，溝通之後才可能進行國家意識型態的灌輸，並且便於管理與統治，因此總督府來臺後，便積極從事國語教育。

在樺山資紀尚未來臺前，伊澤修二便對他提出了殖民地教育計畫，伊澤修二對臺灣的教育計畫分為「應急事業」與「永久事業」。兩者都需充分的提供國語教師。「應急事業」主要是訓練日本人與臺灣人成為國語教師，並同時教授臺灣人日語。而「永久事業」則是開辦國語學校與師範學校（鶴見，1977）。

伊澤修二最初在士林芝山岩開啟了教育事業，雖然爆發了教職員被殺害的慘事，伊澤修二仍持續在臺的教育工作。1896年3月公布了「臺灣直轄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國語學校與國語傳習所為直轄學校，又規定設置附屬學校。同年5月，又在全臺主要城市設立十四所國語傳習所。國語傳習所主要目的是「向士人傳習現行國語，以為地方行政設施的準備，並為教育的基礎（矢內原忠雄，2003：97）。」

桂太郎、乃木希典擔任總督期間，由於日本政府因財政問題刪減臺灣總督府的補助，使得預算大部分花在稅吏、獄官及警察身上，教育預算則少之又少，伊澤修二的教育措施無法實現，最後辭去了學務部長之職。此兩任總督在沒有充足的教育經費下，對於教育的貢獻相對地少，但仍在各地增設國語學校與國語傳習所。

桂太郎的施政方針中強調：「在地人民之教育，不可一日忽視之，應使

學習國語，主動養成日本之觀念。……而目下之教育方針，與其研究方法，不如以著重推廣教育為宗旨……（井出季和太，2003：248）。」而在他任內所公布的「國語傳習所規則」中也表示國語傳習所為對本省人教授日語，以資其日常生活，且以灌輸日本國民精神為主旨。桂太郎推廣國語傳習所，希望臺灣人透過學習日文以培養日本精神。

然而在後藤新平時，國語傳習所有了重大改變。1898 年公布「臺灣公學校令」，將國語傳習所擴大發展成「公學校」，成為臺灣人初等教育的機關。公學校設置的主要目的為「對本島人的子弟施以德教，授以實學，以使其養成國民的性格及精通國語為宗旨（臺灣教育會編，1939：229）。」後藤在 1901 年的學事諮詢會議席上，也強調推行國語教育的重要性（井出季和太，2003：320）：

而公學校乃定有目的而設立者，其目的即推行國語目的是也。待至此目的達成之日，教育方針經過研討，自能確立矣……要之教育開始，臺灣教育始終一貫在乎國語之推行耳。……臺灣教育即用國語教授，公學校以國語為強制科目，此制度絕不予以改變。以推行國語為殖民地教育之基礎工作者，其理由為：（一）臺灣語言有閩南語與廣東語之別，而閩南語之中又分為漳泉二系，番人之間又隨其種族而異其語言。臺灣無統一標準語言，以為思想交通之媒介，而標準語言之採行，與其使用文化落後之地方語言，不如使用文化發達之國語為有益，不但使臺灣各民族相互交通，得其方便，也對治者與被治者間，亦為至便。（二）為使文化發達之一手段，宜推行國語教育。（三）為同化之一手段，需要如是，欲改移在地人民之思想、風俗、習慣等，使與日本人一致，需以推行日語為捷徑。

由上述可知，後藤新平認為推行國語有三項重要功能：溝通、促使文化發達及實行同化。溝通只是最基礎的，同化才是最終目標。先以普及日文為開端，進一步再讓臺灣的風俗習慣、文化思想能與日本一致。總括來說，國

語的推行只是同化的一種手段，而這個手段從日本治理臺灣之初到最後都一直在落實。

之後的佐久間左馬太與安東美貞總督的教育政策是奠基在兒玉源太郎建立之上。此時期的公學校不論是在質或量都呈現穩定的成長（王錦雀，2002），這也顯示接受國語教育的臺灣人日趨增多。

三、差別的教育制度

除了為臺灣人普設公學校外，隨著日人來臺人數的增多，總督府也針對來臺日人的初等教育作一規劃。1897年首先在臺北設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僅收日本學童，此為小學校的前身。1898年8月公布「臺灣公立小學校規則」，在臺北、基隆、新竹、臺南四地設置小學校，隔年3月又分別在臺中、滬尾、宜蘭設置。小學校與公學校的最大不同是：「常用國（日）語者的初等普通教育，依據小學校令。」意即入學資格限制在擁有日本國籍之學童或精通國語之臺灣學童，但真正進入小學者多為前者。小學校教授的科目、師資與例假日，除了部分需因應臺灣風俗文化的而調整，大部分都與日本內地相同，而反觀於臺灣人的公學校，其程度遠遠低於小學校的學童，此時期的教育政策也呈現差別待遇的特色。

日本在領臺初期的教育政策是採取無方針的放任主義，普及國語為最優先工作。此時期的教育政策並無一完整詳細的規劃，就如同治臺政策一般，是可以隨時因應需要而作改變的。而此階段最重要的教育目的透過教育的力量將臺灣人同化成能順從日本帝國之臣民，教育是培養臺灣人國民性格的柔性手段。而為了達到此目的，總督府進行的教育措施即為推行國（日）語教育及頒佈「教育勅語」，因為只有語言的同化，才能進一步達到文化、民族、國家的同化，就如同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談及：「普及日語是要供行政推行同化之便作準備，但避免以同化作為教育之方針，以免引起反感（周憲文譯，2003：181）。」而藉著教育勅語也灌輸臺灣人民大日本帝國的道德規範、國民精神，而此道德規範、國民精神又與儒家文化相重疊，

降低了臺灣人民對日人的反感，這也是為了使臺灣人盡快同化成日本人的方式之一。此外，此階段的初等教育分為雙軌的制度，即公學校與小學校並行。

第二節 文治時期—大正民主與內地延長主義（1919~1937）

壹、治臺政策之形成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日本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更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然而當時勞工、農民及薪水階級的生活待遇並未獲得合理的改善，於是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不斷。當時的政治家吉野作造提倡民主主義，而他的思想也影響了日本當地的知識份子及在日本求學的臺灣知識份子。在此時，有不少日本學者對於臺灣被視為殖民地的處境感到同情，紛紛對總督府表達不滿的意見。而臺灣的知識子除了受到日本民主思潮的影響外，1917年列寧領導蘇聯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並向外輸出革命，鼓舞了其他國家處於貧窮、低下階層的農工階級，合作推翻政府。臺灣的知識份子也深受影響，對於總督府不合理的統治也漸漸從武裝對抗轉而溫和的政治社會運動，盼能改善臺灣人民的政治環境，如1914年的臺灣同化會，就是板桓退助伯爵與臺灣知識份子林獻堂、蔡培火等人一起為臺灣人民發聲，希望臺灣人能享有與日本人一樣的權利及待遇（王錦雀，2002）。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大力提倡「民族自決」，這股思潮影響到世界各地，許多被列強欺凌或殖民的地區，紛紛興起民族復興或民族獨立運動，如朝鮮的三一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及印度的獨立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加上大正民主的思潮，使得臺灣知識份子越來越能爭取自我的權益，而局勢的轉變，也促使總督府不得不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作一調整。

貳、治臺政策之確立

由於日本統治臺灣之初，沒有一明確的統治政策藍圖，因此日本殖民學者東鄉實等人在1916年建議臺灣總督府應該確立統治異民族的根本政策，可排除因民族自決而造成的政治不安，使臺灣的統治更為穩固（吳文星，

1996)。又加上大時代的變動，日本面臨新的威脅，促使總督府從無方針主義、消極的同化主義轉變成內地延長主義及積極的同化主義。

日本首先改革臺灣的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並解除了總督的軍事權。當時的原敬內閣深具同化理念，提出了「內地延長主義」的概念，認為日本與臺灣的人種、文化可以相互同化，殖民地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並直接適用本國法律。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為田健治郎，他於治臺前曾向當時的原敬內閣陳述其統治意見以教化臺灣人，使其完全與日本同化為統治方針。針對此一理念，原敬內閣也深表贊同。隨後，田總督至臺後也發表了其治臺方針（井出季和太，2003：622）：

……夫臺灣，構成日本之一部領土，雖然屬日本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不能視同英法各國之以殖民地祇為其本國政治之策源地，或經濟上之利源地而論。因此，統治方針皆以此大精神為前提，作種種經營設施，使臺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對於地勢、民情、語言、風俗相異之臺灣民眾，如遽以實行與內地同一法律制度，勢必齟齬杆格，反招苦惱。必先致力推行教育，一面啟發其知能、德操，一面使知我朝廷撫民精神與一視同仁之聖旨，而予淳化融合。與內地人在社會上接觸無任何徑庭，結局需為教化善導，使其到達政治上均等地步……。

由田總督的施政方針可知，此時將臺灣視為日本領土的一部份，而非異於日本的殖民地，因此統治上不能再實行兩套不同的標準，臺灣人必須成為日本人。此外，田總督的施政方針也透露總督府對於教育的重視，認為要達到日、臺人一視同仁必須先透過教育教化臺人，才得以進一步促進日、臺人政治上的平等。田總督提出政治上的平等，實際上也在安撫蠢蠢欲動的臺灣知識份子，他提及：「現在世界的兵禍方熄，雖然看到和平的曙光，但思潮動搖殊甚，歐美列國都在多事之秋，大勢所趨，影響不免……，但勉隨時勢

之推移，妥予取捨，期能保持社會的安寧秩序，為目前之一大要件。」，可見田總督也需處理民族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抬頭（井出季和太，2003）。

在內地延長主義的原則下，總督府推行了許多措施，如臺灣的法律原以六三法（1896~1906）、三一法（1907~1921）為原則，此兩法皆授以總督相當高的權限。而為了推動內地延長主義，1922年開始實施法三號，原則上，臺灣施以日本國內相同的法律，只有少數特殊的事情，承認律令權，到了1923年民事與刑事也開始同化了。不過總督府對於臺灣知識份子提出的地方自治要求，卻沒有做到同化，因為許多地方上的官吏仍為官吏命令，並非公選，相對於日本，不論是中央或地方已經實行立憲代議制度、普通選舉。因此，總督雖然不斷提出內地延長、一視同仁，實際上，在政治上卻將此原則摒除在外，並無徹底實行。

繼田總督之後的內田嘉吉總督因當時東京發生大地震，全國處於救災的情況中，因此針對臺灣的施政方針，內田總督決定以前任總督為基礎，再發揚其精華，他發表：「……臺灣統治方針，夙已確立，有儼然不動者。歷代總督皆據此善為設施，官民上下，協新戮力，以謀文化之發達，最屬顯然之事實。最近在上任總督時代，釐革地方制度，設置評議會，實施民法商法等，從來面目以一新。繼此善為特守，隨從時代之推移，雖常有所伸縮，唯期不失墜前賢遺緒，進而更為發揚之精華也（井出季和太，2003：708）。」伊澤多喜男總督上任時，並無具體說明制度上的施政方針，只是表明日本與臺灣「共存共榮」的理念（矢內原忠雄，1999）。上山滿之進總督也以「民族融合」為統治臺灣的要訣。總括來說，自田總督以降的八任文官總督，皆強調實行日、臺融合的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為其統治方針，臺灣具有的特殊性也逐漸淡化，並提倡尊重教育、文治政治、民族融合，這也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期日本統治臺灣的基本政策。

參、教育政策之確立

一、臺灣教育令

為因應世界民族自決、反帝國主義的潮流，總督府的治臺方針轉向「內地延長主義」，主要著重在積極地同化，而在教育上也做了一些調整。1919年，明石元二郎總督頒佈了「臺灣教育令」，可說是臺灣教育制度化的開始。

1919年臺灣教育令的頒佈，主要背景約有下列幾項：首先，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擊敗俄國，使得日本國際地位提高，也讓臺灣人民瞭解到要回歸中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既然如此就認命順從的當日本人，並主動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因此在這段期間，公學校與就學人數不斷攀升（杜武志，1997）。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的蓬勃發展影響了臺灣，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在這股潮流下，也開始興起了自覺意識，如林獻堂等人指出臺灣教育的不完備與不公平，更發起了私立中學設立運動，也促使總督府開始著手進行完備的臺灣教育制度。再者，為了因應臺灣經濟的資本化及高度生產，原本的教育不能滿足臺灣人的需求，故需提高普通教育與技術教育；最後，由於在臺日本人的子弟人數增加，總督府認為有設置高等教育的必要。（矢內原忠雄，1999）。

臺灣教育令的內容共六章三十二條，在第一章的基本的總則就大致建立臺灣人的學制及教育目標（杜武志，1997）：

第一條 在臺灣之臺灣人，其教育需依照本令。

第二條 教育依教育勅語之旨趣，以培養忠誠良民為主旨。

第三條 教育應適合時勢與人民的需求。

第四條 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與師範教育。

可見臺灣教育令仍舊以教育勅語的精神為出發點，各階段的教育最終目的是將臺灣人教育成為「具備帝國臣民應具資質與品性」，如普通教育「以留意身體之發育，實施德育，教授普通之知識技能，涵養國民之性格，而普

及教育為目的」；實業教育「以教授農業、工業、商業及其他實業有關之知識技能，並培養德行為目的」；專科教育「以教授高等之學術技藝為目的，兼而留意德性之涵養」；師範教育「特以注重德性之涵養，養成可充任公學校之教員為目的」（曾素秋，2002）。

臺灣教育令的發佈健全了臺灣的教育制度，但依舊採取臺日人教育雙軌制，在臺灣的日本人教育，遵照日本內地的教育政策推展，而臺灣人則適用於臺灣教育令，當初總督府採取雙軌制的說法是因為臺灣人歸順日本的日子不夠長，日語程度遠不及內地人，同時國民精神尚不足，臺日人雙軌制度是必要的。實際上，臺日人的教育內容、程度也明顯不同，臺灣人的教育水準遠低於當時的在臺日本人。

二、新臺灣教育令

臺灣教育令發佈後不久，發生了朝鮮的三一運動，此事件讓當時的原敬總理大臣正式提出「內地延長主義」來統治殖民地，認為「臺灣的制度應盡可能使其與內地相接近，最後要使得臺灣與內地毫無差別（杜武志，1997）」。

隨後，田健治郎被原敬內閣派來臺灣擔任總督，田的治臺方針也與原敬相呼應，1922年發佈了新臺灣教育令，同時將1919年的臺灣教育令予以作廢，新臺灣教育令明顯摻有內地延長主義思想，主張「臺日一致」、「一視同仁」。田總督認為（引自吳文星，2003：6）：

……臺灣大多數住民為漢民族，與我大和民族本是同種同文之關係，彼此之間並無任何優劣之差別……，臺灣有識階級的漢學素養比諸日本有識階級毫不遜色。至於中流以下社會，日本領臺之來教育之成效亦漸次呈現，初等教育入學人數漸增……，因此臺灣統治政策首先必須確立教化臺灣人，啟發其智能，使之成為忠良的臣民之大方針。……我抱持的施政方針在於加以撫育教化，隨其文化之進展，接著廢除差別待遇，最後使臺日人之間已無差別，融合同化成為純然的大和民族，共享文化之恩惠。

為達到上述的目標，新臺灣教育令明白規定「普及教育」、「廢除差別待遇」與「開放臺日共學」。在廢除差別待遇方面，明訂「國語常用者之初等普通教育是依據小學校令；國語不常用者於初等普通教育為公學校」，表示進入公學校或小學校，不再取決於種族差異，而是在常用語言的差異，代表日本子弟也可以就讀公學校，而日語達到水準的臺灣子弟也可就讀小學校（王錦雀，2005）。在中等教育以上的制度除師範教育需配合臺灣之特殊情況外，則完全採用內地的制度，並實施「臺日共學」。

臺灣教育令的目的從又生駒學務課長在「臺灣教育令的要旨」中就可以一窺究竟（杜武志，1997）：

本次教育令改正的要點在於，不但消除內臺人間的差別主義，而且在教育上，不承認有內地人臺灣人這種種族性的稱呼，唯有以是否常用國語而為區別，而且這種區別限於初等教育，在中等以上教育，則完全無區別，這是第一點。只要情況容許，臺灣教育制度都要依據內地的教育制度，這是第二點……。今日已確立共學與依據內地的教育制度，我們已經大略可看出臺灣教育的趨向。我們更希望國語更進一步普及，期能提早取消小公學校的區別……。

有關於共學制度，當時就有不少討論聲浪，分析此制度的優缺，優點為可促進日臺的和諧，減少彼此衝突、節省經費的支出、日臺學生的親近可加深相互的瞭解，能引導思想態度更為正確；缺點可能有臺灣人比日本人多，反而造成日本人被臺灣人同化的問題、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訓練日臺學生應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可能會造成教師的負擔、臺灣學童的國語能力可能會降低日本學童的學習標準、共學過程中，本島學童需要多數時間來學習國語，可能會影響其他科目的學習……，有了這些缺失，加上擔憂日人若在臺灣受教育感到不安，可能會影響日人來臺定居的意願（鶴見，1977）。基於上述原因，種族差別的想法仍存在於當時的教育制度中。

新臺灣教育令的頒佈，表面上似乎承認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平等地位，但

實際上仍無法完全撤除臺日間的差別。雖然規定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入學資格是按照常用語言來劃分，可是根據研究，在初等教育上，日本人就讀公學校屈指可數，而臺灣人就讀小學校也是寥寥無幾，且進入小學校的臺灣子弟也常受到歧視的待遇（曾素秋，2002）。在中等教育上，中等教育的入學考試以小學畢業程度為準，所有科目，如國語、歷史、修身等都需以國語作答，在此制度下，在臺的日人握有較大的勝算，所謂的「廢除差別待遇」、「臺日共學」只是美名，實質上卻更加保護內地人的統治地位，就如同矢內原忠雄所云，臺日共學關係發展成畸形的教育體制。

第三節 皇民化時期—軍國主義與皇民化運動（1938~1945）

壹、治臺政策之形成背景

第一次大戰期間，由於歐洲軍用品需求大幅增加，提振了日本經濟，日本景氣一片繁榮，重工業在日本迅速發展。日本與美國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成為債權國。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軍用品需求降低，也造成日本經濟的低迷，1927年爆發了昭和經濟恐慌，緊接著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使得日本經濟狀況更加惡化。而當時的蘇聯非但沒有受到經濟大恐慌的影響，經濟反而快速成長。有鑑於此，政府干預經濟的聲浪越來越大，許多財閥集團進行經濟壟斷，並結合政黨。此外，農產品的價格低落，農民生活困苦，失業人數眾多，不少社會運動隨之興起，當時的文人政府軟弱無能，引起國民的不滿，遂釀成支持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風氣。

大正末期，國際間瀰漫著和平主義，當時的幣原喜多重內閣，為尊重國際聯盟的目的，在外交上採取與英美協調、尊重中國的合理要求等政策。此作法被當時的軍部責難，被譏為「軟弱外交」，因此日本國內對於「大陸政策」陷入了激論的局面。直到昭和初年，軍部的支持者越來越多，軍部與民間的右翼團體，想採取非常手段來改革國家，並進一步侵略中國，藉以獲取中國資源，於是軍國主義的抬頭。軍國主義的直接行動在日本國內有刺殺首相濱口雄幸（1930）、五一事件

(1932) 及二二六件 (1936)，軍國主義在二二六事件中得到了鞏固。而在國外，日本策劃皇姑屯事件、製造五三慘案、發動九一八事變及退出國際聯盟，日本軍部掌握發言權，逐漸走向德國、義大利的路途。蘆溝橋事變後，更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號召，日本積極向外侵略，國家進入了戰爭體制，而有關於社會主義運動、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都在這段時間被壓抑（王錦雀，，2005）。

自從 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為了因應長期的戰爭，日本制訂了「國家總動員法」(1938)，此法為統制經濟及全面動員之根本大法，內容指出「在戰爭期間，為達成國家總體力量，能以最有效之發揮，而賦予政府以統制並運用全國人力與物力資源的權力」，而這裡的「全國」也當然包括殖民地臺灣，臺灣自然進入戰時體制了。之後，由於戰爭的不斷擴大，臺灣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中繼站，戰略位置更為重要，再加上戰爭時期軍需用品的需求量增加，日本也希望臺灣能貢獻所有資源來應付戰爭，為了使臺灣人能具有對日本的愛國心與肯為日本奮戰的精神，總督府決定在臺灣推動「皇民化政策」。

貳、 治臺政策之確立

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後，日本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斷向外發動戰爭，而臺灣的地理位置，可說是南進政策與大陸政策的最佳基地，因此為了配合戰爭，當時的臺灣總督也換回武官，由海軍出身的小林躋造擔任。小林躋造在就任前就提出他的治臺方針為將臺灣人民皇民化、臺灣產業工業化及使臺灣成為東南亞前進的南進基地化。

「徹底化皇國精神，振興普通教育，鼓勵語言風俗的同化，培養帝國臣民的素養」就是日本政府皇民化的目標，而皇民化運動之根本意義即是加強同化。由「同化」至「皇民化」的過程中，最基本的同化政策就是普及國語。日本自 1895 年即在臺灣實施近代化教育，但是由於並非義務教育，因此並無強制要求臺灣人學習日文。但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皇民化運動」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部分：國語運動、改姓名運動、宗教和

社會風俗的改革與志願兵制度。

一、國語運動

國語運動可說是全面性的日語普及運動，也是皇民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日本統治臺灣初期並沒有排除臺灣本地語言，到了皇民化時期才開始壓抑本地語言。講日文成為正真的日本人的必備條件之一。因此日本政府對日語程度不同的社會大眾會有所不同的作法，例如，在 1937 年時，若符合日本政府規定的語言標準之家庭稱「國語家庭」，不僅是大家的模範，而且還享有實質生活上的優惠。所謂的優惠就是該家庭出身的兒童，可以進入程度較高的「小學校」，也可優先進入中學等就讀。另外，還可獲發「黑券」，在物資缺乏的環境下，仍可比照日本人，換得特別物資配給。從此可見雖然這個政策並沒有強迫性，但民眾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一定要學日文。為了能使臺灣人自然使用日文，在皇民化時期，殖民地政府為推行國語而積極地壓抑本地語言，例如，取消小學的漢文課、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推行國語家庭。在 1940 年臺灣國語理解者達到總人口的 51%，1943 年更達到 80%（蔡錦堂，2006：20）。短短三年間，理解日語人數增加三成，可知日本政府相當積極推行普及國語政策。

二、改姓名運動

1940 年 2 月 11 日總督府公佈「臺籍民改換日姓名促進綱要」（蔡錦堂，2006：15）。改姓名運動的精神內涵在於使臺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改姓名運動顯然是成為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法律上來說這個改名的制度不是強制的而是自願性，是偏重獎勵制度。更改日本姓有資格限制，一般來說必須符合皇民涵養與公共之精神。對於當時的在臺的民眾而言，改日本姓就如同爭取國語家庭的認定一樣，可以獲得具體的利益，更是晉升社會階層的一條捷徑。所以臺籍青壯年人士，紛紛改換日本姓氏(約 12 萬個人改姓名)(楊建成，1995:1-6)。

三、宗教和社會風俗的改革

日本政府在 1938 年開始對在臺灣人民施行了宗教改革政策。白井朝吉曾說：「皇民化運動的完成即是臺灣人的靈魂信仰日本的神，並讚美之。只確信日本的神道是無上的信仰，以它為自己的生活規範，且實現於實際生活上」（白井朝吉、江間常吉，1939:11）。所謂的宗教政策就是要以日本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的舊有宗教信仰，壓抑殖民地固有的宗教。例如放棄臺灣民間信仰和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社。結果 1909 年在臺灣已有 6191 個寺廟的差不多一半被日本政府破壞或改成日本神社。周婉窈指出：「臺灣人對皇民化運動的反應因項目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宗教改革（推行神道、整理寺廟）最不熱衷，表面上雖被強迫接受神道信仰，骨子裡根本不信」（周婉窈，2003：169）。在壓抑固有的宗教上，主要推行寺廟整理運動，企圖透過整理、裁併地方寺廟來達到消滅臺灣固有宗教的最終目的。基本由地方主導，但是引起的反彈太大，使得長谷川清就任臺灣總督之後終止這項政策。但是經過整理之後，臺灣寺廟大概少了三分之一。在皇民化運動的高峰時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國家神道似乎有取代殖民地固有宗教的現象。但是根據蔡錦堂的研究說：「臺灣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原有的神道信仰也消失的無影無蹤，神道信仰在臺灣是徹底地消失的宗教信仰」（周婉窈，2003：169）。

四、志願兵制度

在皇民化運動的政策中，志願兵制度與戰爭動員關係最密切且直接的。支那戰爭之前，在臺灣並沒有服兵役的義務。但是到 1942 年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而「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則於 1943 年開始實施。申請的條件為：年齡須滿 17 歲以上、身高超過 152 公分、身體檢查體位甲等或第一乙種體格、國民學校初等科畢業或有具有同等學力者（蔡錦堂，2006：110）。第一回申請結束時，全臺灣共有約 426,000 人提出申請，錄取名額只有 1,000 餘名（蔡錦堂，2006：111），可見志願兵申請的熱潮。周婉窈認為在當時志願兵制度可說是測量殖民地青年「皇民化」程度的指標，志願者愈踴躍，表示皇民化運動愈成功（周婉窈，2003：184），然而戰爭的規

模不斷的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 1945 年全面實施徵兵制。由此可見，這股熱潮有兩種解釋，其一可能是受到當局的脅迫，其二是青年人本身對日本的認同感。

此外，除了推行皇民化運動外，1941 年也成立「皇民奉公會」，依各地行政區域，由上至下，在臺灣各地設立支部、支會、分會、區會、部落會、奉公班，所有社會團體都被編入奉公會組織（吳文星，1996）。

參、教育政策之確立

1930 年代，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不論日本本土或臺灣的教育體制與內容都做了大幅度的改變。在 1937 年日本成立「教育審議會」，進行各項教育政策的擬定，當時的教育審議會委員長指出：「當此之秋，擴充整備對國民全體的基礎教育，我國確立新學制的根底，作為大國民需要的基礎鍊成，培養國運進展之根基……，此作為教育上根本而且極緊要的國策」（許佩賢，1994：153）。在 1937 年後，日本在臺灣實施的主要教育政策包括國民學校令及實施義務教育。

一、國民學校令

1941 年日本政府在本土公布「國民學校令」，將初等教育階段中的小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這項政策的宣布改變日本傳統教育政策的走向，有特殊的意義。在 1866 年來日本本土所實施的「小學校令」第一條指出：「小學校應留意兒童身體之發育，以授與道德教育即國民教育之基礎及其生活所需之普通知識技能為本旨。」（杜武志，2003：189）但國民學校令中卻指出「國民學校基於皇國之道，施行初等普通教育，並以鍊成國民之基礎為目的」。可知國民教育令之教育目的為將人民訓練成「皇國臣民」，希望能提高人民的國民意識。

受到日本國內教育改制的影響，臺灣總督府也為了配合戰爭體制，於 1937 年廢除公學校漢文科、書房及漢文版的報章雜誌，且在日本發佈國民

學校令不到一個月，臺灣總督府也實施了國民學校令。當時總督府總務長官說明實施國民學校制度的原因是「鑑於皇國在東亞及世界的地位與使命，必須確立獨自的教育體制從而扶翼皇運，培育下一代的大國民，其目的在於統合以往的教材，使修練皇國之道歸一，以培養國民之基礎」(何義麟，1986：50)。而臺灣「國民教育令」第一條的目的也和日本國民教育令一樣，顯示當時日本將臺灣視同日本一部份納入了戰時體制。

此一法令取代了以往的「小學校令」與「公學校令」，將臺灣所有小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從此點來看，不論日本學童或臺灣學童都就讀同樣的學校，取消了臺日人的差別教育。但實際上，卻又依照不同狀況實施三種課程，包括「國語生活家庭」之兒童予以標準第一號課程表，「非國語生活家庭」之兒童實施第二號課表，第三號課程表針對修業年限六年的國民學校。因此雖然國民教育令似乎標榜臺日人就讀同樣學校，但似乎與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有異曲同工之妙，是以「國語常用」來做區分標準。

而此一法令中各科教學宗旨也明顯指出要提升國運，體認皇國精神與使命感。如國民科（修身、國語、歷史、地理）是以學習我國道德、語言、歷史、國土國勢等，明示國體之精華，涵養國民精神，從而使之自覺皇國使命為目的；國民科地理在於瞭解我國國土、國勢與諸外國情勢，從而養成愛護國土之精神，並體認皇國在東亞及世界之使命；數理科（算術、理科）是為培養正確的觀察與處理一般事務現象之能力，從而引導兒童在實際生活上，具有合理的創造精神，使之對國運發展有所貢獻。由上可知，不論是哪一科目，都強調「皇國」的重要性，各科的宗旨都含有濃厚的軍國主義，「皇民化」教育如火如荼地進行。

二、義務教育的實施

國民學校的教育目的在於國民基礎性的養成，倘若再搭配義務教育的實施，將使得國民教育的目的更快達成。在1942年的總督諭告中提及：「……惟普布教化舉其土地與人，仍以皇土皇民之實為本島施政之根。帶改隸以來

牢固不敢所渝以此，故囊布國民學校之制，圖初等普通教育之刷新振興。今又茲時運要，請併鑑實施義務教育制度，以期普及徹底……(杜武志，1997)。」

小林躋造也曾強調(轉引自何義麟，1985：47-48)：

培養皇國民的素質，應在施政上從各方面進行，然其首要者在於教育，而教育又以初等教育為根本，當此支那事變爆發之際，本島居民以重新自覺為皇民，並希望其子弟成為善良有為之日本國民，近來島民向學心已顯著提高，對推行義務教育有莫大裨益。如今我帝國正排除萬難為達成建設東亞霸業邁進。當此之時，本島不僅已成為帝國之鎖鑰，且變成南方發展之據點。故其重要性已日益加重。因此無論在文化、產業、經濟以及各方面都要順應國策，進行創造建設工作，這種情勢之下，本島居民深為帝國臣民所應負的責任，既重且大。為達成此一任務，必須培養島民之基本素養，今日我確信統治臺灣之要像是對本島實施初等教育義務制，讓島民接受初等教育的下一代國民對我國國體有明確的認識，從而培養他們順應新時代之能力。

而臺灣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早在1939年開始規劃，當時總督府設置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並制訂義務教育實施要綱，目標為「初等教育的目的，在於此負起扶翼皇運的國民，鍊成基礎資質，擬改為義務制度。」義務教育的適用範圍為「居住普通行政區域內的內地人、本島人、高砂族的學齡兒童」，而所有滿六歲之兒童都必須就學，修業年限為六年。

綜上觀之，臺灣實施義務教育的理由約有三項：1.鑑於臺灣統治之本義，廣為本島下一代國民授以初等教育，作為皇國民鍊成的基礎教育，以義務教育最為重要，確保每一個兒童皆能接受國民教育，才能確保每位學童都能學到皇民精神；2.臺灣居民水準已顯著提高，依照各種情勢的發展，實施義務教育的時機應已成熟；3.實施義務教育，強化臺灣人民資質，對於產業及國防根基方面助益相當大，因為當時臺灣產業發展快速，對於處於作戰狀

態中的日本貢獻很大，若能提升下一代的國民素質，將可促進國運的發展(杜武志，1997)。1943 年推行義務教育後，1944 年的學童就學率就已經突破 70%，這的確提升臺灣人民的素質。

在 1937 年後所實施的國民教育及義務教育最主要目的，都是為了能更快速強化臺灣人民的皇民精神，希望能改變臺灣人的國家認同，讓臺灣人真正體認到自己是日本皇民，願意為日本效命、犧牲。

第三章 從公學校修身教育探討臺灣人民之國家認同

大部分的人都會想到自己是隸屬於或認同於哪個國家，就如同每個人會想要確認自己的特質一樣，如性別、宗教、社會地位等等。國家認同是所有集體認同中最重要的一環，沒有國家認同就如同飄在水面上的浮萍，沒有歸屬的地方，可見得國家認同的重要，而日本時期修身教育可說是培養孩童國家認同最具影響性的一環。因此本章將先探討國家認同的相關理論，第二節將著重於修身教育層面，並從教科書、教師與學校活動著手進行瞭解修身教育對於臺灣人國家認同的型塑及影響。

第一節 國家認同的相關理論

壹、國家認同的意涵

一、國家認同的意義

關於「國家認同」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國家認同可界定為公民對其所屬政治共同體主動的認同（willing identification），由之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地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難時願意犧牲自我，而共同體內成員政治意識的表達、理性語言的運用過程，以及具有情感面向的凝聚力構成國家認同的三種主要特色（蕭高彥，1997：4）。

國家認同可說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於哪個國家，並且清楚瞭解自己國家的範圍及對所屬國家抱有期待，願意支持國家，也同時享有此國家在法律上賦予的相關權利（蕭妙香，2002:30）。

如果將認同定義為某一主體如何確認自身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存在，且在確認過程中除了對個體自我的承認與肯定外，還包含他人對此個體自我存在的認識，那麼國家認同將可被定義為個體對國家的確認與歸屬感。在這樣的定義下，就會產生出「我是臺灣人？還是日本人？」的國家認同危機。但由於「國家」隱含了多面向的概念，其中包括了「族群國家」、「文化國家」與

「政治國家」，亦即建立在血緣與宗族上，對某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或具有共同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的集體文化情感及對特定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產生的政治認同感。因此會根據對國家認同定義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論述（江宜樺，1997）。

吳乃德（1993）指出國家認同乃是一種情感性的投注對象，要如何塑造國家認同感，就要如 Renan 所言：「歷史經驗與歷史記憶是創造群體認同最重要的素材，而非宗教、語言等文化因素，一群人之所以認為與別人不同，主要是因為他們擁有與別人不同的歷史經驗與記憶，如果沒有共同歷史與過去記憶，群體認同幾乎很難達成（江宜樺，1998：153）。」國家認同可說是一種較長期的情感附著及歸屬。

再者，國家認同也可視為國家經不斷互動、協商、學習、定義及建構而成的自我定位。國家認同會受到國家內部族群、政黨及利益團體的互動影響，也會受到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的限制，對外則會受到與他國互動的影響（施正鋒，2004：1）。

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學者對於國家認同的定義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認為國家是維護民族文化、實現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組織，而認同是個別成員認清自己所屬脈絡，從而產生歸屬感的心路歷程。由於個人確認了民族國家對自我實現的關鍵性，所以形成了國家認同。而自由主義的學者則以為國家是一群人為了保障私人的利益、防止彼此侵犯的弊病所組成的政治共同體。由此看來，國家認同是個別成員從自己的考慮出發，確認國家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後，從而認可國家對自己的政治權威，這樣的定義下，國家認同摻有意志選擇的成分（江宜樺，1998：21-22）。

而西方學者 Smith（1991）提出基本的國家認同必須具有下列三項特徵：一個有歷史的領土或國家，共同的神話或歷史記憶、共同的大眾文化、共同負擔的法律權力與義務，並具休戚與共的經濟利益。Greenfeld（1992）則認為國家認同是指一群人在意識上具有福禍與共的自覺，且生活在同一個國度

中，相互確保彼此的共同福祉。

Sheen (1997) 表示國家認同是對國家的忠誠、依附、歸屬感等抽象的概念，人民持有國家認同才得以使國家的目標實現，而個人的國家認同更包括了對家庭、社區、鄰里、同儕團體、社會與民族國家的忠誠。

雖然各學者對國家認同的意義看法有異，但歸結上述學者的國家認同概念，大致也不出江宜樺 (1998) 提出的三種意涵，即「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是基於血緣關係與主觀認定的族群而對某特定的族群產生認同與一體感，但是這種認同關係有點薄弱，必須藉助其他的「想像力」(亦即文化認同) 才能穩固。「文化認同」可說是一群人願意認同並接受共同的象徵系統、意義及行為規範，也就是必須擁有共同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及集體記憶，從而產生對群體的歸屬感。而「制度認同」則是對特定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產生肯定的認同感。

貳、日本統治前臺灣人的國家認同

一、荷西時期

十五世紀以來，西方各國紛紛致力於對東方的貿易經營，最早至中國建立貿易據點的是葡萄牙。十七世紀時荷蘭也成為海上強國，曾經為了奪取葡萄牙在中國的貿易據點澳門而與葡萄牙發生衝突，最後因戰敗而轉向澎湖。當時因中國明朝實行海禁政策，對於荷蘭要求來華貿易並不積極，且荷蘭兩度佔領澎湖時，明朝政府都曾派將領前去驅趕，最後在明朝政府的默許下，荷蘭人轉往臺灣作為與中國之貿易據點。荷蘭人由臺南安平登陸，並在臺南成立了統治中心熱蘭遮城與安平古堡，開始了三十八年的統治。

由於荷蘭原本想佔據的不是臺灣，且當時荷蘭來臺的主要目的只是為了方便與中國貿易，一切都以經濟利益為考量，荷蘭政府嚴密的管控漢人以達到經濟榨取的目的，除了不給予漢人土地所有權、限制漢人與原住民的來往、嚴禁漢人持有武器、限制漢人集會與宗教自由……外，更對漢人苛以重

稅（廖宜方，2004）。可見荷蘭人並無積極建設統治臺灣，而是為了自身利益來壓榨臺灣人民。

因為荷蘭人的苛政，終於導致 1652 的郭懷一事件。在郭懷一的領導下，約四千名漢人一齊反抗荷蘭的統治，雖然荷蘭以優越的武器及取得原住民協助的優勢鎮壓了這場叛亂，但可以從此看出，當時的漢人對於荷蘭政權的統治基本上是採取排斥的心態，在國家認同上應該還是傾向於中國，畢竟要當時的臺灣漢人認同與自己的文化習俗、政治制度完全相異的國家誠屬難事，加上荷蘭的暴政，更無法讓居住在臺灣的少數漢人認同荷蘭。

繼荷蘭人來到臺灣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來臺的目的也是為了能方便與日本合作貿易並傳教，對於臺灣也無積極建設，最後在無心經營的情況下，遭荷蘭人驅離臺灣，因此臺灣人對西班牙更無所謂的國家認同。

二、 鄭氏時期

滿清入關後，鄭成功致力於反清復明，在中國的反清活動失敗後，為了能中興明室而決定將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1622 年，在何斌的建議下，鄭成功順利從鹿耳門進入臺灣。登陸臺灣後僅用了 24 天就佔領了大部分地區（廖宜方，2004:48），只剩下熱蘭遮城，最後荷蘭因為彈盡糧絕而投降，鄭氏政權正式進駐臺灣，成為臺灣歷史上的第一個漢人政權。

在鄭成功、鄭經等人的治理下，臺灣的發展越來越步入軌道，但隨著鄭家父子相繼辭世，鄭家勢力漸漸衰弱，終於在 1683 年被滿清降服。雖然鄭家勢力僅在臺 21 年，但卻被視為臺灣史上的正統政權，而百姓對鄭成功卻極為愛戴，鄭成功曾被隆武帝詔賜鄭成功賜姓朱，百姓因而稱其為「國姓爺」；臺灣許多地名也是因鄭成功而得名，如南投的國姓鄉、臺中大甲的劍井、臺南縣的柳營（李筱峰、莊天賜，2004:35）。

三、 清領時期

清朝統治臺灣約兩百餘年，這段期間依清朝對臺灣的治理態度可分為清

領前期與後期，這兩階段清朝在臺灣的建設與態度有顯著的差異。

康熙皇帝之所以攻佔臺灣，主要是因為要消滅鄭氏勢力，對於臺灣的領有不抱興趣，當時清代朝野中，出現了棄臺論，如魏源在《聖武紀略》中指出「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張勝彥等人，1996:13)。甚至還有人提出將臺灣漢人全數移回中國，放棄臺灣島嶼。最後在施琅的力排眾議下，並採國防觀點提出具體的建議，才使得康熙皇帝決定保留臺灣。

由於臺灣孤懸海外，留有臺灣主要是為了加強東南沿海的國防安全，可說是「為防臺而治臺」，因此清領前期對於臺灣的治理態度是消極被動的，從康熙頒佈的「渡臺禁令」即可看出，只准漢人來臺，不許攜家帶眷，也不准築城等等，來臺的清朝官員也多無心治理，剝削臺灣百姓，引起大大小小的抗清事件，最著名的有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與戴潮春事件，清領前期，臺灣可說是處於「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狀況中。不過當時的民變不斷並不是為了想追求獨立自主，只是無法忍受官員的貪婪無能，基本上這段期間仍是以滿清政權為認同的對象。

1860年，因滿清對外戰爭的失敗，臺灣被迫開港，臺灣歷史進入了清領後期。因西方列強要求臺灣開港(安平、滬尾、雞籠、打狗)、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爆發及1884年中法戰爭波及臺灣北部。各國對於臺灣的野心，讓清朝感受到臺灣的重要性，對臺態度逐漸趨於積極，相繼派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前來治理臺灣，對臺灣展開積極的建設，如開墾荒地、開通道路、興建現代化建設等等，在官員的用心經營下，臺灣人民的叛變就隨之減少。

1895年，滿清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李鴻章簽訂的「馬關條約」決定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消息傳回臺灣，令臺灣知識份子痛心疾首，雖然不斷向清廷提出請求，也曾向列國要求救援，但最終還是無能為力。於是臺灣知識份子決定成立「臺灣民主國」，推當時巡撫唐景崧為總統，製作藍底黃虎旗，建號永清。臺灣民主國看似獨立的國家，但成立之時，即聲明在事平

之後，將又歸順中國。

然而臺灣民主國組成份子的心態可議，堂堂的總統唐景崧在日軍登陸澳底後，竟棄城遠走，臺北城陷入一片混亂，最後是紳商代表決議請日軍入城維持秩序。進入臺北城後，日本一路南下攻略臺灣，在劉永福失守臺南城後，臺灣民主國的勢力完全瓦解，從成立到瓦解僅僅三個月光陰。但臺灣民主國失敗後，臺灣人民仍憑著自己的力量，利用游擊方式來反抗日本，在1895~1902年間，臺人因參加抗日活動戰死或被捕殺者多達兩萬多人。從清領後期，政府的積極建設，讓臺灣人民漸漸認同清朝政府，亂事逐漸減少，而臺灣民主國的成立及漢人的武裝抗日事件可看出臺灣人對日本政權的不認同，甚至在1907~1915年間仍不斷發生具民族革命性質的武裝抗日事件。

參、學校教育與國家認同

學校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學校可經由有計畫的課程（教科書）來傳達政治知識、意識型態、價值觀念等等；也可以透過學校活動、儀式、師生互動過程產生政治社會化的效用。政治社會化主要的內容包括了對政治認知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及政治行為模式。政治認知取向即對政治體系的認識、對民主政治、政治事件的瞭解；政治情感取向則含括了國家認同的培養，支持國家政治體系，願意服從、效忠國家；政治行為模式是個人表現在政治層面上的行為，如政治參與等。

而 Fagerlind and Saha (1989) 認為，學校教育對政治發展的貢獻，有以下三項：(一) 學校是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機構；(二) 是選擇及訓練政治精英的主要機構；(三) 是達成政治整合及營造國民政治意識的主要功臣 (陳振榮, 2003: 5)。而學校教育通常又是政府所掌控的，換言之，當一個政府為了達到政治統合、制度認同與文化認同時，常會在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做些特殊的安排，如放置強調政治人物或國家英雄人物的教材，甚至在各式學習活動置入相關的意識型態。

而學校教育也隱含了某部分握有權力者的意識型態，通常會藉由以下措施來彰顯自己國家存在的歷史事實：(一)陳述國家的歷史故事，顯示經驗、奮鬥與勝利的共同性；(二)聲稱國家的特質（如中國的勤勞、日本的榮譽感）；(三)建立新型式的儀式或象徵（如國旗、唱國歌、舉行國家慶典與美化英雄人物等）；(四)建立國家的根本神話或傳說；(五)倡導共同的教養與種族的純粹性（Walters, 1995: 135），由此可知，學校教育與國家認同的培養關係密切。

再者，學校教育中的國民教育更是希望把國家內的人民培養成順從國家的「公民」，也就是國民，讓每個人都能瞭解自己在國家、社會中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學校教育可說是培育國家認同的重要場域（施正鋒，2004）。

學校教育中有所謂的外顯課程(actual curriculum)或稱官定課程(official curriculum)，亦即學校有計畫性地教育學童之課程，包括國語、數學、歷史等的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校外教學等的非正式課程(informal curriculum)及自修課或導師時間的空白課程(blank curriculum)，這些都是學校是先規劃好的課程。但學校的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或稱內隱課程(implicit curriculum)的影響性不亞於正式課程，潛在課程是指那些隱藏在教育活動措施下，雖然目的沒有外顯課程清楚，但卻能在潛移默化下影響學生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陳伯璋，1996）。

潛在課程包括師生互動、教學方法、教師身教、教材的隱藏意義、學校環境布置、學校制度與儀式等等，這些潛在課程反而是無所不在並具有穿透性的，因為它通常是情感性、價值觀的傳達；且根據研究指出，潛在課程影響學生可說是既深入且長遠，學生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要歷經一段時間才能看出潛在課程的作用與影響性（陳啟榮，2005:52）。

Bernstein (1975) 認為社會上如何選擇、分類、分配、傳遞和評鑑教育知識(課程)，反映出權力分配與社會控制的原則，這些原則被轉譯成教育符碼，傳遞到學校教育中的所有層面，亦即在社會上擁有權勢、擁有支配意識

型態的群體決定了其他人學習到的知識（課程）。因此課程內容通常可以顯示並傳達領導階層的意識型態。而目前學校教育課程中，學生最直接吸收的學習內容就是教科書，教科書通常都伴隨著主觀的意識型態，當然也包含國家認同。教科書在學生的求學過程中扮演著相當大的角色，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不論是學生還是老師使用教科書的比例與頻率皆高。

教科書除了方便教師教學、指引學生學習外，更能達到國家的教育目標，因為透過教科書可以傳遞文化精華、塑造社會價值與灌輸國家意識。教科書通常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因為教科書的制訂者、審核者及發行者都是具主觀性的，教科書通常也傳遞著主觀意識，決定著一個社會中的真理，教科書可說是一種合法的國家意識型態控制工具，對孩童的價值觀念與情感形塑影響極大（魏國泰，2006）。就如同上述所說，統治階層常會透過教科書來宣揚國家存在的事實，並藉以培育孩童國家認同概念。

除了教科書外，師生互動一直以來都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環。不論是教師的價值觀念、教學態度、教學行為、教學風格或是領導方式等等，對學生政治社會化都具有影響性。有研究指出，影響學童政治社會化最大的因素屬學校因素，而在學校因素中，又以教師對學生影響最大（張智全，2003），因為教師不僅是政治權威的代表者，也是政治文化的傳遞者。而學校其他活動更是有意無意地表達主觀意識或政治文化，如同升旗典禮，主要目的為培養學童愛國心與國家認同感（黃光雄，2006）。

第二節 公學校修身教育的內容

日本時期在臺灣的教育政策、科目、內容都不少，但本論文只著重於「修身教育」。周婉窈（2001）在過去幾年陸續進行「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臺灣公學校教育問卷」調查，調查中顯示，修身科目是學生印象最深，也相當喜歡的科目。在學生的評價中，修身以壓倒性的優勢，被認為是畢業後對做人最有用的科目，即使是對做事而言，也佔有重要地位（周婉窈，2001：34）；

且筆者在與接受過日本教育的臺灣民眾對談時，也發現訪談對象對於日本教育最推崇的就是道德教育，也時常感嘆現在臺灣的道德教育不如當時的日本教育，而與道德教育最具相關的就是修身科，因此本節主要探討修身教育之內容。

壹、日治時期修身課程的重要性與核心概念

日本在統治臺灣之初，就已經確定教育是以日語為中心，目的是讓臺灣兒童從學習日語中融入日本人的精神，而除了國語科能快速達到學習日語的目標外，修身科是最能使臺灣人具備日本人精神的課程。此外，修身課程可說是日本統治時代德育的代表，而政治意識型態很容易透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政策，對德育產生影響力。政治意識型態屬於「硬式」的方式，若披上較「軟式」的德育之外衣，也較容易達到功效與目的，德育與政治意識型態兩者間的界線也常因彼此的轉化而模糊不清（李琪明，2000：89）。修身科被許多學者視為是日本政府傳遞意識型態及灌輸國民精神的重要科目。

1898年公布「臺灣公學校規則」後，公學校的課程中就出現了修身一科。此科目的教育宗旨為「修身乃教授人道實踐的方法，使嫻熟日常的禮儀作法，並且教授教育勅語的大意與本島民眾應遵守的諸項重要制度大要。」（轉引自蔡錦堂，2006：143）就是教導兒童修身之道與傳統好兒童的道德觀念，培養兒童遵守應遵循的規則與制度。此外，也包括了一些政治目的，如陶冶日本國民精神（曾素秋，2002：126）。

到了1904年，臺灣公學校規則作了修改，第九條提及：「不論在何種教科，必須時常留意與德育相關聯之事項而加以教授。在實行德育上，必須注意德行之涵養與陶冶國民必要之性格。」可以看出不論是教授哪一科目，修身科都可說是擺在第一位的，誠如久住榮一與藤本元次郎在《公學校各科教授法（全）》一書中提及修身科可說是綜合性的、總括的，要達成修身科

的目標必須要和其他科目緊緊配合，尤其是國語、日本歷史與地理（周婉窈，2001：39），雖然修身科所佔的教授時間不多，但其重要性卻是不可言喻的。

公學校規則的第十條亦規定：「修身教育基於教育勅語，以涵養兒童之德行、指導道德之實踐為要旨。在此科，最初就人道之要義，教授適於實踐的平易事項，逐漸進而及對於國家社會責任之一斑，以助長重國法、尚公德、盡力於公益之風氣為務。就女童而言，應以養成貞淑之德為務。此科特別注意使嫻熟普通的禮儀作法。授修身，以嘉言、善行、諺辭等勸戒，使服膺之。」（周婉窈，2001：9）而根據1922年的公學校規則中所提及的與1904年大同小異，只是加入了「高等科則以前項要領為基礎，授以更深層級、堅實之德性陶養。」（曾素秋，2002：126）

由以上可知，不論如何修訂，臺灣公學校規則的基本原則並無改變，即德育可說是所有科目之上，也可說是其他教育科目的教學主旨，而德育最主要的表現課程就是修身科，也就是說任何科目都必須以修身科為核心。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臺灣公學校規則中修身科的要旨與臺灣公立小學校規則有些許不同的地方。在小學校規則中就「人倫道德」的部分多加以闡釋「…在尋常小學校初就孝悌、親愛、勤儉、恭敬、信實、義勇等，授以近易實踐適切之事項…」（許佩賢，1994：84），這可能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對於人倫道德的內容予以保留，不清楚明白指出其內容，以便能在修身科中做更多有利於統治者的教授與課程設計。

此外，公學校規則中的「遵國法、盡公益、使嫻熟普通的禮儀作法」是小學校規則中不具有的，而小學校的「長進取之氣象…，養成忠君愛國之志氣」亦是公學校規則所欠缺的，根據這一點有可能是當時日本政府仍認為臺灣人民與日本人民是有差異的。在教育程度或是皇民化的程度，臺灣人遠遠不及正統的日本人，再加上當時臺灣人的風俗習慣在日人眼中還是落後的，認為臺灣人不守法、沒有禮貌、不關心公共事務，因此臺灣人在修身科中要先做到最基本的目標「守法」、「公益」及「普通禮儀」，所以雖然在修

身課本中有提及忠君愛國思想，但卻在規則中無特別註明。在小學校提到的「進取」方面，可能是因為當時不鼓勵這種對個人成就有所幫助的目標，也許是因為在個人成就上有過多的進取，會造成對統治者的不便。

從此可看出，當時修身科規則的制訂，仍有臺日人的差別待遇，或許就如鶴見（1977）所說的「公學校教科書並非隨意刪減小學校教科書，而是有意識地修改小學校教科書的意識型態內容」。

貳、教育勅語之意義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或是思想上都仿效歐美，強調技術、知識，而忽略了道德教育。而歐美盛行的自由、民主風潮，可能會違背到日本傳統的道德觀念。因此為了避免人民忘卻傳統的道德觀念，再加上日本國內國家主義日漸抬頭，遂於 1890 年（明治二十三年）由明治天皇頒佈「教育に関する勅語」，即「教育勅語」，成為當時最高教育理念。而教育勅語同時也代表了天皇的權威，要人民謹守教育勅語的原則。頒佈教育勅語後，便決定印製教育勅語謄本，發送到全國學校，而由於教育勅語代表天皇的權威，因此常與御真影（天皇、皇后及皇室成員肖像寫真）組合在一起，成為當時教育上最具影響力的象徵。

而教育勅語的用途在於：1.在國定紀念日儀式中捧讀，包括了元旦、紀元節（第一代神武天皇開國紀念日）及天長節（天皇誕生日）；2.每日向教育勅語行最敬禮；3.在修身課程中教授。到了 1891 年日本文部省更是統一規定國定紀念日之儀式，規定由校長或特別指定之人選捧讀教育勅語，且在捧讀時，全體人員都要莊嚴肅靜，顯示教育勅語的神聖性（杜武志，1997）。而學校教職員要確保教育勅語不得被損毀，即使發生不可抗拒之天災時，也要盡力保護，甚至在日本戰爭末期，文部省與內務省制訂的「學校防空指南」中，規定空襲時，第一個要保護御真影、教育勅語與其他天皇詔勅的謄本。其次才是學生與孩童的保護，可見當時對御真影與教育勅語的重視（蔡錦

堂，2006)。

教育勅語強調「忠君愛國」、「忠孝一致」。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時尚未確立教育方針，卻已經明訂了貫徹教育勅語政策，且不論在何種科目上，也都教導忠君愛國思想，藉以將臺灣人民同化。而為了普及臺灣人民對教育勅語的認識，乃木希典總督還下令各公私立學校恭讀教育勅語後，應再恭讀漢譯文，以讓臺灣人民夠能充分理解教育勅語的內容。教育勅語的漢譯文如下(蔡錦堂，2006：257)：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盡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實亦存此乎。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慧，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義勇奉公，以服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則不獨為朕之忠臣良民，亦足以彰顯爾祖先之遺風。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應俱遵守，通之古今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朕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庶幾成一其德。

從教育勅語的內容來看，目的是要兒童瞭解皇國的美德，並培養人道倫理精神，如對父母孝順、兄友弟恭、夫妻相和、朋友有信等等，具備了這些國民道德才可以實踐國民精神，最終能達成忠君愛國之理想(曾素秋，2002：132)，如盡忠天皇、尊敬皇室、信仰神道。為了讓兒童盡早瞭解教育勅語的宗旨，規定在第四學年前，孩童要做到一字無誤的背誦，到了第六年前要能默寫。此外，教育勅語表明了天皇的地位與正當性，各項教育皆以教育勅語為最高準則，因此在整個教育體系中，都可看出教育勅語所闡述的天皇思想，期望能灌輸人民揉合了「政治意識型態」與「道德意識規範」的皇民思想(林育柔，2004)。

不論是日本國內或是臺灣公學校的課程都是以教育勅語為最高指導原則，修身科的基本核心概念就是依照教育勅語而制訂。從1928年出版的修

身教科書卷四後，「教育勅語」都放於首頁中，甚至會將其內容納入課文中作進一步解說（曾素秋，2002：129）。下一個部分將針對修身教科書作一分析。

叁、修身教科書之分析

修身教育從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即成為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各科都必須融入修身教育。但直至 1914 年（大正 3 年）才正式發行臺灣公學校修身書。而 1914 年前，修身科並無固定且正式的教科書，而當時上課所使用的教材，多為 1901 年（明治 34 年）臺中縣公學校長召開的學事諮詢會議中舉出的修身科參考用書，如臺灣總督府出版的《教育勅語述義》、《作法教授法》、《祝祭日略儀》以及由宮內省出版的《幼學綱要》與朱子《小學》（周婉窈，2001；莊幸如，2004）。

由於前期並無官方的教科書，因此修身科的教授在此時顯得無所適從、雜亂無章，就如同前田孟雄表示修身科的教授是很雜亂不協調的，修身科的教授確實有一定的主義目的，但卻在極微薄弱的基礎上，明顯設立了不統一的方法，為了改善這般情況，他也指出修身教育需先依教育勅語的旨趣來教授（轉引自川路祥代，2002）。

從 1914 年由臺灣總督府發行，在公學校中所使用的修身科書，共經過五次修訂改版，而改訂時間約略晚於日本內地五期國定教科書的發行。以下是五期修身科的發行概況（周婉窈、許佩賢，2003:140）。

表 3-1 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書之分期

分期	卷一發行年份	書名	卷數
第一期	大正 3 年（1914）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一至卷六
第二期	昭和 3 年（1928）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1930 年以後書名加題「第一種」	卷一至卷六
第三期	昭和 5 年（1930）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第二種	卷一至卷六

第四期	昭和 16 年 (1941)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第一種	卷一、卷二
第五期	昭和 17 年 (1942)	ヨイコドモ	上、下
	昭和 18 年 (1943)	初等科修身	卷一至卷四

根據周婉窈 (2001) 的研究指出，1910 年發行的公學校修身科教授資料共有三本，雖然類似教科用書，但並非給兒童使用，因此不能算是正式的教科書，本文不將此納入討論範圍中。而第四期因改制為國民學校，修身書出版至第二卷即停止，修身書重新編撰 (轉引自王錦雀，2005：158)，故此一時期也不列入以下討論。本節將欲討論的修身教科書內容分為三期，分別為；第一期公學校修身書 (1914~1927)、第二期公學校修身科書 (1928~1941)、第三期ヨイコドモ與初等科修身 (1942~194)。

第一期的內容選材大部分是和臺灣有密切關係，不論敘述或插圖都呈現出強烈的臺灣風味。此時期主要選取的德目是依據《1914 修身書卷一至卷四編纂趣意書》，認為必須選取的德目應該「基於教育勸語之旨趣，因應兒童心理之發達，鑒於臺灣今日之情況，主要的德目有四：1.國民精神之涵養；2.順從；3.誠實；4.勤勞」。

此四德目可算是普遍性的道德，不論是哪一個國家都會要求國民具有愛國思想、國民精神。當時的臺灣為日本的殖民地，人民國籍上也為日本籍，因此在臺灣的教育上也將傳遞愛國思想，寄望能使每一個臺灣人都能具有日本國民的精神。而順從此德目對於總督府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高岡武明曾說：「對本島人這種新領土的國民，不得不養成道德順良的國民為滿足」(臺灣教育會誌編，1902：14)。第一期的內容著重在培養兒童品德與認識天皇制度。

第二期的修身書在內容方面也盡量貼近臺灣兒童的生活，第一卷以圖為主。從第二卷後則多以「例話」呈現，並大量使用虛擬人物，讓兒童更易領會。到了第三卷則實際以日本歷史人物作為主角，並大量呈現日本歷史中的規範行為作為道德楷模。卷四不再以虛擬人物呈現，內容全是日本真實人物

的故事，且出現了教育勒語。卷五卷六體裁上多以論說文為主。在德目選取上，依舊遵循第一期的四大德目，卷六可以明顯看出國民精神之涵養的比例增加，更重視天皇制度，以培養兒童忠君思想。

1941 年公學校改制成國民學校，修身課程進入第三期，修身書的內容大多也以兒童的生活為主，在生活化的同時灌輸國民意識。此時，日本也進入戰爭時期，因此修身書的內容也反映戰時體制的精神，積極地扮演著將臺灣兒童同化成日本人的角色（轉引自王錦雀，2005：179）。為了配合戰時的需要，在書中傳達的「好孩子」形象是忠心愛國的，是要成為順從的皇民，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的題材比前兩期的多，且在圖片的方面也將衣著與景色改成日式風格（林育柔，2003：108）。

根據以上的分析整理，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書的主要特徵如下：

1.從德目的角度分析，第一、二期較重視家庭與個人；第三期則著重在國民精神。但不論何期，修身課程都以皇國思想為中心、重視社會秩序、國家至上的概念，而有關個人福利、個性發展的議題卻完全無出現（王錦雀，2005：183）。可見當時的修身教育是把國家倫理擺在第一位，強調要以國家為依歸，忠君愛國，而忽略了個人的自我修身問題，正如小林善紀所說：「個人的認同、存在與歸屬，以及個人與社會的倫理關係，只有在國家層次才會發生意義，捨棄個人私利的自私心態，培養天下為公的精神，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才是日本需要的國族主義！（轉引自劉紀蕙，2004）。」個人的修身層面全依附在國家倫理之下，讓修身教科書充滿著同化的意識型態。

若將此三期之修身教科書中，有關於培養國民精神的課文（如國家、國歌、國旗、神道信仰、皇室、忠君愛國等等）作一比例統計，發現第一期有關此方面的課文約有 23 課，比例為 19.4%；而第二期約有 24 課，比例為 15.4%；第三期則有 24 課，比例為 24.8%；若按照比例看來，第三期是最多的，而第二期是最少的，這可能是與當時處於大正民主時期有關，當時主要提倡近代公民倫理與國際倫理，也影響到了修身教科書的編撰（祝若穎，

2005)。

2.臺灣公學校修身書中，較少出現會令臺灣人民具有向心力、自我提升與獨立自主的德目，反而較重視忠孝，培養忠君愛國的精神，期望臺灣人成為順從、勤勉的日本人。

3.修身書的內容是依照日本政府政策而訂。日本採取「同化主義」、「內地延長主義」時，修身書就具有社會控制的色彩（王錦雀，2005：183）、意識形態的灌輸；因為課程可說是「同化的一種機制作用，即融合各種相異文化以統一社會的手段。」到了戰爭時期，在修身書中更明顯提倡「皇民化」。可知修身書的內容是配合也是反映當時日本政府的措施。而修身教科書中，有關「軍國主義」的課文隨著時間比例有逐漸增加的現象（林育柔，2004:108）。

肆、教師與修身教育之關係

臺灣公學校的修身教育的成果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如教材、學校設備、教師素質、學生與教師的互動，以及學校作為知識傳播的權威性等（周婉窈，2001：38）。

1898年第一次公佈的公學校規則中第十條也明示（王錦雀，2005：149）：「教授修身科，不止在所定的教授時間，教員躬親作學生的模範，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與舉躬行實蹟。」從此可知修身課程的教材不僅只有教科書，老師除了傳授、講解修身書中做人做事的道理、五倫等等。大部分也能以身作則，作學生的模範，是實際的以身教去教學，而非只是紙上談兵而已（蔡錦堂，2007：4-14）。可知老師對於當時學生的修身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伍、學校活動與修身教育之關係

公學校教師在教學方法上，除了講述之外還實施生活教育、情意教學，老師運用校外參觀、說故事等具體方式，讓學生實際接觸了解日常生活中的

事物，甚至抽象的「道德」、「愛國」觀念。（謝佩錦，2005：90）。那到底哪些學校活動具有修身的意義呢？本段主要探討學校活動與修身教育之關係。

一、日本節日等儀式方法

1912年11月28日，公學校規則再度修正。此次規則修正中，第44條條文出現了下列字樣：（蔡錦堂，2006：144）

紀元節、天長節、一月一日（元旦）及始政紀念日，教職員與學童於公學校集合，依下列順序舉行儀式：

- 一、教職員與學童合唱「君之代」
- 二、教職員與學童對天皇陛下皇后陛下之御真影行最敬禮
- 三、校長奉讀教育勅語
- 四、校長教誨教育勅語聖意之所在
- 五、教職員與學童合唱該當祝日的歌曲

無拜戴御真影之公學校，前項第二款之儀式可省略

這是臺灣公學校中首次納入了相關儀式的規定。儀式方面，總督府訂定的祝日、祭日上儀式的要求，主要是讓學生培養禮讓、及尊師的態度，師生為了保持親切的關係，老師教學時一定要舉行儀式，學校設置學校紀念日，使兒童父兄得以聚會，使學校與家庭合作。舉行之日集體於操場使得彼此感情融洽，培養協同合作精神。在重要典禮時，捧讀天皇的訓話，也是由教師訓練兒童養成在重要場合表現與動作：

日本時代，慶祝典禮的時候，學生要排在禮堂，向掌捧著它（指天皇訓話）出來。它像畢業證書一樣捲著，還放在茶盤上。校長端出來，副校長走在前面引導，進到禮堂。學生頭要低下來，不能抬頭看。

教育勅語的奉讀儀式對於學生的影響有學者表示：教育勅語的內容是難以理解的，因此奉讀儀式並不見得是要使學生理解教育勅語，而是透過對天

皇、皇后御真影的「最敬禮」，合唱含有祈禱天皇統治無窮歌詞的「君之代」，以及反覆的身體動作，從「感性的面」（而非知識面）來訓練培養對天皇的畏敬之念。（轉引自蔡錦堂，2006：142）

除了透過奉讀的儀式，從內面的潛移默化培養對天皇的畏敬，以支撐近代日本天皇制國家的形成外，於初等教育修身教科書中登載有關教育勅語之內容，亦是攸關學生「國民精神涵養」、培養「忠孝之念」「忠君愛國」情操的有效方法之一。（蔡錦堂，2006：142）

二、唱歌與修身關係

早在伊澤修二來臺之初，就已經在臺灣引進西方的唱歌教育（賴美鈴，2002）。唱歌在 1898 年公布的臺灣公學校令中就是必修科，雖然在 1904 年公學校規則修訂中曾改為選修，但到了 1921 年又恢復成必修課程。當時臺灣公學校規則第十條明訂，唱歌教育的教授方針「唱歌為教授單音唱歌：唱歌的教授為節日、大祭日及諸儀式可用的普通歌曲，不僅可練習發聲，還要能夠培養美感、涵養德性為首要」（曾素秋，2002）。可見在唱歌科部分也有著濃厚的同化意圖，而在《公學校唱歌教授法》中也強調唱歌科和國語科相互配合之下的教育成果，具有很大的意義（賴美鈴，2007：1）。

日本統治初期，唱歌的教材由於沒有統一版本，因此會選用當時在內地很風行的唱歌教科書，臺灣是直到 1905 年出版《唱歌教授細目》後，才陸續發行公學校唱歌教科書，包括《公學校唱歌集》（1915）、《公學校唱歌第一、二、三學年用》（1933）、《公學校唱歌第四、五、六學年用》（1934）、《式日唱歌》（1936）、《公學校高等科唱歌第一、二學年用》（1936）（賴美鈴，2002）。

《公學校唱歌集》的序言明白指出：「本教科書的題材、歌詞、曲譜的難易度是配合國語讀本」，在《公學校唱歌集》中的四十六首歌曲中，就有二十二首是配合當時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1911）。而《公學校唱歌第

一至第六學年用》計有一百零五首歌曲，其中有五十四首也可對照當時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第一種）》（1923）及《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第二種）》（1930）的內容，這五十四首中共有二十八首的歌詞是完整取自國語讀本（劉麟玉，2002），可見唱歌科與國語科是息息相關，互有連貫，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國語教育的推行是為了涵養臺灣人國民精神、進行同化教育，唱歌科則是讓臺灣人能更快速對國語朗朗上口，加快了同化教育的腳步。

從這些唱歌教科書的內容來看，取材與歌詞的用法摻有強烈的國民精神涵養的目的。如《公學校唱歌集》就有 48% 的歌詞是屬於國民精神類，在《公學校唱歌第一至第六學年用》中，雖然國民精神類只佔有 26%，但卻增加了民間傳統與節令的歌詞，這些亦有同化的意涵（賴美鈴，1999；劉麟玉，2001）。就如同周婉窈（1997：37）指出，雖然公學校教科書後來出現許多以臺灣事物為題材的歌詞，的確對臺灣兒童的鄉土文化有正面意義，但是也可視為日本政府的政治手段，因為這些歌詞中所呈現的臺灣，就像是國語讀本中呈現的臺灣一樣，是缺乏歷史的臺灣，所描述的只是「眼前」的臺灣，卻對臺灣的過去避而不談。

賴美鈴（2007：1）1998-1999 年進行調查訪問，受訪者為 37 位曾就讀日治時期公學校的前輩，「其中 89% 的受訪者記得當年唱的日本歌曲，當要求他們寫下曲名時，發現以紀念日的歌曲（日式歌曲）、童謠、軍歌最多。」而這些日式歌曲，主要還是配合祭日與儀式使用，對臺灣兒童可說是同化的手段之一。

第三節 公學校修身教育對於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之形塑和影響

日本總督府在殖民臺灣時期，企圖將天皇國家的意識形態注入臺灣民眾生活中，而教育勅語則是將天皇國家意識形態轉換成修身教育的指導原則。教育勅語的核心概念就是當權者的思想意識，並且轉化成各種方式影響臺灣人民。總督府可說是日本帝國的機構，以教育勅語為主軸的教育體系，透過

教科書的編撰、教師的教導、學校活動的潛移默化等等，不斷複製霸權的意識型態。因此，在這樣的複製下，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很難不受到影響，尤其是思想尚未成熟的學童，或許這樣的影響不是讓曾受過日本教育的人清楚地指出自己認同是日本這個國家，但在想法上、行為上、態度上都已被同化。

在《失落的道德世界》一文中，周婉窈（2001）曾對受過日本教育的耆老進行調查，修身科是耆老們認為印象最深的科目，也是最喜歡的科目之一，且亦被認為是畢業後對做人最有用的科目。修身科一星期僅約兩小時的課程，卻仍壓倒當時上課時數佔十分之七的國語科，可見修身科在當時學生的心目中的重要性。修身科可為公學校的教育中心，有如此的成效，可說修身教育是成功的。

耆老們印象最深的德目中，「孝行」是印象最深的德目，「忠君愛國」則是其次，修身科最期望能培養忠君愛國的皇民，雖此德目並非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位，但也是佔有一定的份量。此外，在調查中也顯示約有 88% 的耆老至今仍對教育勅語有深刻印象，修身教育最高的指導綱要即是教育勅語，而教育勅語中又充滿著神聖的天皇光環與皇民思想，在修身科與教育勅語的同時耳濡目染下，很難說修身教育對臺灣人的國家認同不會有影響。

而林育柔（2004：146、148）在訪談耆老的過程中發現修身教科書的內容與教育勅語的精神可說是充分結合，並且學童幾乎能真正實踐教育勅語的精神，如有些耆老認為「我們那時候上的修身課，大概跟現在的公民課差不多，但是以前修身課的教學重點，是著重在身體力行的道理上。」此外，教育勅語中強調的「忠君愛國」、「君臣一體」的思想也呈現在「成為好兒童」與「成為好日本人」的認知中，透過道德實踐的活動，也將修身教育的精華——教育勅語內化於心中。

就訪談的耆老來說，對於日本的修身教育大多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他們認為教育勅語所談及的道德內涵與大和精神不僅僅表現在修身教科書上，也展現在教師的言行舉止上，教師本身就是個學習典範，而也是影響最

深遠的。由上可知修身教育所隱含的政治意識型態與認知價值對當時的孩童來說是從未被質疑與反抗的，而此學習過程也漸漸地型塑了人們的國家認同感。

林增堃（2007）在「日據時期在臺灣人格教育的研究—以初等教育修身課程為中心」一文中，針對 90 名耆老作有關修身教育之問卷調查，其中有 73 位耆老認為修身教養授予他們的知識、學習成就是最豐碩或是很多的，比例約佔 80%，這比國語會話（67%）、讀書作文（56%）、習字繪畫（37%）、算數珠算（48%）、唱歌遊戲（34%）、體操運動（54%）、史地理科（32%）及家事勞作（36%）都還要高。而在修身教科書德目之分析上，林增堃將德目分為「自身」、「家庭」、「學校」、「社會」及「國家」方面，而受訪者認為在國家方面中「愛國」德目的學習成就（70%）僅次於學校方面的「尊師」德目（97%）以及家庭方面的「孝順」德目（71%），卻高於其他方面的 73 個德目，可知修身教育當時對於國家意識的培養有一定的功效。

教育是無形地灌輸意識形態，甚至可以改造人的思想。對統治者來說，要形塑所期待的國民精神，教育是最快也是最不激烈的手段。筆著也認為日本治臺修身教育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色彩，但也不能說修身教育只是「殖民地化」的工具。因為對當時臺灣人來說，也造成不少正面且深遠的影響。當然，也必須瞭解人民國家認同的型塑不僅僅是透過教育政策，社會活動、政治體制等等也是影響國家認同很重要的因素，如接受過皇民化運動的臺灣人在對日本的國家認同意識上應該比統治初中期的人們來的更強烈，畢竟他們曾受過一連串密集的皇民化政策，如改姓名、說國語、拜神社等等。

第四章 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分析及其回憶

本章將分析對耆老的訪談內容，瞭解身處於當時的庶民對於日本教育政策的印象與感想。此外，也透過訪談分析來探究修身課程與國家認同之關係。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訪談大綱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個人訪談方式讓受訪者自由回想，盡量避免限制受訪者的陳述內容。同時訪談過程中，大概會問到有關日本人教師、教科書、學校生活等等回憶。受訪者的選定條件為：

- 一、 受過日本教育的臺灣人(不含原住民)。
- 二、 年齡限制為 1923 年出生(現在約 85 歲)到 1935 年出生(現在約 73 歲)。
- 三、 目前仍會使用日文溝通者。

以下是各位受訪者的簡歷，因受訪者不希望公開全名，在此只公開姓氏，而受訪者(D)用希望能以假姓氏代替。

表 4-1 受訪者的簡歷

受訪者	性別	出生地	出生年	受過日本教育的種類
許男士 (A)	男性	臺北市	1926 年	寿公學校(基隆)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背景陳述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之後在總督府企劃部就職。
劉女士 (B)	女性	桃園縣中壢市	1932 年	崇屋公學校
				受訪者是客家人。崇屋公學校畢業後，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太好，所以沒有繼續讀書，幫忙家事。
張女士 (C)	女性	苗栗縣頭份	1929 年	頭份公學校
				受訪者是客家人。頭份公學校畢業後繼續讀高等科。因為受訪者

	的數學能力強，後來在巴士公司做會計工作。			
李男士 (D)	男性	南投縣新庄里	1929年	新庄里公學校
	新庄里公學校畢業之後到花蓮的醫院擔任藥劑師。			
林女士 (E)	女性	臺北縣三重市	1927年	宮田公學校
	宮田公學校畢業後，因為戰爭的關係，暫時搬到南部，戰後在裁縫方面的公司就職。			

貳、訪談大綱

在訪談過程中，將會讓受訪者自由回想，盡量避免限制受訪者的陳述內容。在適當的時機中，將會按照其陳述內容，挑選下列適合的訪談大綱，讓其繼續訪談。

- 1 您還記得修身科與修身教科書的內容嗎？請大致說明一下。
- 2 您還記得「教育勅語」的內容嗎？
- 3 您還記得學校何時會奉讀「教育勅語」？
- 4 您認為修身科與教育勅語是否有傳達國家意識？
- 5 您還記得在課業外，學校有舉辦哪些活動？（升旗、唱國歌、拜神社、祭典…）
- 6 您還記得日本時期的教師嗎？這些教師給您的感覺是什麼？
- 7 您認為日本教師在修身課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 8 當時日本教師是否會傳達國家意識？如講一些戰爭、國家的事蹟。
- 9 當時對於日本人的感覺如何？會覺得與日本人不一樣嗎？
- 10 作戰時候的感覺？會希望日本打贏嗎？
- 11 當日本戰敗時，聽到臺灣「回歸祖國」的消息時，您的想法是怎樣？

第二節 修身教育

本研究主要是從修身教育層面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民之國家認同問題。且由上述資料可知，修身教育對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在訪談過程中也主要以修身教育為主軸，關於修身教育訪談內容與分析如下：

壹、修身教育之訪談內容

表 4-2 修身教育之回憶

受訪者	訪談內容
許男士 (A)	<p>筆者問：您還記得修身科嗎？</p> <p>「我記得沒有修身科。我只記得修身是要學在教科書裡面的很多歷史上偉大的人，比如說楠木正成，這個人很重視忠義等等。日本在臺灣統治五十年，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教修身的時候，以自身為榜樣教學生。」</p> <p>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嗎？</p> <p>「(開始唸教育勅語…)我還記得，但不是全文。有的同學到現在還會唸全文。我已經畢業了，都八十歲了。大概國民學校四年級的時候開始背教育勅語。我們背教育勅語，然後教師教我們教育勅語的內容。教育勅語的內容是修身。就是學道德啊，忠孝等。這個非常好。對每個國家來說這個很重要。」</p> <p>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p> <p>「那時候覺得沒有啊，就是上課。裡面就是講人要怎樣怎樣，要有道德、愛國、孝順啊！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覺得就是應該要這樣！不過現在想起來，可能有一些是要傳達愛國意識吧！因為內容好像都有講到日本的偉大、天皇的貢獻等等，不過那時候是小孩子根本不懂什麼國家意識啦！」</p>
劉女士	<p>筆者問：您還記得修身科嗎？</p>

<p>(B)</p>	<p>「禮貌、孝順、節省，跟教育勅語一樣。(開始唸教育勅語…)。還有…路上碰到人要低頭啊，走別人的後面啊，走廊是要靜靜地走啊，還有忍耐。教科書是每年一本，一個星期一次，只有禮拜一。」</p> <p>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嗎？</p> <p>「(開始唸教育勅語……………)。星期一朝會的時候，副校長拿教育勅語來(模仿副校長的動作：好像是很恭敬的把他放在額頭上拿來)，然後校長開始唸。學生就低頭聽。」、「稍微懂。教師有教一點。日本人很注重教育，很重視下一代，很注重小孩子。」</p> <p>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p> <p>「應該有吧！雖然裡面大部分是有關品行、道德的東西，不過好像都會提到要愛國家、尊重天皇，還會講一些偉大的人的事，這樣算有國家意識吧！不過沒什麼不好啊！本來國家教育就要這樣啊，從小才會愛國！」</p>
<p>張女士</p> <p>(C)</p>	<p>筆者問：您還記得修身科嗎？</p> <p>「修身科是固定周一的第一個科目。主要學之前的偉大的人物、作法等。教師教我們學這些人物。人物是忘記了，比如說這個人做了什麼偉大的事情啊，怎麼忠義啊等。」</p> <p>「教科書的表面是黑色。然後沒有幾張，主要學修業。地理跟國史的教科書很厚。」</p> <p>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嗎？</p> <p>「內容忘記了。」「天皇的生日啊…日本祭日等時候會奉讀。有一點忘記了。唱日本國歌之後高年級生奉讀教育勅語，被選的是發音標準的學生。因為要給大家聽，所以一定要發音標準。下課之後跟教師練習發音、怎麼上臺、怎麼打開教育勅語、怎麼收</p>

	<p>教育勅語、怎麼轉身、怎麼敬禮等（受訪者都有動作）。參加的人都是高年級的學生，低年級的學生會吵鬧而且不太懂教育勅語的意思。被選奉讀教育勅語的學生覺得很榮譽、很高興，但是有壓力，而且要多練習。」</p> <p>筆者問：您懂教育勅語的內容嗎？</p> <p>「現在忘記了！不過那時候應該懂，校長和老師都會說！不過那時好像自己看會看不懂，一定要老師講！」</p> <p>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p> <p>「多多少少吧！不過好像比較有印象都是在講道德倫理的事，國家也是一種倫理啊！所以感覺也不是故意傳達國家意識啦！現在的教育也是會介紹國家啊，講一些國家的事！都會這樣啦！」</p>
<p>李男士 (D)</p>	<p>筆者問：您還記得修身科嗎？</p> <p>「尊敬別人、忠孝父母、尊敬前輩等。學習怎麼做人。」</p> <p>「用教科書。大概一個星期一次而已。修身的內容是人的修業。」</p> <p>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嗎？</p> <p>「(開始唸教育勅語…)還記得一點。當時大家都要背。那時候大家都會唸。」</p> <p>「忠義啊，那時候是為了天皇是第一。」</p> <p>「朝會，不是每天，在運動場。六年級的代表奉讀教育勅語。每天有升日本國旗，也有唱日本國歌。校長的教訓的內容是主要講當時的情況。戰爭的情況等。可以說新聞的東西。當時校長都是日本人。很少有臺灣人的校長。」</p> <p>筆者問：您懂教育勅語的內容嗎？</p>

	<p>「老師有講啦！但是忘記了，不過好像要背，大家都會唸吧！如果老師沒講會不懂吧！」</p> <p>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p> <p>「修身科好像還好，就是尊敬、孝順、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沒有特別強調國家意識吧！不過感覺教育勅語好像就有一點點，因為那時天皇第一呀！不過那時還是不太懂教育勅語，老師有解釋啦！好像就是宣揚日本的好，要大家愛國。」</p>
<p>林女士 (E)</p>	<p>筆者問：您還記得修身科嗎？</p> <p>「記得有修身科，但是內容都忘記了…。好像有教科書。」</p> <p>「大部分都忘記了，但歷史記得一點，比如說乃木將軍每天早上潑冰水洗澡等。」</p> <p>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嗎？</p> <p>「我有記得有教育勅語，但忘記了。(筆者開始奉讀教育勅語就跟著我唸)。你開始唸就想起來了，以前的東西很難想起來。」</p> <p>「內容太複雜，不太懂那個意思。」</p> <p>「朝會和二月十一號的紀元節等節日。副校長拿教育勅語來，然後校長開始唸。很嚴肅。校長帶很長的劍，穿的衣服很正式還有勳章，我記得那個校長雖然很嚴格但是給我的感覺是很有帥氣。」</p> <p>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p> <p>「這個很難講啦！但是應該是有吧！課本好像講了很多日本偉大的人，當時就希望能像這些偉大的人一樣，就是要為國家貢獻啊！教育勅語內容太複雜，不太懂內容，但是就是知道要愛國家、要節儉、要孝順，好像還有講到要尊敬天皇。這些不是學校都要教的嗎？這樣算是有國家意識嗎？大概有一點點吧！」</p>

貳、修身教育之訪談分析

一、修身科之回憶

透過這五位耆老們的回憶可知「修身」科的課程授課時數並不多。B、C女士們、D男士都認為一個星期一次，甚至A男士認為沒有修身此科。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對「修身」教育的印象很深刻。

A男士認為「修身」是透過其他的教科書學了歷史上的偉大的人物，特別是楠木正成等為國家做事的忠義人物。也認為教育勅語就是「修身」之意。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教修身的時候，以自身模仿教學生。B女士認為「修身」是要學禮貌、孝順、節省等。也有認為教育勅語就是「修身」之意義。C女士認為「修身」是學習為國家做事的忠義人物、學習日本作法等。D男士認為「修身」是學習尊敬別人、忠孝父母、怎麼做人。E女士認為「修身」是學習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怎麼做人。從五位受訪者的回憶可以整理「修身」之特色具有「修身教育基於教育勅語」、「修身教育涵養兒童之德行」、「修身教育重視禮義、作法」、「修身教育強調對於國家社會責務」。

雖然每一個受訪者認為的修身有些許不同，但根據回答可知耆老們認為的修身與公學校規則的基本原則大同小異。這表示當時的修身教育都依照公學校規則而行，也可以說當時的修身教育成效與其目標有相當的一致性。

筆者接下來問修身教科書內容是大部份的受訪者不記得或只記得教科書的樣子。C女士認為修身教科書的頁數沒有幾張，與歷史、地理的教科書比起來很薄。從此也可以知道雖然「修身」科是所有教科中最被重視的一個科目（王錦雀，2005：149），但實際上受訪者的回憶中的「修身」並不代表「修身」科，而是其他科目或學校生活中、教師所教授的或教育勅語裡的「修身」才是受訪者回憶中的「修身」。

二、教育勅語之回憶

臺灣公學校的課程都是以教育勅語為最高指導原則，修身科的基本核心概念就是依照教育勅語而制訂。根據 1922 年制訂之「公學校規則」中提及「修身教育需教導學生教育勅語之旨趣，並指導兒童德性之涵養與道德之實踐。修身教育必須從近易適切之事項教授兒童人倫道德之要旨，漸進地再教授其對國家與社會之責任，要學生養成遵守國法、崇尚道德公益並能形成風氣（轉引自祝若穎，2004，129）。」

透過訪談筆者發現，受訪者對教育勅語的印象非常深刻。雖然無法記得全文，但到現在還對奉讀教育勅語一事印象深刻。而且耆老們都記得什麼時候、什麼人奉讀教育勅語。從受訪者的回憶可知，在朝會或日本祭日等儀式時會奉讀教育勅語，而且儀式的氣氛相當不同，大部分耆老都認為是莊嚴肅靜的、戰戰兢兢的，從受訪者記憶猶新的動作也可知奉讀教育勅語的重要性，不論是奉讀教育勅語的時間、人物、動作，都具有特別的意義，從這些細微的細節，不需教師多作言語，當時的學生即可從整個儀式中瞭解到教育勅語的崇高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詢問「教育勅語」的內容時，大部分的受訪者只懂教育勅語的「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這部份。其他部分，有的受訪者雖還記得教育勅語的文字，但卻不懂內容的意思。筆者認為這可能跟當時臺灣兒童的國語能力有很大關係，教育勅語的文字對於兒童來說可是相當艱澀，又類似於文言文，連日本兒童可能對教育勅語都未能完全瞭解，更何況是臺灣兒童，當時兒童主要是多透過師長們的講解才能理解。

此外，雖然耆老們對於教育勅語的詳細文字內容無法完全理解，但卻能記得教育勅語主要的核心概念，這可能是因為許多臺灣人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對於教育勅語提及的個人修養、家庭倫理與國家關係能認同。從第二章文獻得知，教育勅語和中國儒家文化相關性高，對於當時臺灣人來說，他們是很能認同教育勅語所談到的道理，也認為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理原則，雖

然教育勅語中國家認同的對象不是中國而是日本，但對當時的兒童來說可能還懵懵懂懂，也不是最重要的事。受訪者對教育勅語的理解度並不高，但都認為當時「教育勅語」是相當重要的，由此可知教導學生教育勅語的目的並不只是讓學生理解教育勅語之旨趣，也是透過捧讀的儀式把教育勅語神聖化並將教育勅語中具有濃厚儒家文化的思想灌輸給兒童、讓臺灣兒童培養國民精神之意義。

三、有關修身科與教育勅語所傳達的國家意識

大部分的耆老都認為修身科和教育勅語主要是敘述倫理道德、個人修養方面的內容，不過還是摻有國家意識的成分，如 A 男士、B 女士、C 女士與 E 女士都認為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或多或少都有傳達國家意識，而 D 男士則是認為修身科沒有傳達國家意識，但教育勅語似乎有這樣的意味。但是耆老們對於這樣的作法並沒有什麼反對的意見，甚至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如 A 男士所說：「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覺得就是應該要這樣」；B 女士：「不過沒什麼不好啊！本來國家教育就要這樣啊，從小才會愛國！」；C 女士：「國家也是一種倫理啊！所以感覺也不是故意傳達國家意識啦！現在的教育也是會介紹國家啊，講一些國家的事！都會這樣啦！」；E 女士：「這些不是學校都要教的嗎？這樣算是有國家意識嗎？大概有一點點吧！」。由此可知，當時的教育方式並沒有讓學生有明顯覺得不妥，或許是因為當時耆老們年紀還小，不瞭解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所隱含的國家意識，但現在耆老們回想起來也大多能認同這樣的教導，他們認為愛國是理所當然的，若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國家意識傳遞可說是非常成功。

第三節 日本人教師

壹、日本人教師之訪談內容

A 男士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是教師教修身的時候，以自身模範教學生。」從這句話可知，教師在修身教育中的重要性。這節主要探討受訪者對日本人

教師之回憶及教師與修身之關係。

關於日本人教師訪談內容如下：

表 4-3 日本人教師之回憶

受訪者	訪談內容
許男士 (A)	<p>筆者問：還記得日本人教師嗎？</p> <p>「聽說臺灣的教師比韓國、琉球的教師好。教師們非常親切。我入學國民學校一直都是日本人教師。完全不會講臺語的日本人教師，用日文上課。有愛心的去教書。雖然教師有時候非常嚴格，但教師罵學生一定有道理。不會亂罵學生。不是用恨去教學生，而是擁有愛教學生。有很多值得尊敬的教師。教師是師範、會守時、節省、不會騙人。不會騙人的是日本人的特徵。」</p> <p>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p> <p>「教師是很嚴格啊！但是不會亂罵人，日本老師都有道理啦！好像是不守規矩的時候會特別兇，日本人很重視時間，有人遲到上課會被罵，還會被罰站！」</p> <p>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p> <p>「有！那時很緊張，怕被罵，不過老師很好，都講一些比較好的話，我爸爸媽媽也很尊敬老師，都很有禮貌啦！那時就覺得日本人很有禮貌，爸爸媽媽也變的很有禮貌，對老師很尊敬！」</p> <p>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p> <p>「不太會講，不過有時候會配合課本說一些吧！但是印象中不多，那時候是小孩子啦！講戰爭也會聽不懂，但是只知道日本應該要贏！那時的氣氛就是這樣，感覺就是要贏才對！沒想到最後居然輸了！」</p>
劉女士	<p>筆者問：還記得之前的教師嗎？</p>

(B)

「一年級是從沖繩來的奧島教師，5年級是岩田教師，校長是黑岩老師。還記得福羽教師。奧島教師當時25歲，50周年的同學會的時候，去沖繩拜訪他家。那個時候教師已經七十多歲，又生病只能在家辦（邊看同學會的照片）。之前教師跟學生的關係都很好。」

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

「禮貌，缺席等。一年級的時候要學遊戲(跳舞)，每天要練一個小時。有一次下課之後教師叫我們自己去練習。但我不去。日本人很會打人家的頭，那時候被打到頭，還流血，但不敢哭。真的很害怕。那時候其他女同學每個人去剪頭髮，但我的親戚不讓我剪頭髮，所以只好我把頭髮編兩個去學校。好害羞。大家笑我鄉下人!!雖然教師叫我去練習遊戲，但因為很害羞就不去啊。」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

「有！有一次教師到我家來訪問的時候，躲在蚊帳下面。爺爺他們一直聊天。我一直等，但是教師還不回家。只好出來跑去廚房煮飯。教師問我怎麼不做功課？我說煮飯啊。教師跟媽媽說你女兒讀書不錯，給她好好讀書。但是沒辦法啊...，很多弟弟妹妹。要照顧啊，做事情啊。教師喜歡會認真讀書的學生。那時候五個孩子裡面我是最大。四年級常常煮飯。還有養豬。很害怕教師來。」

筆者問：有沒有臺灣人教師？

「也有臺灣人教師。好像我們這年級，一個班是臺灣人教師。」

筆者問：教師有取大家日文名字嗎？

「教師幫我們取日文名字。我是ふくまい(福妹的日文發音)。一、二年級的時候都有點名啊。三、四年級就沒有了。」

	<p>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p> <p>「有的老師會講，有的不會講吧！有些老師有說一些戰爭的事情給我們聽，那時覺得幫忙國家打戰的人好厲害，有時後打贏了，感覺大家都是很高興的，老師也是！不過有時候會打輸了！就覺得不開心，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還聽說有些老師會在課堂一直唱軍歌，然後問學生長大後要不要為國犧牲。我有一個同學他就說長大後要去當兵為國家打戰。」</p>
張女士 (C)	<p>筆者問：還記得之前的教師嗎？</p> <p>「五、六年級是從長野來的教師。前幾年有個男同學跟教師聯絡邀請他來臺灣辦同學會。那一次當時的臺灣教師都來。在學校的禮堂辦。那個教師當時很年輕大概比我們大九歲左右。回日本之後結婚。很溫柔的教師。」</p> <p>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p> <p>「當然做壞事就會罵，但是因為我們都是女生所以還好。我記得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沒有被教師打過。一般都聽教師的話，但如果有反抗的就會被處罰。假如書道科的時候忘記道具就教師讓學生回去拿道具等。都是自己不好才會被處罰。還有對學習比較嚴格。如果成績不好就被教師罵，但沒有被打。對男生比較嚴格。男生也比較調皮，所以有時候男同學做壞事就讓他站在教室外面等到下課。教師對平常的操行很嚴格。這個對女生也一樣嚴格。我記得有（復唱ふくめ）fukushoufukume 就是教師說什麼就重複一次之後再行動。比如說教師命令我去別的班級借地圖。我先到教師的面前重複說『我現在開始去別的班級借地圖』，然後到了別的班級不能進去，先在外面跟教師報告，『我是幾年級幾班的誰我來借地圖』，然後有了教師的許可才可以進去，然後跟教師借</p>

	<p>地圖回自己的教室。以前的很嚴格」</p> <p>筆者問：在學校教師叫你什麼？</p> <p>「教師幫我們取日文名字（受訪者不希望公開）。大家都有。教師通常直接叫名字，不會加さん等禮貌的用詞。」</p> <p>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p> <p>「有。跟父母講孩子操行好啊，功課怎麼樣等。」</p> <p>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p> <p>「有，比如說軍機、戰船發生事故的時候給學生聽。還有日本佔領南方的國家時，班長升旗，大家都來到學校運動場慶祝。還有四、五、六年學生揮著日本國旗在學校附近邊唱歌邊行走。朋友都很高興。教師都會跟我們講。」</p> <p>筆者問：有臺灣人教師嗎？</p> <p>「有，大概一半一半。」</p> <p>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補習？</p> <p>「教師下課之後，特別幫我補習。每天下課之後教我幾個小時，有時候在教師的宿舍補習。因為教師這樣教我，才會考上高等科。那個教師不收錢真的很好。有一次在教師的宿舍辦特別訓練。自由參加，老師也不收錢。主要學日本的作法。比如說怎麼坐、怎麼倒茶、怎麼走路通通教我們。我們學了日本的作法。教師很好。」</p>
<p>李男士 (D)</p>	<p>筆者問：還記得之前的教師嗎？</p> <p>「二年級的時候是臺灣人教師。三～五年級是日本人教師。」</p> <p>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p> <p>「有。我那時候當班長，日本人教師叫我發考卷。教師說兩個人一張，但我以為四個人一張，然後把多餘的考卷還給教師的</p>

	<p>時候，教師很生氣。用尺的尖的部份打我的頭。後來我爸告訴家長會的會長，會長跟日本人校長講。最後有道歉。但到現在很恨那個老師。」</p> <p>筆者問：其他教師也是很會打學生嗎？</p> <p>「會打。但通常是學生有錯誤的時候才會打，沒有錯誤就不會打。那個日本人教師很誇張，脾氣很不好。也有很多溫柔的教師。這麼被恨的教師很少。」</p> <p>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p> <p>「大概每年都有。主要在學校怎麼樣啊，功課怎麼樣，在家裡的生活等等。」</p> <p>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p> <p>「有。日本軍在哪裡勝利等。幾乎每天跟學生報告。日本勝利時很开心，我是有日本精神。現在很懷念日本。光復的時候也開心祖國的中國來，但這開心一下就變成失望。他們的教育，道德都很低、很失望。在中國政府統治下覺得是在受苦。日本人對臺灣人也當然不平等。但他們更誇張。」</p>
林女士 (E)	<p>筆者問：還記得日本人教師嗎？</p> <p>「一到三年級時臺灣人教師，四到六年級是日本人女教師。日本人教師很嚴格，臺灣人教師比較疼學生。」</p> <p>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p> <p>「日本人教師很嚴格，整隊的時候如果沒有排好的話，教師把那個人拉出來罵學生。還有去上課都要穿制服，然後要帶手帕。但有一次拿了一塊布去學校，日本人教師跟我說這個不是手帕，就罵我。雖然我沒有被教師打過，但日本人教師很嚴格。」</p> <p>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p>

「有。教師來我家確認我們有沒有拜“天照大神”。當時政府提倡要拜天照大神，雖然沒有強制，但是最好是拜啦！教師也在課堂上一直說，感覺不拜就好像不好！教師的話最好是聽比較好！」

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

「有。上課的時候會稍微講到一點，然後感覺日本一定會打贏，有時後也會教我們一點有關戰爭的歌啊！那時候也真的希望日本能贏！」

貳、日本人教師之訪談分析

一、懲罰之回憶

透過耆老們對日本人教師的回憶中可知道當時的日本人教師相當嚴格，如果學生做錯事情就懲罰學生。「懲罰」目的於將痛苦的事與所做的惡事聯結，使兒童在海腦中產生印象以防止其再犯（謝佩錦，2005：105）。透過這五位耆老們的回憶可知當時日本人教師對學生的體罰情形相當普遍。B女士、D男士都有被日本人教師被體罰過，A男士、C女士雖然沒有被體罰過，但都承認親自看過體罰的情形。但除了D男士的過度的體罰之外，大家都對日本任教師的懲罰普遍抱有正面的看法，認為教師罵學生一定有道理，自己有錯誤才會被打。那到底日本人教師什麼時候罵學生？透過耆老們的回憶可知日本人教師對學生平常的禮儀、做人做事的道理非常講究，如同A男士的回憶「好像是不守規矩的時候會特別兇，日本人很重視時間，有人遲到上課會被罵，還會被罰站！」；B女士：「禮貌，缺席等」；C女士：「教師對平常的操行很嚴格。這個對女生也一樣嚴格。」；E女士「教師重視整隊與帶手帕」。禮儀、作法是「修身」科重要目標之一，修身教育並非照著教科書照本宣科來教導，而是要透過平常的指導與親身示範才能潛移默化地教授學生，畢竟「身教」來得比「言教」更重要。因此教師常會利用平常的小

細節，來灌輸「修身」概念，而教師本身也以身作則做模範教導學生。這可能使受訪者對日本人教師懲罰的正面看法的原因之一。

二、家庭訪談之回憶

五位耆老中，就有四位耆老提及日本教師曾到家裡作家庭訪問，甚至每年都會進行。這顯示當時日本教師對於學生的家庭教育也有某種程度的重視，並且會與父母溝通學生的在校學習狀況、操行等等。而訪談耆老中有一較特別的是 E 女士，他表示教師到家裡訪問主要的目的是確認學生家裡是否有參拜天照大神，從此可知，當時教師在涵養國民精神教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僅僅只是在學校教授課本的內容或是指導學校活動，也不斷提倡政府的政策，教師是政策重要的宣傳者，當時教師的地位很高，對於學童而言，教師的話不敢不聽，如同 E 女士說的「教師的話最好是聽比較好」，而教師也深入學生家庭，瞭解學生家庭進行皇民化運動的情況。

三、戰爭時期之回憶

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後，日本治臺政策進入所謂的「皇民化時期」。此一時期的教育目標旨「練成皇國民」（王錦雀，2002：107）。公學校教師也成為皇民化運動重要的宣傳者之一。耆老們大多提及教師會在課堂上提及有關戰爭之情事，A 男士：「不太會講，不過有時候會配合課本說一些吧！」；B 女士：「有的老師會講，有的不會講吧！有些老師有說一些戰爭的事情給我們聽。」；C 女士：「有的，比如說軍機、戰船發生事故的時候給學生聽」；D 男士：「有。日本軍在哪裡勝利等。幾乎每天跟學生報告。」；E 女士：「有。上課的時候會稍微講到一點，有時後也會教我們一點有關戰爭的歌吧！」，這樣一來，學生很容易就進入戰爭的思緒，並跟著教師的思想走，自然而然就認為要愛國。在課堂上傳達戰爭的事蹟，也難免灌輸一些國家認同意識，如 A 男士就認為「講戰爭也會聽不懂，但是只知道日本應該要贏！那時的氣氛就是這樣，感覺就是要贏才對！」；B 女士：「那時覺得幫忙國家打戰的人好厲害，有時後打贏了，感覺大家都是很高興的，老師也是！不

過有時候會打輸了！就覺得不開心，也不知道為什麼。」；C女士：「還有日本佔領南方的國家時，班長升旗，大家都來到學校運動場慶祝。還有四、五、六年學生揮著日本國旗在學校附近邊唱歌邊行走。朋友都很高興。」；D男士：「日本勝利時很開心，我是有日本精神。現在很懷念日本。」；E女士：「那時候也真的希望日本能贏！」。從這些回憶看來，當時國家認同教育可說是成功的，雖然耆老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就是希望日本能戰勝，且聽到戰勝的消息時，耆老還會有開心的感覺，這就是認同國家的表現。而有些教師還會在打勝戰時，舉行慶祝活動（升國旗、揮國旗），這些行為在無形中都會培養學生的愛國意識。甚至於D男士還認為自己是具有日本精神，而B女士的同學還願意為日本打戰，這是非常難得的，也代表著當時的耆老是認同日本的。

雖然耆老印象中的教師大部分都會實行體罰教育，但是耆老們卻能給予肯定，因為他們也瞭解體罰的用意在於培養學童的禮儀、生活常規與做人做事態度，透過耆老們的回憶可知對日本人教師的印象大致上是嚴格、認真、也有愛心的。

第四節 學校生活與活動

壹、學校生活與活動之訪談內容

在第三章已說明學校生活、活動是能影響孩童國家認同的形塑，以下針對此部分進行訪談分析：

表 4-3 學校生活與活動之回憶

受訪者	訪談內容
許男士 (A)	<p>筆者問：國民學校的時候有沒有去拜神社？</p> <p>「有啊。而且每個學校都有小小的神社。比如說天皇的生日等節日，大家一起去神社，圓山有一個神社，那裡很好。好像後來變成神宮。戰敗之後就自然沒有了。」</p>

筆者問：大概都什麼時候去拜神社？很常去拜嗎？

「好像蠻常去的，我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但是忘記是不是有固定時間，不過有重要的節日一定會去啊！不止學生，有些臺灣人也會去拜神社。」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就拜拜啊！日本神社的拜法和我們的廟很不一樣，那時候老師都會教，去之前上課就會學，就是要先洗手啊！然後要很恭敬敬禮，那時都要九十度敬禮，日本人很講求禮貌啦！拜完後，有時候會叫我們整理一下環境啊！會拔草。」

筆者問：有沒有記得朝會？

「在朝會的時候，奉讀教育勅語，每個老師都有帶很長的劍，還有帶像明治時代的帽子。有很神奇的氣氛。日本的典禮很多。那時候的朝會跟現在差不多吧！就是升旗啊！校長講話啊！不過比較嚴肅，大家都不敢亂動或講話，因為怕被老師罵。」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好像是我畢業後，戰爭才比較嚴重啊！那時在讀書時，老師只會在課堂上講一點點，記得沒有什麼有關戰爭的活動。但是畢業後，就常聽到戰爭的事情，政府也會說啊！然後戰爭打到最後，好像還希望我們去當兵。」

筆者問：節日時有進行祭典典禮嗎？

「有啊！特殊的節日都會慶祝。元旦、紀元節、天長節還有明治節都會慶祝，都有唱國歌或校歌，然後會唸教育勅語，也會對日本的方向和天皇敬禮，不止學校，很多地方都有慶祝活動，也都掛著國旗。」

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大家都乖乖的，然後要低著頭聽上面唸教育勅語。很開心過節，但是在慶祝時又要安靜恭敬地聽讀教育勅語。不過那時會放假很高興。小孩子嘛！」

筆者問：還記得國語課嗎？

「還記得一點，Hana(花)，Hata(旗)，Tako(風箏)，然後越來越多。一開始沒有漢字，然後慢慢會有漢字。日本語是平假名，片假名，但是中國人一開始就漢字。學漢字會吃力。覺得很難。」

筆者問：在學校主要使用的語言是？

「當然就是日文，那時叫國語。老師很嚴格，規定我們只能說國語，他說不然就學不會，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講，老師不在就跟同學偷偷用臺語啦，很怕被發現，會被罵。」

筆者問：記得申請學校的事情嗎？

「入學的時候，如果一個班有一百個人，那八十個人是日本人，剩下二十個人是臺灣人。」

筆者問：考試的時候日本人跟臺灣人有沒有不公平？

「考試是當然按照成績，但是比如說臺灣人的話八十分才及格，日本人的話六十分就及格這樣子。我是第二商業，家庭有經濟困難，所以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去學校唸書。三十個人是臺灣人，七十個人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入學成績大概六十分到七十分，但臺灣人的成績是七十分到八十分。有這一種不公平。臺灣人很優秀才能考上。其實因為殖民地嘛，統治者跟被統治者所以沒辦法。」

劉女士
(B)

筆者問：早上幾點上課？

「七、八點就去啊。走路去，很遠。不會遲到。上課是八點開始。(還記得校鐘的聲音)上課的時候大家坐的好好。」

筆者問：教師有取大家日文名字嗎？

「教師幫我們取日文名字。我是ふくまい(福妹的日文發音)。一、二年級的時候都有點名啊。三、四年就沒有了。」

筆者問：有沒有上日本歷史？

「有啊!地理、歷史什麼都有。修身、國語、算術、地理跟歷史好像是五年級開始上課。」

筆者問：都是日本的嗎？

「日本的歷史，臺灣的都有。臺北盆地啊，臺北的地形等等。富士山很高，蘋果很大等等。教科書都丟掉了！那時候不知道珍惜啊，如果現在的想法就會通通藏起來。」

筆者問：上課是穿什麼樣的衣服？

「我們學校沒有什麼制服啊，那個時候有配給的衣服，但是只有三~五件。抽到的人才有。都沒有衣服穿啊。他們穿裙子，我就穿褲子啊，很害羞。鄉下人才會穿褲子啦。我就沒辦法穿裙子，只好穿褲子啊。我們家庭沒辦法跟他們生活在一起。跟不上他們。自卑很重。家庭是比較古老的想法。帶便當也沒有盒子裝，用竹子做的裝。不敢帶。給人家笑啊。很害羞，很可憐。」

筆者問：有沒有大家一起去拜神社？

「有啊。(哼唱中壢神社的歌)我是平鎮的人。平鎮是中壢再過去的地方。校長也很喜歡。(哼唱平鎮的歌)。中壢神社的歌，平鎮的歌都是校長做的歌。去拜神社的時候，有時會一起唱中壢神社的歌。」

筆者問：大概都什麼時候去拜神社？很常去拜嗎？

「我們都是一個班級一個班級輪流去拜，應該是每個月都有班級去神社。」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老師會要我們安靜，那時候就會尊敬神社啊！去的時候會唱中壢神社的歌，然後就拜拜。打戰的時候，老師會在神社祈求戰爭成功，我們就跟著老師拜，天皇生日時也會拜，會有表演。」

筆者問：學校有朝會嗎？

「每天都會升旗的樣子，就要對國旗愛護、尊敬，還會唱國歌，我現在還記的一點點（哼起君之代）。」

筆者問：有校歌嗎？

「好像沒有。忘記了。有一次年輕教師出征的時候，大家一起唱『我喜歡的教師是日本海軍的海兵，被招的老師，今天真的恭喜』這也是學校做的歌。」

筆者問：會進行祭典典禮？

「像是有節日會有慶祝儀式，那時候最大的節日好像有四個，元旦新年（元月1日）、紀元節（2月11日）、天長節（4月29日・）、明治節（11月3日），這四個一定會有慶祝活動的，然後一定會唸教育勅語，校長會把教育勅語放在頭頂上恭敬的讀，大家要安靜地聽，然後大家都有背，所以心裡會跟著念，但沒有唸出聲音，會被罵，念的時候要很專心，然後記得老師會帶我們去神社拜拜，也是慶祝的活動之一。」

筆者問：幾年級的時候開始打戰？

「三、四年級的時候開始打戰。」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有啊！五六年級時候比較多，因為戰爭變的很激烈的樣子，會練習防空演習，有時後朝會還會教我們唱軍歌，說要為國犧牲，長大後要貢獻國家。然後有些老師也被調去戰場，好像是當兵還

	<p>是作一些處理事務的工作，忘記了！然後有時後就沒上課，都在講一些國家的事。」</p> <p>筆者問：那時候覺得您希望日本贏嗎？</p> <p>「當然啊～～～。希望啊。每天唱歌啊。教師每天講。」</p> <p>筆者問：你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p> <p>「那時候在學校不用日語就會被教師罵。當時我記得路邊的電線桿上面有貼紙，“国語を話せば心は光る”（講國語心就會亮）。」</p> <p>筆者問：六年級的時候大概幾個人申請學校？</p> <p>「我的班八十六個人裡面大概五～六個人去申請學校。很少。那時候八十六個人裡面女生是二十八名，男生很多。」</p> <p>筆者問：有去畢業旅行嗎？</p> <p>「沒有，沒有錢…那時候很窮。畢業的時候要開茶會，沒有買糖果。我們都拿一碗米去？將米炒一炒，然後當作糖吃，一個人分一碗。就這樣吃。普通是有很多糖果。姊姊學長他們就有很多。我們那個時候很緊急的時候。」</p> <p>「畢業還跟人家去挖防空洞，阿兵哥穿ふんどし。我怕的要死。阿兵哥沒有穿褲子，通通年輕人。他挖出來之後讓我倒啊。就跟他們挖啊。挖防空洞一個洞一個洞。」</p>
張女士 (C)	<p>筆者問：怎麼進行祭典典禮？</p> <p>「天長節、明治節、紀元節等時候。學校給學生一些甜點。一個人兩個這樣。大家都到禮堂集合、唱國歌之後，會有校長的校訓。內容是關於天皇的生日，天皇對人民的貢獻等等，讓學生理解。」</p> <p>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p> <p>「學校好像很重視祭典！好像會往日本的方向站，要向國旗</p>

或是天皇神像鞠躬敬禮，大家都不敢講話啊！很正式，教師都會在旁邊看，也會一起作，反正整個過程都是很恭敬的，不敢亂來啦。」

筆者問：有畢業旅行嗎？

「有，但是因為那時候大家的經濟狀況不太好，所以參加的人大概三十個，我們班有六十多個人所以大概一半。自由參加。我們去臺南看鄭成功的古蹟，還有去看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神社，看一些歷史的東西。還有安平附近的做鹽的地方跟養虱目魚的地方。做鹽因為太熱所以大家都不穿和服只有圍毛巾而已。在教科書學的東西沒有親自去看過。虱目魚也是之前不知道它們吃什麼長大，後來去養成場看餵食虱目魚吃人的糞便，看到虱目魚吃人的糞便後來不敢吃虱目魚了。還去了動物園等。那時候我們坐夜行的火車去，在車上唱歌非常愉快。」

筆者問：公學校時有沒有去拜神社？

「有。離學校一公里的地方有神社。比如祭日的時候大家都帶一把竹掃把一列一列地跑步去神社開始打掃。打掃完之後有什麼儀式，神社的主持會用樹枝做的工具，在我們身體周圍揮一揮，好像是有消災解厄的功能。然後結束又跑回學校。」

筆者問：大概都什麼時候去拜神社？很常去拜嗎？

「就是祭日的時候！」

筆者問：平常學校會帶你們去拜神社？

「好像有！好像教到有關神社的東西時，有帶我們去拜。」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老師就教怎麼拜，大家要跟著做，我們就排得很整齊，跟著老師做，老師說拜神社要很恭敬。」

	<p>筆者問：學校有朝會嗎？</p> <p>「每天有朝會，所有的學生到運動場，然後男同學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大家先敬禮之後校長開始講校訓。」</p> <p>筆者問：幾點開始上課？</p> <p>「我們大概七點半到學校，然後先打掃。比如說為了專門給學生洗手，把水桶裝滿水，然後放在教室外面。痰盂、洗手間的打掃等。都是高年級的學生做。」</p> <p>筆者問：你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p> <p>「那時候在學校都要講國語，有同學不小心講臺語，就被老師罰站，上課老師用國語上課，下課大家也要用國語。」</p> <p>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p> <p>「好像是五六年級時候有一些。校長會講一些戰爭的話，然後好像很激動的樣子，就是很愛國的感覺，然後告訴我們長大要貢獻國家，那時戰爭好像還好，不過會作一些軍事演練，不管男生女生都要！但是不多。」</p>
<p>李男士 (D)</p>	<p>筆者問：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p> <p>「那個時候在學校不能用臺語。如果說臺語就會處罰。還有那時候學生之間有一個板子，上面寫“我是用臺語”，如果用臺語就被掛那個板子，然後再去找用臺語的學生。這樣輪流掛。回到家我們都用臺語，但有錢人的家庭用日文。」</p> <p>筆者問：學校有朝會嗎？</p> <p>「有朝會啊，不是每天，在運動場。六年級的代表奉讀教育勅語。每天有升日本國旗，也有唱日本國歌。校長的教訓的內容是主要講當時的情況。戰爭的情況等。可以說新聞的東西。當時校長都是日本人。很少有臺灣人的校長。然後告訴我們要愛國，</p>

我記得有時後好像還會講一些戰爭士兵比較英勇的事蹟，感覺那些人好像很偉大、很厲害，會為國犧牲。」

筆者問：您還記得在學校學的日文歌嗎？

「很多。到現在還常常唱啊」

筆者問：公學校時有沒有去拜神社？

「有的學校，學校裡面就有小的神社，我們的學校就沒有。學校附近也沒有神社。我記得臺中比較多。不過上課老師都會教我們要怎樣拜神社呀！日本的神社是什麼之類的，但是我家很少拜啦！那時爸媽還是比較習慣拜傳統中國的神明，還有祖先呀！」

筆者問：有畢業旅行嗎？

「有，但我們家庭經濟不好所以沒有去。有錢的家才去畢業旅行。大部分的國民學校都去臺北，很少有去日本畢業旅行的國民學校。」

筆者問：怎麼進行祭典典禮？

「天長節、明治節等時候，印象中好像會放假，不過有點忘記了！在學校會辦儀式，記得有唱歌和念教育勅語。天長節是四月二十九日、明治節是十一月三日。天長節是天皇的生日，那時候是昭和天皇。」

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感覺就是很重要吧！因為全部的人都要參加呀！好像老師還是校長會穿的比較不一樣，全部的人都要站的好好的，老師會講一些有關節日的重要性，或是節日的由來，有時後校長也會講一些！那時候就覺得天皇好像很偉大，不過很有距離感，感覺就是高高在上啦！」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p>「會講一些戰爭的事。有做過敵人如果打來了要怎麼躲怎麼逃的活動，我們還會去勞動服務，種田啊、搬東西，都跟戰爭有關，應該是要拿去打戰吧！那時不太懂，老師說怎麼做就這麼做！現在想想應該是跟打戰有關吧」</p>
<p>林女士 (E)</p>	<p>筆者問：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p> <p>「臺語比較多。在教師的面前要用日語，但是下課之後跟同學用臺語聊天，回到家還是用臺語。」</p> <p>筆者問：還記的朝會嗎？</p> <p>「每天有，唱日本國歌之後升旗。還有校長的教訓。」</p> <p>筆者問：還記的日文歌嗎？</p> <p>「“君之代”還有“蛍の光”記得一點點還有一些軍歌。」</p> <p>筆者問：學校有沒有去拜神社？</p> <p>「每個月二十號一個班輪流去神社。那時候圓山飯店後面有臺灣神社，我們都去那裡拜拜。」</p> <p>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p> <p>「那時很怕老師，帶我們去神社，也都很安靜，上課也會說要怎麼拜拜，要誠心誠意、要洗手、要鞠躬敬禮等等。老師都會講解，大家都乖乖地聽，然後會做一遍，之後去神社，大家都會拜了。」</p> <p>筆者問：有畢業旅行嗎？</p> <p>「有，我們是去臺中。那時候有天皇的兒子來臺中在糖廠種樹，大家一起去看。一共有五天。只是不是每個人參加，有錢的才可以參加。我爸爸在鐵道公司上班所以車票有打折。」</p> <p>筆者問：還記的什麼節日？怎麼進行祭典典禮？</p>

「天長節、紀元節、天皇的生日等，還有五月五號兒童的日子，兒童的日子記得有“こいのぼり”（鯉幟）。重要節日的話在學校辦儀式，每年都會慶祝這些節日，要唱國歌或校歌吧，我們還有去神社拜拜！有些地方還有慶祝活動，像是演戲。」

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校長、全校老師都會在啊！有的老師會穿比較不一樣的衣服，很特別，但是忘記了，只記得為了慶祝會有不一樣的衣服！。大家都會在操場啊，一定會讀教育勅語，大家跟著念，要立正站好，老師都會在旁邊，要站的很直，就覺得那是個很重要的活動。」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在學校沒有。我五六年級開始打戰，後來就畢業了。」

貳、學校生活與活動之訪談分析

從以上耆老訪談可歸納出，當時學校的活動大概有每日的朝會、祭拜神社、節日的慶典儀式與畢業旅行。朝會主要就是升旗與校長的訓詞，有的還會奉讀教育勅語，升旗與校長的訓詞也是一種國家意識的培養，國旗是國家有形的象徵，當時甚至還將「國旗」列為修身教科書中的一課，教導學生尊重國旗就是愛國家的表現，透過朝會對國旗的敬重，培養學童的愛國思想。而校長的訓詞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複製，校長可說是一種權力的代表，當時的校長多由日本人擔任，很自然地會傳遞政府倡導的理念與原則，也會傳達一些愛國思想，如 D 男士的回憶裡就說：「校長都是日本人。很少有臺灣人的校長。然後告訴我們要愛國，我記得有時後好像還會講一些戰爭士兵比較英勇的事蹟，感覺那些人好像很偉大、很厲害，會為國犧牲。」無意識中灌輸愛國精神，有助於國民精神的培養。

此外，日本是一個相當重視神道信仰之國，在修身教科書中就選錄許多有關神宮、祝祭等與神道有關之課程（祝若穎，2004：133）。除了教科書

外，學校也特別重視此方面活動，在耆老的訪談中，可以知道在五位耆老的公學校中，雖然僅有一間學校內設有神社，但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祭拜神社的活動，而 D 男士說雖然學校及附近都沒有神社，但教師也會在課堂內教授有關祭拜神社的事宜。涂爾幹（E. Durkheim）曾指出宗教具有凝聚性，宗教提供了一種內聚的功能，能使人們更團結一致，加強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繫、增進社會團結，而集體中的成員不斷反覆進行宗教儀式或祭典，會使人們感到共同的情感，也會有共同的行動，宗教信仰及慶典可以說是凝聚人民認同意識的重要力量，有助於人們重新肯定共同的束縛且能凝聚人們的心。

因此由國家來主導宗教信仰，的確能夠激發人們對於國家的認同及培養國民精神，日本當初就透過教育來指導學童認同日本的宗教文化，企圖養成臺灣人民的皇民性格。當時的神社不但是信仰中心，也是皇民精神的象徵，因此祭拜神社是學校很重要的活動，幾乎都會固定時間去祭拜神社，如 A 男士：「好像蠻常去的，我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B 女士：「我們都是一個班級一個班級輪流去拜，應該是每個月都有班級去神社。」；E 女士：「每個月二十號一個班輪流去神社。」，且參拜神社時的氣氛是嚴肅、恭敬的，甚至還會帶領學生在神社祈禱戰爭的勝利，這些都是有教育意義的，讓孩童在教授與祭拜神社的過程中，熟習日本傳統信仰，進而接受，慢慢同化成與日本人一致的日本皇民。

基本上，學校在每逢祭日或節日時學生不必到學校上課，各地神社也有祭祀活動。通常在如紀元節、天長節、明治節、一月一日及始政紀念日等紀念性節日，學校會舉行慶祝活動。通常在舉行祭祀典禮時，奉讀教育勅語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五位耆老的記憶中，就有四位仍記得在典禮進行時需奉讀教育勅語，甚至還有一些愛國儀式，如 A 男士：「都有唱國歌或校歌，然後會唸教育勅語，也會對日本的方向和天皇敬禮」；B 女士：「一定會唸教育勅語，校長會把教育勅語放在頭頂上恭敬的讀」；C 女士：「唱國歌之後，會有校長的校訓。內容是關於天皇的生日，天皇對人民的貢獻」；D 男士：「在

學校會辦儀式，記得有唱歌和念教育勅語」及 E 女士：「大家都會在操場啊，一定會讀教育勅語，大家跟著念，要立正站好」。不論是國歌或教育勅語都具有國家的象徵，透過共同的活動，製造共同的集體記憶，由一群人共同分享歷史傳統、習俗規範、文化習慣，會容易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也將會產生對共同體的認同。

此外，在典禮上的氣氛大致是莊嚴嚴肅的，無形中也教導孩童對祭祀或慶祝對象及儀式的尊敬，如 A 男士：「要低著頭聽上面唸教育勅語。……要安靜恭敬地聽讀教育勅語。」；B 女士：「大家要安靜地聽，然後大家都有背，所以心裡會跟著念，但沒有唸出聲音，會被罵，念的時候要很專心」；C 女士：「要向國旗或是天皇神像鞠躬敬禮，大家都不敢講話啊！很正式，教師都會在旁邊看，也會一起作，反正整個過程都是很恭敬的，不敢亂來」；D 男士：「感覺就是很重要吧！因為全部的人都要參加呀！好像老師還是校長會穿的比較不一樣，全部的人都要站的好好的，……那時候就覺得天皇好像很偉大，不過很有距離感，感覺就是高高在上啦！」；E 女士：「要立正站好，老師都會在旁邊，要站的很直，就覺得那是個很重要的活動。」儀式中所塑造的氣氛，也足以讓學童瞭解活動的重要性。慶祝儀式的目的不在儀式的本身，而是在進行儀式的過程中，陶冶孩童的歷史共識、文化認同與皇民精神，進而提升國家認同感。

到了戰爭期，公學校亦會舉辦各種有關戰爭的活動，讓學童瞭解自己與日本是種「生命共同體」的關係，要與日本共體時艱。如 B 女士：「會練習防空演習，有時後朝會還會教我們唱軍歌，說要為國犧牲，長大後要貢獻國家。」；C 女士：「校長會講一些戰爭的話，然後好像很激動的樣子，就是很愛國的感覺，然後告訴我們長大要貢獻國家，那時戰爭好像還好，不過會作一些軍事演練，不管男生女生都要！」；D 男士：「會講一些戰爭的事。有做過敵人如果打來了要怎麼躲怎麼逃的活動，我們還會去勞動服務，種田啊、搬東西，都跟戰爭有關，應該是要拿去打戰吧！」。

在作戰期間，學校仍會傳遞一些統治者的意識型態，要對國家服從與忠誠，要為正在進行戰爭的國家做些什麼，而軍歌的教唱，更是具有濃厚的國家政治色彩，這些意識的傳達與教授，均有助於達成皇民化的目的及國家認同，

學校的各項儀式祭典屬於潛在課程，透過各種慶祝活動來強化學童的認同感，這樣的活動本身就充滿著價值判斷，甚至可說是一種政治性的活動，標示著天皇的神性，也無形中教授學童日本文化，使孩童培養日本式的思考模式、經驗與大和精神，讓學童能真正同化於日本。

第五節 非學校教育體制

壹、非學校教育體制之訪談內容

雖然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公學校修身教育對當時臺灣人民國家認同的形塑與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除了學校教育外，從非學校教育體制的生活情況來看，也可以一窺當時庶民的生活景況與國家認同情形。以下為非學校教育體制生活之訪談分析：

表 4-4 非學校教育體制之回憶

受訪者	訪談內容
許男士 (A)	<p>筆者問：記得國語家庭嗎？</p> <p>「國語家庭是常用日語的家庭。如果被認定了就是一個榮譽。一種鼓勵吧。可以當成日本人。被國語家庭認定的話，配給會增加。比如說糖，豬肉的配給一斤變成兩斤。鹽的話，臺灣很多。主要是米啊，糖啊，豬肉。當時連番薯的葉子都是配給。戰爭的時候生活很苦。配給的船被敵國攻擊等。」</p> <p>筆者問：很多人被認定國語家庭嗎？</p> <p>「被認定的審查比較難。而且每個區長啊，他們認定的標準不一樣。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嚴格等等。國語家庭是影響到</p>

生活。所以大家都想被認定所以拼命學習。」

筆者問：您有改姓名嗎？

「有的人改姓。但我是比較固執，所以沒有改姓。改姓的人通常是整個家庭很喜歡日本。會改姓的爺爺，奶奶，他們都想當日本人的家庭。我家附近大部分都是臺灣人。因為大家都沒有改，所以大家覺得不必要那麼急…這樣子。」

筆者問：有去當兵嗎？

「臺北商業二年級的時候，當了志願兵。在學校裡面只有我。」

筆者問：那是強制嗎？

「應該說半強制。警察來我家好幾次，然後跟母親說現在去志願兵是非常榮譽的事情，而且遲早會去當兵，那現在去比較好等很多理由。然後我母親只好簽名。到了學校才發現簽名的只有我。有兩千多個學生裡面只有我上臺。大家鼓勵我。然後開送別會。那時候有升日本國旗。然後校長跟其他學生講許君是本校第一個志願兵，大家應該學他的愛國精神，然後慶祝入兵。」

筆者問：在哪裡當兵？

「我是去高雄，高雄的左營。那裡是海軍志願兵的訓練所。非常嚴格的訓練。那裡有一個山，叫壽山。我們是海兵團，海軍志願兵在壽山訓練。在壽山挖隧道，挖到臺灣海峽。如有敵艦來的話，背炸彈之後靠近敵艦五十米左右，然後確定炸彈會撞到敵艦時候，跳到自國艦，真的很像特攻隊。還好敵國沒有上陸臺灣，但那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掉。當時是人生就是二十歲。大家都這麼覺得。臺灣的志願兵的人覺得自己是日本人，而且愛國精神也不能輸給日本人，這樣覺得。」

筆者問：你有被日本人欺負過嗎？對日本人的感覺？

	<p>「我們家附近大部分都是臺灣人，我接觸到了日本人就是學校老師，他們都很好啊，很有禮貌，不會欺負我們。不過聽說有些日本人會看不起臺灣人，我那時沒有這種感覺，但是會覺得日本人和我們有點不一樣，就是有點距離，很尊敬他們，不會排斥他們，只是有些比較年長的臺灣人就不太喜歡日本人。」</p> <p>筆者問：聽到日本戰敗的時候的感覺是？</p> <p>「那時候很突然，聽到十二點有天皇的傳播，就覺得很奇怪。然後知道日本人戰敗，我的感覺不是開心而是失望。因為一直喊必勝，然後突然輸掉。覺得終於輸了，以後該怎麼辦，這種感覺。聽說很多臺灣人聽到這消息就切腹了。」</p>
<p>劉女士 (B)</p>	<p>筆者問：爸爸媽媽會講日文嗎？</p> <p>「爸爸媽媽不會講日文。只有我還有弟弟，妹妹他們。那時候很窮啊，根本沒辦法讀書。」</p> <p>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p> <p>「不知道。」</p> <p>筆者問：你有改姓嗎？</p> <p>「沒有，教師的親戚啊，會讀書的才會改姓。因為我們是鄉下，如果改姓就被嫌棄。日本人像狗。我爸爸媽媽不喜歡日本。看到日本人就不喜歡。老人家看到日本人覺得日本人看不起我們的感覺。」</p> <p>筆者問：你有被日本人欺負過嗎？對日本人的感覺？</p> <p>「我是沒有被日本人欺負的感覺。因為我是學生嘛。我是日本的教育嘛。很喜歡日本。很羨慕教師他們。現在的大陸人我們也很排斥阿。現在也很排斥，會說他們是豬，日本人是狗。但是日本人是有人情味。豬只知道吃。臺灣人是這樣想的。大陸人是</p>

	<p>豬，日本人是狗。所以會懷念日本，日本時代很好、很有規矩、很乾淨、很自然、很誠實。現在很懷念日本。現在受過日本教育的人都很懷念日本。我們那個時代很快樂。」</p> <p>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p> <p>「附近很少日本人住。因為很鄉下。我們很怕他們，也尊敬他們。如果日本人住在我們的附近我們就對他們很客氣。看他們很有禮貌，很友愛他們。」</p> <p>筆者問：日本人跟臺灣人感覺有一點距離嗎？</p> <p>「有啊，好像又害怕又有尊敬。很有潛力很有份量。」</p> <p>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p> <p>「我認識的人沒有，不過知道有人有，那時戰爭到後面時，政府都一直鼓勵要參戰，所以有些人有志願！那時有志願的人，家裡都要感到很光榮，因為可以去為國家打戰，有些日本人還會去他們家恭喜。」</p> <p>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p> <p>「很失望。日本贏的時候很开心。教師都有講。巡迴的時候很开心，好多麵包，一個人一個。有唱(唱歌)。但不知不覺輸掉。很失望。」</p>
張女士 (C)	<p>筆者問：爸爸媽媽會講日文嗎？</p> <p>「爸爸媽媽不會講日文。之前的人沒有受過教育。大家種田很少人去上課。」</p> <p>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p> <p>「記得，但是我們家爸爸媽媽不會講日文所以不是國語家庭。」</p> <p>筆者問：你有改姓嗎？</p>

	<p>「那是跟日本有關公司上班或者開比較大的公司等有钱人才會改。如果在有關日本公司上班不改姓的話，不會被日本人承認。一般的老百姓就不會，而且不知道怎麼申請。」</p> <p>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p> <p>「沒有。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村。他們大家一起住。」</p> <p>筆者問：你有被日本人欺負過嗎？對日本人的感覺？</p> <p>「我給日本人管的時間不長，就是在當學生的時候，那時候沒有被欺負，全班都是臺灣人啊！老師才是日本人，但是他們也不會欺負我們！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圈，活動範圍也跟我們不一樣，不太會接觸，對日本人的感覺就是很守時，有點嚴肅，到現在會懷念那個時候，雖然嚴肅，但是很有規律，不像現在的學生，有些很不像話，我們那個時候很好，日本人那時很會教育。」</p> <p>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p> <p>「住在隔壁村的人有，他好像是受到學校的影響吧，那時他好像是念中學還高等科，他自己想去為日本打戰，覺得作戰是很光榮，不過他媽媽好像很難過，後來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回來。那時聽到很多人都去當兵，不過有的是被強迫的。」</p> <p>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p> <p>「知道日本輸了還是很難過，這麼強的國家輸掉了…。很懊悔。」</p>
<p>李男士 (D)</p>	<p>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p> <p>「記得，我們父母不會講日文所以沒有被認定。一個村裡面大概一、兩個家庭。有钱的家庭才會被認定。」</p> <p>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p> <p>「沒有。派出所的日本人的家庭而已。」</p>

	<p>筆者問：日本人時代有沒有覺得被欺負的感覺？</p> <p>「不平等，配給也不平等。但比中國人對我們好多。教育也有一些差別待遇。公學校是臺灣人，小學校是日本人。能進入小學校的臺灣人是很少。還是會有不公平的地方，不過後來國民黨來了更慘，日本人感覺比較厚道嚴謹，不會亂來！」</p> <p>筆者問：還記得日本警察嗎？</p> <p>「記得。也有臺灣人的警察。那時候臺灣人當了警察就非常榮譽的事情。那時候附近有一個巡查擔任主任，名字叫“ししの”他非常嚴格我們都非常害怕他，如果被他叫到派出所的話，快尿出來似的害怕。我們那時候是配給，農家收穫的東西都給政府，然後政府發給我們配給的票。但是農家是勞動所以比較容易餓，所以收穫的米等要藏起來。但如果被發現的話，被警察抓之後被打。在腳的關節夾住棍子並跪在地上，然後用木棍打壓背部。很可怕。當時的警察權力太大。」</p> <p>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p> <p>「我的鄰居就有，他自己去申請的，知道被選上很高興，很多人也都替他高興，他覺得很榮耀吧！」</p> <p>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p> <p>「又開心又難過，一半一半。」</p>
<p>林女士 (E)</p>	<p>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p> <p>「記得，我們家沒有。父母不會講日文。」</p> <p>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p> <p>「有。隔壁家就是日本人。他們看不起我們。我們有一次吵架。」</p> <p>筆者問：對日本人的印象？</p>

「現在還會想到那時候，我有幾個朋友也受過日本教育，有時候聊天都會聊到，我們會懷念那個時候，日本人對我們很嚴格，但是管得很好，大家都有精神、有禮貌，不敢做壞事。但是隔壁那個日本人對我們不好，會罵我們。」

筆者問：您有改姓嗎？

「我們沒有改姓，有一點半強制大家一直拖，就戰爭結束了。」

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

「知道那時有要人去當兵！還要去訓練，覺得去打戰很厲害、很佩服，不過也有的不是去當兵，是去戰場作一些工作。」

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

「只是覺得結束了。沒有什麼感想，但是有一點點難過，會覺得為什麼輸。不過有些人很高興日本輸，有些人比較愛中國，那時候的老師很可憐。回日本之前在路上賣東西，就被臺灣人罵，臺灣人那時很壞，還欺負人家。」

貳、非學校教育體制之訪談分析

一、對日本人的印象

五位耆老中，有三位表示未受到日本人的欺負，甚至對日本時代還抱持著懷念的心態。如 A 男士：「我接觸到了日本人就是學校老師，他們都很好啊，很有禮貌，不會欺負我們。不過聽說有些日本人會看不起臺灣人，我那時沒有這種感覺」；B 女士：「我是沒有被日本人欺負的感覺。因為我是學生嘛。我是日本的教育嘛。很喜歡日本。……現在受過日本教育的人都很懷念日本。我們那個時代很快樂。」；C 女士：「我給日本人管的時間不長，就是在當學生的時候，那時候沒有被欺負，全班都是臺灣人啊！老師才是日本人，但是他們也不會欺負我們！」。而 D 男士與 E 女士雖然有被欺負的感覺，但基本上還是能肯定日本時期的統治，如 D 男士：「不平等，

配給也不平等。但比中國人對我們好多。……不過後來國民黨來了更慘，日本人感覺比較厚道嚴謹，不會亂來！」而 E 女士：「現在還會想到那時候，我有幾個朋友也受過日本教育，有時候聊天都會聊到，我們會懷念那個時候。」

而在對日本人的感覺這方面，耆老們大部分給予正面的評語。如 B 女士：「日本時代很好、很有規矩、很乾淨、很自然、很誠實。」；C 女士：「對日本人的感覺就是很守時，有點嚴肅，到現在會懷念那個時候，雖然嚴肅，但是很有規律」；D 男士：「日本人感覺比較厚道嚴謹」；E 女士：「日本人對我們很嚴格，但是管得很好，大家都有精神、有禮貌，不敢做壞事。」不過在正面的肯定中，仍可以感受到當時日本人與臺灣人的差異，A 男士就提及：「會覺得日本人和我們有點不一樣，就是有點距離，很尊敬他們，不會排斥他們」；B 女士：「不平等，配給也不平等。但比中國人對我們好多。教育也有一些差別待遇。公學校是臺灣人，小學校是日本人。能進入小學校的臺灣人是很少。」C 女士：「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圈，活動範圍也跟我們不一樣，不太會接觸」，雖然當時日本積極想要同化臺灣民眾，但在庶民的眼中，自己還是與日本人的地位不同，是具有差異性的。

二、日本戰敗的感覺

五位耆老都經歷了戰爭時期與皇民化運動期。此兩個時期，除了讓當時人民感受到與日本擁有「共同命運」外，也顯示出當時民眾對於日本的國家認同。A 男士曾說：「知道日本人戰敗，我的感覺不是開心而是失望。因為一直喊必勝，然後突然輸掉。覺得終於輸了，以後該怎麼辦，這種感覺。聽說很多臺灣人聽到這消息就切腹了。」；B 女士：「很失望。日本贏的時候很開心。……但不知不覺輸掉。很失望。」；C 女士：「知道日本輸了還是很難過，這麼強的國家輸掉了…。很懊悔。」；E 女士：「只是覺得結束了。沒有什麼感想，但是有一點點難過，會覺得為什麼輸。」這些都透露出四位耆老聽到日本戰敗的消息是會難過的，在內心裡，會希望日本贏，可見他們

在某個程度上已經對日本具有認同感，會期待日本戰勝，甚至 A 男士還說有臺灣人因為日本戰敗而切腹自殺，因戰敗而切腹自殺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會這樣做的臺灣人，顯然已經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

但從耆老的訪談也可以看出，當時有部分民眾對於日本的戰敗是充滿著矛盾的心情，如 D 男士說：「又開心又難過，一半一半。」；E 女士：「不過有些人很高興日本輸，有些人比較愛中國」。由此可知，當時臺灣人民對於國家的情感與認同是很不一致的，有些人已經逐漸認同日本，但仍有些人還是對漢族具有強烈的認同意識，這種狀況從日本統治初期到結束一直存在，但卻也不能完全否認日本國家認同教育的成功。

三、戰爭體制下的皇民化

自從 1937 年進入戰爭階段，總督府進行一連串的皇民化措施，從耆老的回憶中，也可以感受到當時政府的積極行為，雖然當時他們只是學生，也沒有被登記為國語家庭或改姓，但他們對於當時的皇民化措施能記憶深刻。此外，由於戰爭後期，戰況激烈，總督府鼓勵臺灣人民從軍為國犧牲，在耆老的回憶中，都有過自己或是知道他人為日本當兵的事實，如 A 男士他就是自己本身為日本作戰，雖然是半強制的，但是卻受到肯定，那時候的校長說鼓勵大家應該學他的愛國精神，然後慶祝入伍。

而 A 男士本身也認為「臺灣的志願兵的人覺得自己是日本人，而且愛國精神也不能輸給日本人。」而其餘四位耆老是知道有人從事志願兵為國服務，而這些自願兵都受到相當大的尊重與禮遇，如 B 女士：「那時有志願的人，家裡都要感到很光榮，因為可以去為國家打戰，有些日本人還會去他們家恭喜。」；C 女士：「在隔壁村的人有，他好像是受到學校的影響吧，那時他好像是念中學還是高等科，他自己想去為日本打戰，覺得作戰是很光榮」；D 男士：「我的鄰居就有，他自己去申請的，知道被選上很高興，很多人也都替他高興，他覺得很榮耀吧！」；E 女士：「知道那時有要人去當兵！還要去訓練，覺得去打戰很厲害、很佩服。」願意為國家犧牲性命，可

說是已經具備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

小結

總結上述的訪談內容，發現「修身」對耆老們來說，是公學校教育的重要核心，修身是教導他們做人做事的道理，修身教育不僅僅在教科書，從教師、學校活動，甚至是非學校體制的生活都隱藏著修身教育。而從耆老們對教育勅語記憶猶新來看，教育勅語是當時公學校教育重要的指標，也是培養皇民精神最直接的依循原則，同時也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傳遞。

對耆老們而言，日本教師的形象多是正面的，雖會採取體罰方式，但卻能讓學生自發性的瞭解是本身的疏失，也多能接受教師的處罰。而從不同時期來看，教師也會隨著國家局勢的轉變，改變對學生的態度與教授方式，如在戰爭時期，就會灌輸一些軍國思想。

學校活動的舉辦，表面上只是例行性的活動，但透過儀式的進行，加深了對慶祝對象的尊重（如天皇），也加深了對國家的認知，這些不僅僅是希望能在典禮儀式上同化孩童，也期望能一併同化孩童的思想。

基本上，雖然有些耆老能切實感受到當時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差異，但對日本人的評價傾向正面，且從耆老的回憶中發現，有些臺灣人甚至有些已認定自己為日本的一份子，願意為日本作戰犧牲，可見當時的部分臺灣人的國家認同較偏向日本。

透過這次的訪談，發現耆老們對日本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在訪談的過程中，當耆老在回憶時，時常開懷大笑，也很親切地想與筆者分享當時就讀公學校的種種生活，相信這段過往應該在他們的人生中特殊的經歷。讓筆者驚訝的是這些耆老大部分只接受公學校的日語教育，但他們卻依然能流利的使用日文，甚至日文的用法相當漂亮，可見當時的國語教育推行的相當成功。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教育政策隨著殖民政策轉變

教育政策通常是殖民政策重要的一環。為了縮小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差異，殖民母國通常會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達到目的。而教育政策就是操控殖民地人民思想的重要利器。而教育政策的實施通常會隨著時代的政治背景、國家情勢與文化需求而改變，每個階段的背景、情勢與需求不一，教育政策就必須有所調整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而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殖民政策與教育政策的演變有三階段：

一、無方針及漸進主義時期（1895~1918）

由於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再加上臺灣島民對於日本的接受出現了不少武力對抗的事件，因此日本國內對於殖民的統治政策也出現許多派別，日本最終採取與日本國內迥異的統治方式，給予臺灣總督極大的權力來統治臺灣。當時的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對臺灣的統治方針是採取「隨機應變、順應需求」的無方針及漸進主義，採取生物學的觀念對臺灣人民施以漸進性的統治，統治重心主要為政權根基的穩固與經濟建設。而在這段無方針的統治時期中，教育政策的基本方針也是如此，沒有明確的方向，這段期間可說是教育的實驗階段，此階段時期的教育特色為「混合式的同化教育」、「推動國（日）語教育」、「差別的教育制度」。

二、大正民主及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1937）

一次大戰期間，日本國內瀰漫著民主思潮，臺灣的知識份子也感受到民主的力量，紛紛表達對於日本政府的不滿與建議。由於大環境的變動，總督府也只能調整對臺的統治政策，於是從「無方針主義」邁向「內地延長主義」。首先取消的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以文官代替武官，並希望達到一視同仁，

認為臺灣的人種與文化可以達到與日本一致。雖然當時臺灣的許多政治制度上並無確實與日本本土人民做到一視同仁的目標，但這個理念卻持續存在此階段中。而教育政策也有所調整，開始有了教育的明確方針—「臺灣教育令」、「新臺灣教育令」。臺灣教育令主要是確定了臺灣教育的方向；而新臺灣教育令則是以「普及教育」、「廢除差別待遇」與「開放臺日共學」為主要教育目標。

三、 軍國民主義時期（1938~1945）

1930年代，日本充斥著法西斯主義思想，侵略中國成為當時日本的主要對外策略，不斷在中國製造事變，終於導致1937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也因此進入戰爭體制，當然也包括臺灣。由於戰爭的日趨激烈，臺灣也成為戰爭的補給站。為了因應長期作戰及取得國防資源，日本治臺政策進入皇民化政策、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要讓臺灣民眾甘願為日本政府付出奉獻，就必須讓民眾徹底地皇民化，總督府進行一連串的措施。教育政策也配合著皇民化政策發展，在此階段公布了「國民學校令」，企圖讓臺日人就讀同樣的學校，而義務教育的實施也是為了培養為國為天皇的皇民精神。

貳、 以同化為目標的教育政策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就不斷標榜著以文明開化教育。並且要以「取捨文明各國之規則」來振興全國學校，來提升日本國民的知識水準。伊藤博文擔任日本首相期間，進行了各項學制的修訂、教育令或學校令的制訂，也確立了以天皇為國家體制的教育政策，實施以國家為主軸的國家主義教育，這樣的教育原則也在治理臺灣的期間表露無遺，為了使臺灣民眾能成為以國家為首、以天皇為主的日本國民，總督府的各期教育政策都有同化的意味，只是根據時間的不同，同化的積極性與落實性有差異。

一、 無方針及漸進主義時期（1895~1918）

雖然日本統治初期是的教育政策採取無方針及漸進主義，但實際上仍是

有同化的目的。為達到同化目的，總督府一方面以「無方針」、「漸進式」的原則循序漸進，避免臺灣人民過度的反感；一方面則以「混合式同化」來教育臺灣民眾，混合式同化包括了語言與思想。這時期，書院與公學校並存，漢文與日語並存，要以漸進的方式讓臺灣民眾習慣接受日本的統治；而在思想方面，希望能借著日本與中國共同的儒家思想來同化臺灣民眾，以提高臺灣人對日本政府的接受度。

在同化的過程中，特別重視語言的同化，亦即以普及日語為首要任務，在此階段中，設立不少國語傳習所及公學校。企圖以語言的同化來拉近臺灣與日本的距離，普及日語是同化的手段，同化才是最終的目的。但在以同化為目的的同時，卻又出現差別的教育制度，因此這階段可說是消極的同化階段。

二、 大正民主及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1937）

在內地延長主義下，總督府頒佈了臺灣教育令，正式確立了臺灣的教育制度，但卻又因為語言使用與國民精神的程度差異，硬是推行了教育雙軌制度，在內地延長主義的初期，仍是以消極性的同化為主。但 1922 年頒佈的新臺灣教育令，正式表明著「臺日一致」、「一視同仁」的原則，也規定要「普及教育」、「廢除差別待遇」與「開放臺日共學」，在普及教育方面，的確增設不少公學校；然而在廢除差別待遇與開放臺日共學上，卻仍存在著差別待遇，因而此階段的同化只能說是表面的同化。

三、 軍國主義時期（1938~1945）

在 1937 年後所實施的教育政策以「徹底化皇國精神」與「培養帝國臣民的素養」為首要目標。在前兩時期的同化政策中，還無法將臺灣民眾變成真正的日本人、因此此階段中，以更積極地作為來同化臺灣民眾，其中的國民教育及義務教育最主要目的都是為了能更快速強化臺灣人民的皇民精神。1941 年頒佈的國民學校令，打破以往臺日之間的差異教育體制，使原本只是口號的「臺日共學」真正落實，而為了培育真正的皇民，在教學內容

上不但加重了皇民教育的灌輸，也推動義務教育，讓學童從小就養成皇民性格、大和精神，此階段的同化政策才是落實的同化政策。

參、以同化為目標的修身教育

一、以「教育勅語」為中心的修身教育

1897年，總督府在臺灣頒佈「教育勅語」，除了讓臺灣民眾認識天皇的崇高地位，也希望能培養出具有個人修養、家庭倫理與國家意識的國民，企圖以「教育勅語」來進行同化教育。「教育勅語」的內容詳細地描繪了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完美國民性格，可說是修身教育的最完美境界，也可說是同化的最完美結果。

而能快速真正地落實「教育勅語」的目標則以修身教育為首，修身教育的教育宗旨為「修身乃教授人道實踐的方法，使嫻熟日常的禮儀作法，並且教授教育勅語的大意與本島民眾應遵守的諸項重要制度大要。」修身教育的內容基本上就是以「教育勅語」為指導原則，甚至在修身書的內容上也會將教育勅語置於卷首，擺明了教育勅語的崇高地位。

二、傳遞修身教育的媒介

修身教育的教授媒介，包含有教科書、教師與學校活動，此三種的教授都是根據同化的教育目標進行的，而且也左右著孩童國家認同意識的發展。教科書是「正式課程」，而教師與學校活動都屬於「潛在課程」。

首先，1914年前的修身教育，並無明確的教科書。至1914年（大正三年）時才陸續發行了三期修身教科書。不管是哪一期都是以「教育勅語」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並且以皇國思想為中心、重視社會與國家，強調國家倫理、社會的利益優於個人利益，修身書充滿著同化的意味。而修身書中有關國民精神培養及皇民思想的相關課文，每一期一定都有，且比例都不算太低，從第一期到第三期的比例為19.4%→15.4%→24.8%，第二期可能是因為

處於大正民主時期，民主思想風潮盛行，影響了皇民精神課文的比例。

而由於中日戰爭的爆發，第三期的課文，還增加不少有關戰爭的事蹟。由此可知，修身教科書具有濃厚的同化色彩，讓孩童在學習課文中，也學習大和精神和皇民思想。

其次，因為學校的一切生活跟修身教育有關，因此教師的角色相當重要。教師可說是修身教育中活生生的教材，教師的所作所為、言行舉止，學生都可看的一清二楚，教師也是學生的榜樣，雖然修身教育有明確的教科書，但教師的身教可能比教科書的影響還要大。教師的言談、待人處事能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到「修身」，這是一種潛在課程，這種潛在課程的影響可能不具有立即性，但卻通常有著無比的影响性。

最後，修身教育不只是課堂上，所有的學校活動都具有修身之意義。尤其是日本節日時舉辦的儀式、平日的升旗典禮、教育勅語的捧讀，國歌的合唱、有關國家歌曲的教唱等等，都明顯看出有培養「愛國觀念」的意味。可以說比一星期中一次的修身教科書教授的影響力大，學校的活動及儀式舉辦明顯有國家主義的色彩。從這些活動過程中，學童瞭解學校、教師對於國家的重視、天皇的尊敬，學童自然而然瞭解國家與天皇的重要性，因此學校活動本身就含有同化的意涵。

肆、公學校教育口述歷史

訪問真正受過日本教育的耆老，可以得知當時人們切身的感受，幫助我們更瞭解當時的教育成效，通過訪談筆者發現以下三點：

一、「修身」教育不在於「修身科」，而是學校生活中的修身才是「修身」

雖然受訪者對於一個星期一次的修身課程印象並不深刻，但談及修身教育卻是能侃侃而談，也大多肯定修身教育的重要。可知修身教育並不是課堂上，而是學校生活中學的修身教育更被重視，也更能影響學生。而從訪談中也得知，與學生最親密的「教師」與定期或不定期的「學校活動」是他們記得最清楚的修身教材，而並非修身教科書。這些都讓耆老的印象非常深刻，

也讓耆老從中得知愛國、道德倫理的重要，對於國家認同的塑造有一定的成果。

二、「修身」的確有國家主義色彩，但耆老們認為的修身道德部份比較多。

「修身」教育的確有「國家主義」或「忠君愛國」的層面，耆老們也大多認同修身教育及教育勅語具有國家意識的傳遞，但耆老們多無反對意見，反而認為國家教育本來就應該教授愛國思想。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談者都沒有那麼重視這方面，反而印象最深刻的是道德、禮儀、節約等的修身層面，耆老們認為透過修身教育學會了怎麼做人、做事，這是他們對修身教育的最大印象。

三、在皇民化時期受過教育的耆老對日本具有相當程度的國家認同感。

在皇民化時期長大、受教育的臺灣人民對日本具有相當程度的國家認同感。從訪談中對於日本戰敗時的感想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的臺灣人民的認同的複雜性。日本戰敗時，日本已經統治臺灣五十年，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同化程度很深，但是他們所認同的是日本國家，並不是民族認同。訪談中，所有受訪者非常明白的他們日本人、我們臺灣人之差別，由此可知皇民化時期的長大的臺灣人民國家的認同屬於日本，但不一定是民族認同。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研究對象之建議

目前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之研究偏向於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研究、殖民政策之研究、學校教材之研究等，並未重視當時庶民的國家認同問題。受過日本教育的耆老們也越來越少，因此利用訪談方式來研究當時庶民國家認同，保存研究成果，是刻不容緩的事。本研究只針對漢人為主，但日本統治時期的原住民之國家認同意識也是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有關此方面的研究甚少，希望後人能在此領域，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將會使日本時期

臺灣人之國家認同的研究更加完整。

貳、 研究時期之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對於日本時期臺灣人之國家認同作探討，筆者發現日本時期的臺灣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授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第二是兼受日本教育與國民黨教育的台灣人、第三為新時代的台灣人。這三者的國家認同應該會有明顯的差別。筆者認為可針對此三時期的臺灣人之國家認同作更深入的研究分析。

參、 研究內容之建議

修身教育主要是本研究的探討主體，但日本時期的教育內容範圍廣大，修身教育只是當時塑造國家認同的其中一項科目，舉凡國語教育、歷史教育、地理教育、音樂教育……，都可能在培養孩童國家認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未來可以在各層面的教育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能更充實日本時代國家認同在教育體制下的培育此方面的研究。

參考書目

- 川路祥代 (2001), 《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 (1895~1919)》,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未出版。
- 尹子玉 (2004), 〈日治時代小說中的教師形象〉,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第 10 卷, 第 1 期, 頁 119-131。
- 井出季和太 (2003), 《日據之臺政 (全三卷)》, 臺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
- 王錦雀 (2002), 〈日本治臺時期殖民與教育政策之演變〉, 《公民訓育學報》, 第 11 期, 頁 131-158。
- 王錦雀 (2005), 《日治時期: 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 臺北: 臺灣古籍。
- 白井朝吉、江間常吉 (1939), 《皇民化運動》, 臺北: 東臺灣新報社臺北支局。
- 白柳弘幸 (2003), 〈植民地下臺灣における修身教育--「公学校修身書」徳目分析より〉,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 第 31 期, 頁 22-28。
- 白柳弘幸 (2004), 〈植民地下臺灣に於ける修身科教育--「公学校修身書」徳目分析より〉,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 第 31 期, 頁 22-43。
- 白柳弘幸 (2006), 〈臺灣公学校における修身教育の創始--領有直後から明治末年まで〉,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 第 43 期, 頁 2-16。
- 矢內原忠雄著, 周憲文譯 (2003),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臺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
- 江宜樺 (1997), 〈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25 期, 頁 83-121。
- 江宜樺 (1998),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臺北: 揚智文化。
- 何義麟 (1986), 《皇民化政策之研究: 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臺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 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 吳文星 (1979), 《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 吳文星（1987），〈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上）〉，《臺灣風物》，第37卷，第1期，頁1-31。
- 吳文星（1996），〈日治時期統治政策與體制〉，收錄於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編著《臺灣開發史》，頁201-220，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 吳文星（2000），〈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臺灣文獻》，第51卷，第2期，頁163-173。
- 吳文星（2001），〈近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動向(1991-2000)〉，《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9期，頁221-238。
- 吳文星（2001），〈近五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之歷史研究與人才培育(1945-2000)--以歷史研究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1期，頁163-178。
- 吳文星（2006），〈談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料的發掘與研究的深化〉，《臺灣文獻》，第57卷，第1期，頁311-322。
- 李琪明（2000），《德育課程之理想與建構》，臺北：師大書苑。
- 李筱峰、莊天賜（2004），《快讀臺灣歷史人物（一）》，臺北：玉山社。
- 杜武志（2003），〈日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統治與「一視同仁」政策之剖析(中)〉，《臺北文獻直字》，第145期，頁171-201。
- 杜武志（2004），〈日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統治與「一視同仁」政策之剖析(下)〉，《臺北文獻直字》，第147期，頁171-218。
- 周婉窈（1997），〈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4卷，第2期，頁7-51。
- 周婉窈（2001），〈失落的道德世界〉，《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2期，頁1-62。
- 周婉窈、許佩賢（2003），〈臺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臺灣風物》，第53卷，第4期，頁119-145。
-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宜蘭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宜蘭：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林育柔 (2004),《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臺教育的意識型態取向分析—以修身教育上之實現為例》,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波智 (2004),《對日本臺灣殖民地教育政策之考察》,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增堃 (2007),《日據時期在臺灣有關人格教育的研究—以初等教育修身課程為中心》,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施正鋒 (2004),〈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台灣民主季刊》,第 1 期,第 1 卷,頁 185-192。

泉史生 (2000),〈1930 年代後期公學校卒業生に対する聞き取り調査〉,《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11 期,頁 1-8。

徐南號 (1996),〈日本統治時期對臺灣教育之影響〉,收錄於徐南號主編《臺灣教育史》,臺北:師大書苑。

柴田廉 (1923),《臺灣同化策論》,臺北:晁文館。

祝若穎 (2004),《臺灣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科之德育與同化的取向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張季琳 (2004),〈楊達和沼川定雄--臺灣作家和公學校日本教師〉,《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4 期,頁 155-182。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主編 (1996),《臺灣開發史》,臺北:空大。

張智全 (2003),《桃園地區國中教師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未出版。

莊幸如 (2004),《臺灣日據時代之教育勅語實行—以公學校修身科為中心》,私立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許佩賢 (1994),《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劇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許瀛方（2002），〈日治時期官方觀點之愛國歌曲與國家認同〉，《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22 期，頁 8-13。
- 陳文媛（2000），〈日本の修身教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1 期，頁 105-116。
- 陳伯璋（1996），《潛在課程研究》，臺北：五南。
- 陳君愷（2000），〈師生愛與民族認同的葛藤--高木友枝、堀內次雄及其臺灣學生們〉，《輔仁歷史學報》，第 11 期，頁 189-219。
- 陳思琪（2006），〈臺北地區耆老對 1930 年代日治初等教育之回憶〉，《臺北文獻直字》，第 158 期，頁 55-94。
- 陳振隆（2003），〈教育、意識型態與國家認同〉，論文發表於兩岸交流與國家安全國際研討會，財團法人群策會，臺灣台北。
- 陳培豐（2006），《「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
- 陳啟榮（2005），〈生命教育與潛在課程〉，《北縣教育》，第 53 期，第 51-53 頁。
- 曾素秋（2002），《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黃光雄（2006），《潛在課程的概念》。2008/10/12，電子版，取自：
http://www.dwu.edu.tw/~learn/96_century/95_information/1206/speak.doc
- 楊建成（1995），《臺灣士紳皇民化個案研究：日治時期 450 位台灣士紳改換日本姓氏之個案統計分析》，臺北：龍文出版社。
- 楊素霞（2006），〈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的問題討論為中心〉，《亞太研究論壇》，第 33 期，頁 125-150。
- 廖宜方（2004），《圖解臺灣史》，臺北：易博士文化。

- 臺灣教育會編（1939），《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 劉紀蕙（2004），〈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臺灣文學學報》，第5期，49-83。
- 劉麟玉（2002），〈殖民地時期臺灣學校唱歌教育的成立與展開（1895-1935）〉，《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22期，14-18。
- 蔡錦堂（1997），〈日本統治初期公學校「修身」の一考察〉，《淡江史學》，第7-8期，頁207-216。
- 蔡錦堂（2001），《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2000年度財団法人交流協會日臺交流センター—歷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招聘期間2000年7月1日～8月31日〉，東京都：財団法人交流協會日臺交流センター。
- 蔡錦堂（2006），〈教育勅語、御真影與修身科教育〉，《臺灣史學雜誌》，第2期，頁133-166。
- 蔡錦堂（2007），〈跨越日本與國民黨統治年代的臺灣人之日本觀〉，《臺灣文獻》，第58卷，第3期，頁1-27。
- 鄭力軒譯，荊子馨著（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
- 蕭妙香（2002），《國小教師國家認同教學之研究》，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指導教授在職進修社會碩士學位班論文，未出版。
- 蕭高彥（1997），〈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6期，頁1-27。
- 賴美玲（1999），〈日治時期公學校音樂教科書初探〉，《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4期，3-9。
- 賴美玲（2002），〈日治時期臺灣音樂教科書之研究〉，《藝術教育研究》，第3期，35-56。
- 賴美鈴（2007），〈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式日唱歌」與校歌之研究〉，《臺灣

- 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8 期，頁 2-15。
- 謝佩錦（2005）。《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教師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論文，未出版。
- 謝明如（2005），〈日治時期臺北師範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39 期，頁 9-19。
- 顏義芳（2006），〈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工作者—伊澤修二〉，《菁莪》，第 18 卷，第 4 期，頁 3-10。
- 魏國泰（2006），〈教科書的重要性〉，《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57 期。
- 藤森智子（2000），〈日治初期「芝山巖學堂」（1895-96）教育--以學校經營、教學實施、學生學習活動之分析為中心〉，《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11 期，頁 9-24。
- 鶴見（E. Patricia Tsurumi）（1977）著，《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林正芳譯，（1999），（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初版），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原文於 1977 年出版）。
- 鶴見祐輔（1943；2005）「正伝・後藤新平—決定版（3）台湾時代」，東京：太平洋協會；藤原書店。
- Anthony D. Smith（1991）。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een, L. (1997).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ulletin of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6, 401-410.
- Walters, M（1995）.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附錄一 各學者對於修身教科書之分期

學者	年份	分期	分期方式			
			分期	出版年	書名	卷數
許佩賢	1994	共五期	府定第一期	1910	公學校修身科教授資料	1-3
			府定第二期	1913	公學校修身書	1-6
			府定第三期	1928	公學校修身科書	1-6
			府定第四期	1941	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種	1-2
			府定第五期	1942	ヨイコドモ	上下
初等科修身	1-4					
周婉窈	2001	共三期	第一期	1914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1-6
			第二期	1928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1-6
			第三期	1942	ヨイコドモ	上下
初等科修身	1-4					
周婉窈 許佩賢	2003	共五期	第一期	1914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1-6
			第二期	1928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1930年後書名加第一種	1-6
			第三期	1930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第二種	1-6
			第四期	1941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第一種	1-2
			第五期	1942	ヨイコドモ	上下
1943	初等科修身	1-4				
白柳弘幸	2004	共六期	第一期	1896	臺灣適用作法教授書（教師用）	X
			第二期	1910	公學校修身科教授資料	

					(教師用)	
			第三期	1913	公學校修身書(教師用、 兒童用)	1-6
			第四期	1928	公學校修身書(教師用、 兒童用)	1-6
			第五期	1940	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	1-2
			第六期	1942	ヨイコドモ	上下
					初等科修身	1-4

附錄二 訪談紀錄

以下是五位耆老們的訪談紀錄。利用當天的筆記和錄音儘量描述訪談情況。但有一些無關的話題及重複的話題沒有寫上。另外訪談時用的語言，中文日文都有，因此筆者將自行翻譯成中文，整理幾個項目描述訪談內容。

一、許石枝先生 2007年12月27日，在臺北受訪者家。

跟筆者的關係：通過指導教授的朋友認識。當天是第一次見面。訪談時間約2個小時。

(一) 日本人教師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日本人教師嗎？

「日本在臺灣統治五十年，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教修身的時候，以自身模仿教學生。聽說臺灣的教師比韓國，琉球的教師好。教師們非常親切。我入學國民學校一直都是日本人教師。完全不會講臺語的日本人教師，用日文上課。有愛心的去教書。雖然教師有時候非常嚴格，但教師罵學生一定的道理。不會亂罵學生。不是用恨去教學生，而是擁有愛教學生。有很多值得尊敬的教師。教師是師範、會守時、節省、不會騙人。不會騙人的是日本人的特徵。」

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

「教師是很嚴格啊！但是不會亂罵人，日本老師都有道理啦！好像是不守規矩的時候會特別兇，日本人很重視時間，有人遲到上課會被罵，還會被罰站！」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

「有！那時很緊張，怕被罵，不過老師很好，都講一些比較好的話，我爸爸媽媽也很尊敬老師，都很有禮貌啦！那時就覺得日本人很有禮貌，爸爸媽媽也變的很有禮貌，對老師很尊敬！」

(二) 修身科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修身科嗎？

「我記得沒有修身科。我們學了教科書裡面的很多歷史上偉大的人，比如說楠木正成，這個人很重視忠義等等。」

筆者問：還記得教育勅語？

「(開始唸教育勅語...)我還記得，但不是全文。有的同學到現在還會唸全文。我已經畢業了，都八十歲了。大概國民學校四年級的時候開始背教育勅語。我們背教育勅語，然後教師教我們教育勅語的內容。教育勅語的內容是修身。就是學道德阿，忠孝等。這個非常好。對每個國家來說這個很重要。」

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

「那時候覺得沒有啊，就是上課。裡面就是講人要怎樣怎樣，要有道德、愛國、孝順啊！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覺得就是應該要這樣！不過現在想起來，可能有一些是要傳達愛國意識吧！因為內容好像都有講到日本的偉大、天皇的貢獻等等，不過那時候是小孩子根本不懂什麼國家意識啦！」

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

「不太會講，不過有時候會配合課本說一些吧！但是印象中不多，那時候是小孩子啦！講戰爭也會聽不懂，但是只知道日本應該要贏！那時的氣氛就是這樣，感覺就是要贏才對！沒想到最後居然輸了！」

(三) 學校生活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國語課嗎？

「還記得一點，Hana(花)，Hata(旗)，Tako(風箏)，然後越來越多。一開始沒有漢字，然後慢慢會有漢字。日本語是平假名，片假名，但是中國人一開始就漢字。學漢字會吃力。覺得很難。」

筆者問：在學校主要使用的語言是？

「當然就是日文，那時叫國語。老師很嚴格，規定我們只能說國語，他

說不然就學不會，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講，老師不在就跟同學偷偷用臺語啦，很怕被發現，會被罵。」

筆者問：記得申請學校的事情嗎？

「入學的時候，如果一個班有一百個人，那八十個人是日本人，剩下二十個人是臺灣人。」

筆者問：考試的時候日本人跟臺灣人有沒有不公平？

「考試是當然按照成績，但是比如說臺灣人的話八十分才及格，日本人的話六十分就及格這樣子。我是第二商業，家庭有經濟困難，所以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去學校唸書。三十個人是臺灣人，七十個人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入學成績大概六十分到七十分，但臺灣人的成績是七十分到八十分。有這一種不公平。臺灣人很優秀才能考上。其實因為殖民地嘛，統治者跟被統治者所以沒辦法。」

筆者問：國民學校的時候有沒有去拜神社？

「有啊。而且每個學校都有小小的神社。比如說天皇的生日等節日，大家一起去神社，圓山有一個神社，那裡很好。好像後來變成神宮。戰敗之後就自然沒有了。」

筆者問：大概都什麼時候去拜神社？很常去拜嗎？

「好像蠻常去的，我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但是忘記是不是有固定時間，不過有重要的節日一定會去啊！不止學生，有些臺灣人也會去拜神社。」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就拜拜啊！日本神社的拜法和我們的廟很不一樣，那時候老師都會教，去之前上課就會學，就是要先洗手啊！然後要很恭敬敬禮，那時都要九十度敬禮，日本人很講求禮貌啦！拜完後，有時候會叫我們整理一下環境啊！會拔草。」

筆者問：有沒有記得朝會？

「在朝會的時候，奉讀教育勅語，每個老師都有帶很長的劍，還有帶像明治時代的帽子。有很神奇的氣氛。日本的典禮很多。那時候的朝會跟現在差不多吧！就是升旗啊！校長講話啊！不過比較嚴肅，大家都不敢亂動或講話，因為怕被老師罵。」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好像是我畢業後，戰爭才比較嚴重啊！那時在讀書時，老師只會在課堂上講一點點，記得沒有什麼有關戰爭的活動。但是畢業後，就常聽到戰爭的事情，政府也會說啊！然後戰爭打到最後，好像還希望我們去當兵。」

筆者問：節日時有進行祭典典禮嗎？

「有啊！特殊的節日都會慶祝。紀元節、天長節還有明治節都會慶祝，都有唱國歌或校歌，然後會唸教育勅語，不止學校，很多地方都有慶祝活動，也都掛著國旗。」

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大家都乖乖的，然後要低著頭聽上面唸教育勅語。很開心過節，但是在慶祝時又要安靜恭敬地聽讀教育勅語。不過那時會放假很高興。小孩子嘛！」

(四) 戰爭時期之回憶

筆者問：有去當兵嗎？

「臺北商業二年級的時候，當了志願兵。在學校裡面只有我。」

筆者問：那是強制嗎？

「應該說半強制。警察來我家好幾次，然後跟母親說現在去志願兵是非常榮譽的事情，而且遲早會去當兵，那現在去比較好等很多理由。然後我母親只好簽名。到了學校才發現簽名的只有我。有兩千多個學生裡面只有我上臺。大家鼓勵我。然後開送別會。那時候有升日本國旗。然後校長跟其他學生講許君是本校第一個志願兵，大家應該學他的愛國精神，然後慶祝入兵。」

筆者問：在哪裡當兵？

「我是去高雄，高雄的左營。那裡是海軍志願兵的訓練所。非常嚴格的訓練。那裡有一個山，叫壽山。我們是海兵團，海軍志願兵在壽山訓練。在壽山挖隧道，挖到臺灣海峽。如有敵艦來的話，背炸彈之後靠近敵艦五十米左右，然後確定炸彈會撞到敵艦時候，跳到自國艦，真的很像特攻隊。還好敵國沒有上陸臺灣，但那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掉。當時是人生就是二十歲。大家都這麼覺得。臺灣的志願兵的人覺得自己是日本人，而且愛國精神也不能輸給日本人，這樣覺得。」

筆者問：記得國語家庭嗎？

「國語家庭是常用日語的家庭。如果被認定了就是一個榮譽。一種鼓勵吧。可以當成日本人。被國語家庭認定的話，配給會增加。比如說糖，豬肉的配給一斤變成兩斤。鹽的話，臺灣很多。主要是米啊，糖啊，豬肉。當時連番薯的葉子都是配給。戰爭的時候生活很苦。配給的船被敵國攻擊等。」

筆者問：很多人被認定國語家庭嗎？

「被認定的審查比較難。而且每個區長啊，他們認定的標準不一樣。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嚴格等等。國語家庭是影響到生活。所以大家都想被認定所以拼命學習。」

筆者問：您有改姓名嗎？

「有的人改姓。但我是比較固執，所以沒有改姓。改姓的人通常是整個家庭很喜歡日本。會改姓的爺爺，奶奶，他們都想當日本人的家庭。我家附近大部分都是臺灣人。因為大家都沒有改，所以大家覺得不必要那麼急...這樣子。」

筆者問：你有被日本人欺負過嗎？對日本人的感覺？

「我們家附近大部分都是臺灣人，我接觸到了日本人就是學校老師，他們都很好啊，很有禮貌，不會欺負我們。不過聽說有些日本人會看不起臺灣人，我那時沒有這種感覺，但是會覺得日本人和我們有點不一樣，就是有點

距離，很尊敬他們，不會排斥他們，只是有些比較年長的臺灣人就不太喜歡日本人。」

筆者問：聽到日本戰敗的時候的感覺是？

「那時候很突然，聽到十二點有天皇的傳播，就覺得很奇怪。然後知道日本人戰敗，我的感覺不是開心而是失望。因為一直喊必勝，然後突然輸掉。覺得終於輸了，以後該怎麼辦，這種感覺。聽說很多臺灣人聽到這消息就切腹了。」

二、劉富妹女士 2008年9月7日，在桃園縣中壢市受訪者家。

跟筆者的關係：在網路上認識受訪者的女兒，透過她進行訪談，當天是第一次見面。訪談時間約2個小時。

(一)家庭之回憶

筆者問：爸爸媽媽會講日文嗎？

「爸爸媽媽不會講日文。只有我還有弟弟，妹妹他們。那時候很窮啊，根本沒辦法讀書。」

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

「不知道。」

筆者問：你有改姓嗎？

「沒有，教師的親戚啊，會讀書的才會改姓。因為我們是鄉下，如果改姓就被嫌棄。日本人像狗。我爸爸媽媽不喜歡日本。看到日本人就不喜歡。老人家看到日本人覺得日本人看不起我們的感覺。」

筆者問：你有被日本人欺負過嗎？對日本人的感覺？

「我是沒有被日本人欺負的感覺。因為我是學生嘛。我是日本的教育嘛。很喜歡日本。很羨慕教師他們。現在的大陸人我們也很排斥阿。現在也很排斥，會說他們是豬，日本人是狗。但是日本人是有人情味。豬只知道吃。臺灣人是這樣想的。大陸人是豬，日本人是狗。所以會懷念日本，日本時代

很好、很有規矩、很乾淨、很自然、很誠實。現在很懷念日本。現在受過日本教育的人都很懷念日本。我們那個時代很快樂。」

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

「附近很少日本人住。因為很鄉下。我們很怕他們，也尊敬他們。如果日本人住在我們的附近我們就對他們很客氣。看他們很有禮貌，很友愛他們。」

筆者問：日本人跟臺灣人感覺有一點距離嗎？

「有啊，好像又害怕又有尊敬。很有潛力很有份量。」

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

「很失望。日本贏的時候很開心。教師都有講。巡迴的時候很開心，好多麵包，一個人一個。有唱(唱歌)。但不知不覺輸掉。很失望。」

(二) 日本人教師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之前的教師嗎？

「一年級是從沖繩來的奧島教師，5年級是岩田教師，校長是黑岩老師。還記得福羽教師。奧島教師當時25歲，50周年的同學會的時候，去沖繩拜訪他。那個時候教師已經七十多歲，因為生病，在家(邊看同學會的照片)。之前教師跟學生的關係很好。」

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

「禮貌，缺席等。一年級的時候要學遊戲(跳舞)，每天要練一個小時。有一次下課之後教師叫我們自己去練習。但我不去。日本人很會打人家的頭，那時候被打到頭，還流血，但不敢哭。真的很害怕。那時候其他女同學每個人去剪頭髮，但我的親戚不讓我剪頭髮，所以只好我把頭髮編兩個去學校。好害羞。大家笑我鄉下人!!雖然教師叫我去，但因為很害羞就不去啊。」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

「有!!有一次教師到我家來訪問的時候，躲在蚊帳下面。爺爺他們一直

聊天。我一直等，但是教師還不回家。只好出來跑去廚房煮飯。教師問我怎麼不做功課？我說煮飯啊。教師跟媽媽說你女兒讀書不錯，給她好好讀書。但是沒辦法啊...，很多弟弟妹妹。要照顧阿，做事情啊。教師喜歡會認真讀書的。那時候五個孩子裡面我是最大。四年級常常煮飯。還有養豬。很害怕教師來。」

筆者問：有沒有臺灣人教師？

「也有臺灣人教師。好像我們這年級，一個班是臺灣人教師。」

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

「有的老師會講，有的不會講吧！有些老師有說一些戰爭的事情給我們聽，那時覺得幫忙國家打戰的人好厲害，有時後打贏了，感覺大家都是很高興的，老師也是！不過有時候會打輸了！就覺得不開心，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還聽說有些老師會一直唱軍歌，然後問學生長大後要不要為國犧牲。我有一個同學他就說長大後要去當兵為國家打戰。」

(三)修身科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修身科嗎？主要內容是？

「禮貌、孝順、節省，跟教育勅語一樣。(開始唸教育勅語...)。還有路上碰到人要低頭啊，走別人的後面啊，走廊是要靜靜地走啊，還有忍耐。教科書是每年一本，一個星期一次，只有禮拜一。體操是星期四下午三點。下課的時候六年級的男生，在臺上吹喇叭。」

筆者問：你覺得修身科是把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的課嗎？

「沒有那個意思啦。就是，做人怎麼做到要誠實、孝順、節省、努力。沒有教分開臺灣日本等。日本人很好啊，現在很懷念。」

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

「應該有吧！雖然裡面大部分是有關品行、道德的東西，不過好像都會提到要愛國家、尊重天皇，還會講一些偉大的人的事，這樣算有國家意識吧！

不過沒什麼不好啊！本來國家教育就要這樣啊，從小才會愛國！」

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

「(開始唸教育勅語……。)星期一朝會的時候，副校長拿教育勅語來(模仿副校長的動作：好像是很恭敬的把他放在額頭上拿來)，然後校長開始唸。學生就低頭聽。」

筆者問：有沒有升旗？

「有。忘記是不是每天升旗，但有升旗。歌是君之代(唱君之代)。」

筆者問：您當時懂教育勅語的內容嗎？

「稍微懂。老師有教一點。日本人很注重教育，很重視下一代，很注重小孩子。」

(四)學校生活之回憶

筆者問：早上幾點上課？

「七、八點就去啊。走路去，很遠。不會遲到。上課是八點開始。(還記得校鐘的聲音)上課的時候大家坐的好好。」

筆者問：教師有取大家日文名字嗎？

「教師幫我們取日文名字。我是ふくまい(福妹的日文發音)。一、二年級的時候都有點名啊。三、四年就沒有了。」

筆者問：有沒有上日本歷史？

「有啊!地理、歷史什麼都有。修身，國語，算術，地理跟歷史好像是五年級開始上課。」

筆者問：都是日本的嗎？

「日本的歷史，臺灣的都有。臺北盆地啊，臺北的地形等等。富士山很高，蘋果很大等等。教科書都丟掉了！那時候不知道珍惜啊，如果現在的想法就會通通藏起來。」

筆者問：上課是穿什麼樣的衣服？

「我們學校沒有什麼制服啊，那個時候有配給的衣服，但是只有三～五件。抽到的人才有的。都沒有衣服穿啊。他們穿裙子，我就穿褲子啊，很害羞。鄉下人才會穿褲子啦。我就沒辦法穿裙子，只好穿褲子啊。我們家庭沒辦法跟他們生活在一起。跟不上他們。自卑很重。家庭是比較古老的想法。帶便當也沒有盒子裝，用竹子做的裝。不敢帶。給人家笑啊。很害羞，很可憐。」

筆者問：有沒有大家一起去拜神社？

「有啊。(中壢神社的歌)我是平鎮的人。平鎮是中壢再過去的地方。校長也很喜歡。(平鎮的歌)。中壢神社的歌，平鎮的歌都是校長做的歌。去拜神社的時候，有時會一起唱中壢神社的歌。」

筆者問：大概都什麼時候去拜神社？很常去拜嗎？

「我們都是一個班級一個班級輪流去拜，應該是每個月都有班級去神社。」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老師會要我們安靜，那時候就會尊敬神社啊！去的時候會唱中壢神社的歌，然後就拜拜。打戰的時候，老師會在神社祈求戰爭成功，我們就跟著老師拜，天皇生日時也會拜，會有表演。」

筆者問：學校有朝會嗎？

「每天都會升旗的樣子，就要對國旗愛護、尊敬，還會唱國歌，我現在還記的一點點（哼起君之代）。」

筆者問：有校歌嗎？

「好像沒有。忘記了。有一次年輕教師出征的時候，大家一起唱『我喜歡的教師是日本海軍的海兵，被招的老師，今天真的恭喜』這也是學校做的歌。」

筆者問：會進行祭典典禮？

「像是有節日會有慶祝儀式，那時候最大的節日好像有四個元旦新年（元月1日）、紀元節（2月11日）、天長節（4月29日・）、明治節（11月3日），這四個一定會有慶祝活動的，然後一定會唸教育勅語，校長會把

教育勅語放在頭頂上恭敬的讀，大家要安靜地聽，然後大家都有背，所以心裡會跟著念，但沒有唸出聲音，會被罵，念的時候要很專心，然後記得老師會帶我們去神社拜拜，也是慶祝的活動之一。」

筆者問：幾年級的時候開始打戰？

「三、四年級的時候開始打戰。」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有啊！五六年級時候比較多，因為戰爭變的很激烈的樣子，會練習防空演習，有時後朝會還會教我們唱軍歌，說要為國犧牲，長大後要貢獻國家。然後有些老師也被調去戰場，好像是當兵還是作一些處理事務的工作，忘記了！然後有時後就沒上課，都在講一些國家的事。」

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

「我認識的人沒有，不過知道有人有，那時戰爭到後面時，政府都一直鼓勵要參戰，所以有些人有志願！那時有志願的人，家裡都要感到很光榮，因為可以去為國家打戰，有些日本人還會去他們家恭喜。」

筆者問：那時候覺得您希望日本贏嗎？

「當然啊～～～。希望阿。每天唱歌啊。教師每天講。」

筆者問：你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

「那時候在學校不用日語就會被教師罵。當時我記得路邊的電線桿上面有貼紙，“国語を話せば心は光る”（講國語心就會亮）。」

筆者問：六年級的時候大概幾個人申請學校？

「我的班八十六個人裡面大概五～六個人去申請學校。很少。那時候八十六個人裡面女生是二十八名，男生很多。」

筆者問：有去畢業旅行嗎？

「沒有，沒有錢...那時候很窮。畢業的時候要開茶會，沒有買糖果。我們都拿一碗米去？將米炒一炒，然後當作糖吃，一個人分一碗。就這樣吃。普通是有很多糖果。姊姊學長他們就有很多。我們那個時候很緊急的的時

候。」

(五)日本人警察之回憶

筆者問：日本人的警察很多嗎？

「也有臺灣人。大大小小，那時候有很多警察，警察就有帶很長的劍。很長的鞋子。警察來了有的人會躲起來了，有的就去看，有的跟來跟去很奇怪。大清潔的時候，通通把東西曬到外面。警察會來四、五個。隨便打分數。通過不通過是看他們，大清潔是好像大事情一樣。每一家曬東西。很亂～～。大家很怕他們也很尊敬他們。大家都努力做。」

(六)日文歌之回憶

劉小姐非常喜歡唱歌，訪談時想到日本的歌就開始給我聽，然後幫我解釋，什麼時候唱的歌。因此訪談時她唱過的歌整理，簡單的說明情況。

三、張女士 2008 年 9 月 27 日，在臺北縣新店市在某咖啡廳。

跟筆者的關係：在網路上認識被訪談者孫女，透過她進行訪談，當天是第一次見面。訪談時間約 2 個小時。

(一)家庭之回憶

筆者問：爸爸媽媽會講日文嗎？

「爸爸媽媽不會講日文。之前的人沒有受過教育。大家種田很少人去上課。」

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

「記得，但是我們家爸爸媽媽不會講日文所以不是國語家庭。」

筆者問：你有改姓嗎？

「那是跟日本有關公司上班或者開比較大的公司等有钱人才會改。如果在有關日本公司上班不改姓的話，不會被日本人承認。一般的老百姓就不會，而且不知道怎麼申請。」

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

「沒有。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村。他們大家一起住。」

筆者問：你有被日本人欺負過嗎？對日本人的感覺？

「我給日本人管的時間不長，就是在當學生的時候，那時候沒有被欺負，全班都是臺灣人啊！老師才是日本人，但是他們也不會欺負我們！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圈，活動範圍也跟我們不一樣，不太會接觸，對日本人的感覺就是很守時，有點嚴肅，到現在會懷念那個時候，雖然嚴肅，但是很有規律，不像現在的學生，有些很不像話，我們那個時候很好，日本人那時很會教育。」

(二) 日本人教師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之前的教師嗎？

「五、六年級是從長野來的教師。前幾年有個男同學跟教師聯絡邀請他來臺灣辦同學會。那一次當時的臺灣教師都來。在學校的禮堂辦。那個教師當時很年輕大概比我們大九歲左右。回日本之後結婚。很溫柔的教師。」

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

「當然做壞事就會罵，但是因為我們都是女生所以還好。我記得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沒有被教師打過。一般都聽教師的話，但如果有反抗的就會被處罰。假如書道科的時候忘記道具就教師讓學生回去拿道具等。都是自己不好才會被處罰。還有對學習比較嚴格。如果成績不好就被教師罵，但沒有被打。對男生比較嚴格。男生也比較調皮，所以有時候男同學做壞事就讓他站在教室外面等到下課。教師對平常的操行很嚴格。這個女生也一樣。我記得有 fukushoufukume 就是教師說什麼就重複一次之後再行動。比如說教師命令我去別的班級借地圖。我先教師的面前重複說『我現在開始去別的班級借地圖』，然後到了別的班級不能進去，先在外面跟教師報告，『我是幾年級幾班的誰我來借地圖』，然後有了教師的許可才可以進去，然後跟教師借地圖回自己的教室。以前的很嚴格」

筆者問：在學校教師叫你什麼？

「教師幫我們取日文名字（受訪者不希望公開）。大家都有。教師通常直接唸名不會加 San 等禮貌的用詞。」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

「有。跟父母講，這個孩子操行好啊，功課怎麼樣等。」

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

「有，比如說軍機、戰船發生事故的時候給學生聽。還有日本佔領南方的國家時班長升旗，大家都來到學校運動場慶祝。還有四、五、六年學生揮著日本國旗在學校附近邊唱歌邊行走。朋友都很高興。教師都會跟我們講。」

筆者問：有臺灣人教師嗎？

「有，大概一半一半。」

(三)修身科之回憶

筆者問：還記得修身科嗎？主要內容是？

「修身科是固定一週的第一個科目。主要學之前的偉大的人物、作法等。教師教我們學這些人物。人物是忘記了，比如說這個人做了什麼偉大的事情啊，怎麼忠義阿等。」

筆者問：還記得修身教科書嗎？

「教科書的表面是黑色。然後沒有幾張，主要學修業。地理跟國史的教科書很厚。」

筆者問：地理跟國史的教科書的內容主要是日本的嗎？有沒有臺灣的？

「都是日本的。」

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

「內容忘記了。」

筆者問：那什麼時候唸教育勅語？

「天皇的生日啊…日本祭日等。有一點忘記了。唱日文歌之後高年級生

奉讀教育勅語，被選的是發音標準的學生。因為要給大家聽所以一定要發音標準。下課之後跟教師練習發音還有怎麼上臺、怎麼打開教育勅語、怎麼收教育勅語、怎麼轉身、怎麼敬禮等（受訪者都有動作）。參加的人都是高年級的學生，低年級的學生會吵鬧而且不太懂教育勅語的意思。被選奉讀教育勅語的學生覺得很榮譽、很高興，但是有壓力，而且要多練習。」

筆者問：您當時懂教育勅語的內容嗎？

「現在忘記了！不過那時候應該懂，校長和老師都會說！不過那時好像自己看會看不懂，一定要老師講！」

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

「多多少少吧！不過好像比較有印象都是在講道德倫理的事，國家也是一種倫理啊！所以感覺也不是故意傳達國家意識啦！現在的教育也是會介紹國家啊，講一些國家的事！都會這樣啦！」

筆者問：怎麼進行祭典典禮？

「天長節、明治節、紀元節等時候。學校給學生一些甜點。一個人兩個這樣。大家都到禮堂集合、唱國歌之後，會有校長的校訓。內容是關於天皇的生日，天皇對人民的貢獻等等，讓學生理解。」

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學校好像很重視祭典！好像會往日本的方向站，要向國旗或是天皇神像鞠躬敬禮，大家都不敢講話啊！很正式，教師都會在旁邊看，也會一起作，反正整個過程都是很恭敬的，不敢亂來啦。」

（四）學校生活之回憶

筆者問：有畢業旅行嗎？

「有，但是因為那時候大家的經濟狀況不太好，所以參加的人大概三十個，我們班有六十多個人所以大概一半。自由參加。我們去臺南看鄭成功的古蹟，還有去看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神社，看一些歷史的東西。還有安

平附近的做鹽的地方跟養虱目魚的地方。做鹽因為太熱所以大家都不穿和服只有圍毛巾而已。在教科書學的東西沒有親自去看過。虱目魚也是之前不知道它們吃什麼長大，後來去養成場看餵食虱目魚吃人的糞便，看到虱目魚吃人的糞便後來不敢吃虱目魚了。還去了動物園等。那時候我們坐夜行的火車去，在車上唱歌非常愉快。」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補習？

「教師下課之後，特別幫我補習。每天下課之後教我幾個小時，有時候在教師的宿舍補習。因為教師這樣教我，才會考上高等科。那個教師不收錢真的很好。有一次在教師的宿舍辦特別訓練。自由參加，老師也不收錢。主要學日本的作法。比如說怎麼坐、怎麼倒茶、怎麼走路通通教我們。我們學了日本的作法。教師很好。」

筆者問：公學校時有沒有去拜神社？

「有。離學校一公里的地方有神社。比如祭日的時候大家都帶一把竹掃把一列一列地跑步去神社開始打掃。打掃完之後有什麼儀式，神社的主持會用樹枝做的工具，在我們身體周圍揮一揮，好像是有消災解厄的功能。然後結束又跑回學校。」

筆者問：大概都什麼時候去拜神社？很常去拜嗎？

「就是祭日的時候！」

筆者問：平常學校會帶你們去拜神社？

「好像有！好像教到有關神社的東西時，有帶我們去拜。」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老師就教怎麼拜，大家要跟著做，我們就排得很整齊，跟著老師做，老師說拜神社要很恭敬。」

筆者問：學校有朝會嗎？

「每天有朝會，所有的學生到運動場，然後男同學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大家先敬禮之後校長開始講校訓。」

筆者問：幾點開始上課？

「我們大概7點半到學校，然後先打掃。比如說為了專門給學生洗手，把水桶裝滿水，然後放在教室外面。痰盂、洗手間的打掃等。都是高年級的學生做。」

筆者問：你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

「那時候在學校都要講國語，有同學不小心講臺語，就被老師罰站，上課老師用國語上課，下課大家也要用國語。」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好像是五六年級時候有一些。校長會講一些戰爭的話，然後好像很激動的樣子，就是很愛國的感覺，然後告訴我們長大要貢獻國家，那時戰爭好像還好，不過會作一些軍事演練，不管男生女生都要！但是不多。」

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

「住在隔壁村的人有，他好像是受到學校的影響吧，那時他好像是念中學還高等科，他自己想去為日本打戰，覺得作戰是很光榮，不過他媽媽好像很難過，後來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回來。那時聽到很多人都去當兵，不過有的是被強迫的。」

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

「知道日本輸了還是很難過，這麼強的國家輸掉了...。很懊悔。」

四、李先生(假名) 2008年9月3日，在南投受訪者的同學家。

跟筆者的關係：透過室友的爺爺認識。當天是第一次見面。訪談時間約2個小時。

筆者問：還記得之前的教師嗎？

「二年級的時候是臺灣人教師。三~五年級是日本人教師。」

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

「有。我那時候當班長，日本人教師叫我發考卷。教師說兩個人一張，

但我以為四個人一張，然後把多餘的考卷還給教師的時候，教師很生氣。用尺的尖的部份打我的頭。後來我爸告訴家長會的會長，會長跟日本人校長講。最後有道歉。但到現在很恨那個老師。」

筆者問：其他老師也是很會打學生嗎？

「會打。但通常是學生有錯誤的時候才會打，沒有錯誤就不會打。那個日本人教師很誇張，脾氣很不好。也有很多溫柔的教師。這麼被恨的教師很少。」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

「大概每年都有。主要在學校怎麼樣啊，功課怎麼樣，在家裡的生活等等。」

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

「有。日本軍在哪裡勝利等。幾乎每天跟學生報告。日本勝利時很開心，我是有日本精神。現在很懷念日本。光復的時候也開心祖國的中國來，但這開心一下就變成失望。他們的教育，道德都很低。很失望，在中國政府統治下覺得是在受苦。日本人對臺灣人也當然不平等。但他們更誇張。」

筆者問：日本人時代有沒有覺得被欺負的感覺？對日本人的感覺？

「不平等，配給也不平等。但比中國人對我們好多。教育也有一些差別待遇。公學校是臺灣人，小學校是日本人。能進入小學校的臺灣人是很少。還是會有不公平的地方，不過後來國民黨來了更慘，日本人感覺比較厚道嚴謹，不會亂來！」

筆者問：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

「那個時候在學校不能用臺語。如果說臺語就會處罰。還有那時候學生之間有一個板子，上面寫“我是用臺語”，如果用臺語就掛那個板子，然後再找用臺語的學生。這樣輪流掛。回到家我們都用臺語，但有錢人的家庭用日文。」

筆者問：教師叫你什麼？

「直接用名字叫我們。五年級的時候有改姓名制度。聽說改姓名會有一些優惠。其實改姓的同學很少。」

筆者問：您還記得什麼科目？

「修身、國語、算術、圖工、唱歌等」

筆者問：喜歡的科目是？

「都差不多，不喜歡的是體操。我們體操的時候有練相撲。因為我很瘦，所以很容易輸。最不喜歡相撲。」

筆者問：還記得修身科嗎？主要內容是？

「尊敬別人、忠孝父母、尊敬前輩等。學習怎麼做人。」

筆者問：怎麼學習修身科？

「用教科書。大概一個星期一次而已。修身的內容是人的修業。」

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

「(開始唸教育勅語...)還記得一點。當時大家都要背。那時候大家都會唸。」

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的內容嗎？

「忠義啊，那時候是為了天皇是第一。」

筆者問：什麼時候奉讀教育勅語？

「有朝會啊！不是每天，在運動場。六年級的代表奉讀教育勅語。每天有升日本國旗，也有唱日本國歌。校長的教訓的內容是主要講當時的情況。戰爭的情況等。可以說新聞的東西。當時校長都是日本人。很少有臺灣人的校長。然後告訴我們要愛國，我記得有時後好像還會講一些戰爭士兵比較英勇的事蹟，感覺那些人好像很偉大、很厲害，會為國犧牲。」

筆者問：您懂教育勅語的內容嗎？

「老師有講啦！但是忘記了，不過好像要背，大家都會唸吧！如果老師沒講會不懂吧！」

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

「修身科好像還好，就是尊敬、孝順、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沒有特別強調國家意識吧！不過感覺教育勅語好像就有一點點，因為那時天皇第一呀！不過那時還是不太懂教育勅語，老師有解釋啦！好像就是宣揚日本的好，要大家愛國。」

筆者問：您還記得在學校學的日文歌嗎？

「很多。到現在還常常唱啊」

筆者問：公學校時有沒有去拜神社？

「有的學校，學校裡面就有小的神社，我們的學校就沒有。學校附近也沒有神社。我記得臺中比較多。不過上課老師都會教我們要怎樣拜神社呀！日本的神社是什麼之類的，但是我家很少拜啦！那時爸媽還是比較習慣拜傳統中國的神明，還有祖先呀！」

筆者問：有畢業旅行嗎？

「有，但我們家庭經濟不好所以沒有去。有錢的家才去畢業旅行。大部分的國民學校都去臺北，很少有去日本旅行的國民學校。」

筆者問：怎麼進行祭典典禮？

「天長節、明治節等時候，在學校辦儀式，記得有唱歌和念教育勅語。天長節是四月二十九日、明治節是十一月三日。天長節是天皇的生日，那時候是昭和天皇。」

筆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感覺就是很重要吧！因為全部的人都要參加呀！好像老師還是校長會穿的比較不一樣，全部的人都要站得好好的，老師會講一些有關節日的重要性，或是節日的由來，有時後校長也會講一些！那時候就覺得天皇好像很偉大，不過很有距離感，感覺就是高高在上啦！」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會講一些戰爭的事。有做過敵人如果打來了要怎麼躲怎麼逃的活動，我們還會去勞動服務，種田啊、搬東西，都跟戰爭有關，應該是要拿去打戰

吧！那時不太懂，老師說怎麼做就這麼做！現在想想應該是跟打戰有關吧」

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

「記得，我們父母不會講日文所以沒有被認定。一個村裡面大概一、兩個家庭。有錢的家庭才會被認定。」

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

「我的鄰居就有，他自己去申請的，知道被選上很高興，很多人也都替他高興，他覺得很榮耀吧！」

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

「沒有。派出所的日本人的家庭而已。」

筆者問：還記得日本警察嗎？

「記得。也有臺灣人的警察。那時候臺灣人當了警察就非常榮譽的事情。那時候附近有一個巡查擔任主任，名字叫“ししの”他非常嚴格我們都非常害怕他，如果被他叫到派出所的話，快尿出來似的害怕。我們那時候是配給，農家收穫的東西都給政府，然後政府發給我們配給的票。但是農家多是勞動所以比較容易餓，所以收穫的米等要藏起來。但如果被發現的話，被警察抓之後被打。在腳的關節夾住棍子並跪在地上，然後用木棍打壓背部。很可怕。當時的警察權力太大。」

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

「又開心又難過，一半一半。」

五、林女士 2008 年 10 月 11 日，在臺北縣三重市在受訪者家。

跟筆者的關係：透過朋友的認識。當天是第一次見面。訪談時間約 2 個小時。

筆者問：還記得日本人教師嗎？

「一到三年級時臺灣人教師，四到六年級是日本人女教師。日本人教師很嚴格，臺灣人教師比較疼學生。」

筆者問：什麼時候教師嚴格，有被罵過嗎？

「日本人教師很嚴格，整隊的時候如果沒有排好的話，教師把那個人拉出來罵。還有去上課都要穿制服，然後要帶手帕。但有一次拿了把剪掉的布拿去學校，日本人教師跟我說這個不是手帕。就罵我。雖然我沒有被教師打過，但日本人教師很嚴格。」

筆者問：教師有沒有訪問家庭？

「有。教師來我家確認我們有沒有拜“天照大神”。當時政府提倡要拜天照大神，雖然沒有強制，但是最好是拜啦！教師也在課堂上一直說，感覺不拜就好像不好！教師的話最好是聽比較好！」

筆者問：戰爭的時候教師跟學生講戰爭的事情嗎？

「有。上課的時候會稍微講到一點，然後感覺日本一定會打贏，有時後也會教我們一點有關戰爭的歌吧！那時候也真的希望日本能贏！」

筆者問：在學校用的語言是什麼？

「臺語比較多。在教師的面前要用日語，但是下課之後跟同學用臺語聊天，回到家還是用臺語。」

筆者問：在學校教師叫你什麼？

「直接叫我名字。沒有日文的名字。」

筆者問：還記得修身科嗎？主要內容是？

「記得有修身科但是內容都忘記了...。好像有教科書」

筆者問：您還記得什麼科目？

「修身、國語、算術、歷史、調理、裁縫等」

筆者問：您還記得內容嗎？

「大部分都忘記了，但歷史記得一點，比如說乃木將軍每天早上潑冰水洗澡。」

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

「我有記得有教育勅語，但忘記了。（筆者開始奉讀教育勅語就跟著我

唸)。你開始唸就想起來了，以前的東西很難想起來。」

筆者問：您還記得教育勅語的內容嗎？

「內容太複雜，不太懂那個意思。」

筆者問：什麼時候奉讀教育勅語？

「朝會和二月十一號的紀元節等節日。副校長拿教育勅語來，然後校長開始唸。很嚴肅。校長帶很長的劍，穿的衣服很正式還有勳章，我記得那個校長雖然很嚴格但是給我的感覺是很有帥氣。」

筆者問：您覺得修身科和教育勅語有傳達國家意識嗎？

「這個很難講啦！不過應該是有吧！課本好像講了很多日本偉大的人，當時就希望能像這些偉大的人一樣，就是要為國家貢獻啊！教育勅語內容太複雜，不太懂內容，但是就是知道要愛國家、要節儉、要孝順，好像還有講到要尊敬天皇。這樣算是有國家意識嗎？大概有一點點吧！」

筆者問：還記的朝會嗎？

「每天有，唱日本國歌之後升旗。還有校長的教訓。」

筆者問：還記的日文歌嗎？

「“君之代”還有“螢の光”記得一點點還有一些軍歌。」

筆者問：國民學校有沒有去拜神社？

「每個月二十號一個班輪流去神社。那時候圓山飯店後面有臺灣神社，我們都去那裡拜拜。」

筆者問：去拜神社時氣氛如何？會作些什麼？

「那時很怕老師，帶我們去神社，也都很安靜，上課也會說要怎麼拜拜，要誠心誠意、要洗手、要鞠躬敬禮等等。老師都會講解，大家都乖乖地聽，然後會做一遍，之後去神社，大家都會拜了。」

筆者問：有畢業旅行嗎？

「有，我們是去臺中。那時候有天皇的兒子來臺中在糖廠種樹，大家一起去看。一共有五天。只是不是每個人參加，有錢的才可以參加。我爸爸在

鐵道公司上班所以車票有打折。」

筆者問：還記的什麼節日？怎麼進行祭典典禮？

「天長節、紀元節、天皇的生日等，還有五月五號兒童的日子，兒童的日子記得有“こいのぼり”（鯉幟）。重要節日的話在學校辦儀式，每年都會慶祝這些節日，要唱國歌或校歌吧，我們還有去神社拜拜！有些地方還有慶祝活動，像是演戲。」

者問：當時進行祭典典禮的氣氛如何？

「校長、全校老師都會在啊！有的老師會穿比較不一樣的衣服，很特別，但是忘記了，只記得為了慶祝會有不一樣的衣服！。大家都會在操場啊，一定會讀教育勅語，大家跟著念，要立正站好，老師都會在旁邊，要站的很直，就覺得那是個很重要的活動。」

筆者問：學校裡有舉辦一些關於戰爭的活動嗎？

「在學校沒有。我五六年級開始打戰，後來就畢業了。」

筆者問：還記得國語家庭嗎？

「記得，我們家沒有。父母不會講日文。」

筆者問：附近有沒有日本人住？

「有。隔壁家就是日本人。他們看不起我們。我們有一次吵架。」

筆者問：對日本人的印象？

「現在還會想到那時候，我有幾個朋友也受過日本教育，有時候聊天都會聊到，我們會懷念那個時候，日本人對我們很嚴格，但是管得很好，大家都有精神、有禮貌，不敢做壞事。但是隔壁那個日本人對我們不好，會罵我們。」

筆者問：您有改姓嗎？

「我們沒有改姓，有一點半強制大家一直拖，就戰爭結束了。」

筆者問：您認識的人有人去為日本打戰嗎？

「知道那時有要人去當兵！還要去訓練，覺得為國家打戰很厲害、很佩

服，不過也有的不是去當兵，是去戰場作一些工作。」

筆者問：你知道日本戰敗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

「只是覺得結束了。沒有什麼感想，但是有一點點難過，會覺得為什麼輸。不過有些人很高興日本輸，有些人比較愛中國，那時候的老師很可憐。回日本之前在路上買東西，就被臺灣人罵，臺灣人那時很壞，還欺負人家。」